

# 中國現代史

3

• 資料選輯 •

# 1949

◆ 中原大學政治研究室編 ◆



A541 212 0019 1058B

# 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

## 目 錄

### 第三分册 土地革命 (一九二七——一九三七)

#### 第一輯 參攷史述

一、中共領導下的十年蘇維埃運動

二、「九一八」到「七七」

#### 第二輯 論文選讀

一、大革命失敗後中共繼續戰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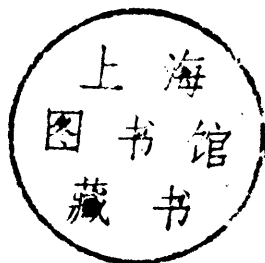
二、毛澤東同志的戰略思想

三、土地革命的實施與成就

四、為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而鬥爭的中國共產黨

~~1610325~~

上海图书馆藏书



# 第一輯 參攷史述

## 一 中共領導下的十年蘇維埃運動

廣州起義失敗之後，反革命者對於起義之工農羣衆，大肆屠殺，白色恐怖遍於全國，然而，反抗武裝鎮壓與殘酷剝削制度之起義事件，仍風起雲湧，尤其是在北伐中羣衆工作深入的地區，如湘、鄂、贛、粵諸省，農民自動的實行武裝自衛，抗租抗稅，不斷的與軍閥地主發生衝突，一九二七年秋，爲了保衛秋收而廣泛的爆發了『秋收起義』，各地起義之農民堅決英勇的與豪紳地主之武裝進行了激烈的戰鬥。由於各地農民起義先後不一致，相互之間的聯繫配合不够，或則因毫無準備，結果許多地方在軍閥武裝的殘暴鎮壓之下遭受摧殘。但是在羣衆基礎較爲鞏固且在英明的毛澤東領導之下的湘贛邊及井崗山區域，農民運動却始終堅持着。一九二八年四月下旬毛澤東所部游擊於粵、贛、湘諸省，並與發動湘南起義的朱德、陳毅所領導之部隊會合，成立紅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兼第十師師長，毛澤東爲黨代表兼十一師師長，陳毅爲第十二師師長，他們並在羅霄山脈中段一帶，建立了革命的工農專政的民主政權——蘇維埃政府，實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政策，在軍事上提出了以游擊戰爭爲基本方針，和游擊戰爭的戰術原則，在軍隊中建立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和政治工作制度，這是在中共領導下，土地革命運動中，第一個革命根據地，和第一支正規的紅色武裝的創立。一九二八年七月，彭德懷，黃公略於平江起義，不久與井崗山部隊會合，開闢閩粵贛蘇區，此外又有鄂豫皖蘇區，鄂東蘇區，陝甘蘇區，湘鄂西蘇區，閩浙贛蘇區的建立，廣西左右江，粵東江，海陸豐及海南島一帶蘇維埃運動也洶湧地發展起來了。

一九二八年八月，中共在莫斯科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正確的總結了大革命的經驗教訓，決定了今後奮鬥的總方針，大會指出大革命所提出的中國革命之基本任務——反帝反封建，並未解決，革命的性質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大會號召全國的勞動者們，為徹底實現民主主義的蘇維埃的新中國而奮鬥。並提出了現階段革命的政治綱領：（一）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二）沒收外國資本的企業和銀行；（三）統一中國，承認民族自由權；（四）推翻軍閥國民黨政府；（五）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政府；（六）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增加工資，失業救濟，與社會保險；（七）沒收一切地主階級的土地，耕地歸農；（八）改善兵士生活，發給兵士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政府軍閥地方的捐稅，實行統一累進稅；（十）聯各世界無產階級與蘇聯。

當時，各帝國主義國家，正陷於空前未有的世界經濟恐慌之中，而中國內部連年軍閥混戰，和國民黨政府黑暗專制以及殘暴的屠殺政策，早已弄得民怨沸騰，此外因破產失業、災荒饑饉而引起的民間騷動，都便利於蘇維埃運動的發展。在城市中，工人運動重又勃興起來，一九三〇年，中國革命已經開始了新高漲，同年夏天，在李立三主持之下召開全國紅軍與蘇維埃代表大會。李立三主觀主義的對於正在開展的革命高潮現象，作了誇張的估計，以為當時世界革命與中國革命的形勢俱已成熟，乃號召全國工農大眾普遍進行武裝起義，竟提出了要紅軍主力進攻長沙、南昌、武漢等大城市的言動主義之任務，使紅軍和全國工人運動都遭受了相當大的損失。但紅軍經過幾次大的戰役之後，在毛澤東的領導之下，糾正了盲目的軍事行動，紅軍實力得以保存。

中國工農紅軍，在廣大的勞苦羣衆的贊助之下，擊潰了在數量上、技術上都佔絕對優勢的國民黨軍閥軍隊對於閩粵贛蘇區所進行的第一次（於一九三〇年十二月開始），第二次（一九三一年四月）；和第三次（一九三一年七月）「圍剿」。同時，又肅清了混入蘇區內部

反革命組織「AB團」的破壞陰謀，蘇區的力量和地位，更加強大和鞏固了。

由於全國蘇維埃運動的發展，各地蘇區的建立，和各地蘇區的日臻鞏固與擴大，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乃於江西瑞金召開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正式選舉了臨時中央政府，推毛澤東為主席，大會製定了憲法草案，規定中國蘇維埃之目的：『是在消滅一切封建殘餘，趕走帝國主義列強在華勢力，統一中國，有系統地限制資本主義的發展，進行國家的經濟建設、提高無產階級的團結力與覺悟程度，團結廣大的貧農羣衆在地的週圍，以便轉變到無產階級專政』。

蘇維埃政府實行了下列的各種基本政策；（一）關於民主制度：一切過去被壓迫，被剝削的民衆男女一律平等享有無限制度的民主權利，市與鄉蘇維埃由勞動人民直接選舉，建立真正羣衆性的廉潔政府，切實保證羣衆在革命中所得的一切權利，並利用革命武裝與革命法庭鎮壓一切反革命的活動；剝奪一切帝國主義及剝削階級之特權。（二）關於土地政策；以依靠雇農、貧農，聯合中農，限制富農，與消滅地主的土地革命路線，澈底地消滅地主經濟和封建剝削制度，無代價的沒收一切地主的全部土地財產，沒收富農的好田，分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士兵，和農村手藝工人，無條件的廢除高利貸，取消苛捐雜稅；（三）關於勞動政策；實行八小時工作制，訂立勞動合同，增加工資，失業救濟與社會保險，改善青工、婦工和學徒的待遇，組織職工會；（四）關於財政經濟政策；實行統一累進稅，取消一切苛捐雜稅（國民黨區苛雜名目共有一千七百五十六種），發展國民經濟，有計劃的調節、扶助、獎勵農、工生產事業和私人經濟，組織對外貿易，擴大合作社運動；（五）關於文化教育政策；實行免費教育，推行識字運動和社會教育，並創立各種幹部學校，及高級研究機關；（六）關於紅軍建設；以至少數民族關係等均有正確的政集。

蘇維埃政府建國的精神，和這些具體政策實行的結果，實質上是真正繼承了大革命的傳統精神，實現了孫中山先生偉大的革命理想。

各地蘇區建設突飛猛進的過程中，數千萬蘇區人民，過着從來未有的無民族壓迫、封建剝削的，民主自由，勞工解放和「耕者有其田」的、幸福愉快的、真正三民主義的生活，與黑暗的南京政府統治下的廣大地區相比較，形成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共產黨鑒於民族危機的加深，和全國反日運動高漲。提出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之基本口號：「武裝人民，進行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以保障中國民族的獨立，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得到了全國廣大人民的擁護。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四日，中國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正式公佈對日宣戰（國民政府則在全面抗戰四年後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才正式對日宣戰），並頒佈了對日作戰的總動員令。號召全國民眾開展民族革命戰爭。同時，在蘇區積極的進行紅軍之建設，以便作為抗日戰爭的中堅力量。當時由於土地革命的深入，游擊戰爭的開展，和赤衛隊、游擊小組等人民武裝的普遍組織，蘇維埃政府並頒佈了各種優待紅軍及其家屬的法令，採行自願兵役制，經過政治動員的方式，使成千成萬的勞動人民湧進紅軍。紅軍中工農幹部的成份增加，保證了紅軍階級成份的純潔，和共產黨在紅軍中絕對的領導地位。紅軍中政治委員制度，與政治工作制度建立，創造和鞏固了官兵一致、軍民融洽、和艱苦奮鬥的優良作風。政治文化教育的進行，提高紅軍士兵的政治覺悟程度、鞏固了紀律與戰鬥力；整編的結果，使紅軍在組織上更加正規化，在軍事技術上也比前提高了。因此紅軍日益迅速的擴大與鞏固了起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成立，統一了全國紅軍的領導，使各個蘇區，各個戰綫的紅軍部隊，開始在統一的戰略意志之下，互相呼應與互行動起來。紅軍在歷次『圍剿』與反圍剿的戰役勝利之中，根據中國革命基本特點，戰爭形勢和總的政治任務，對於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的科學原則，也有新的創造和不斷的發展。確定了以弱敵強、以少勝多、以分散對集中、以鄉村對城市的戰略方針；確定了內綫持久的防禦戰與外綫速決的進攻戰的戰略戰役方針；確定了游擊戰、陣地

戰、運動戰配合運用的戰役戰術方針；確定了統一戰略意志下的獨立自主的游擊戰方針，確定了進攻時反對冒險主義，防禦時反對保守主義，轉移時反對逃跑主義，游擊時反對游擊主義的原則。蘇維埃政府，在『一切爲着前線勝利』的口號之下，對於紅軍給養與供給，衛生治療等等的保證，盡了最大的努力。這樣，紅軍便成爲中國唯一的不可戰勝的革命武裝。

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一月，中國蘇維埃政府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上，中華蘇維埃中央臨時政府主席毛澤東報告蘇區建設經驗，總結蘇維埃各種政策實施情形與收獲，在蘇區因爲實行革命政策之結果，消滅了封建地主的剝削制度，農民、士兵都分得了土地，人民安居樂業，豐衣足食，比革命前的生活大大改善了。一年之中蘇區穀物收成增加百分之二十，工人工資增加數倍，待遇改善，一切羣衆都有着自已的組織，享受着蘇維埃的各種民主權利，雖在敵人的封鎖破壞之下，蘇區仍日趨繁榮、鞏固於擴大。大會并總結了幾年來鬥爭的經驗，提出了動員羣衆，反對敵人即將到來之第五次『圍剿』的具體步驟。

第一次大會閉幕不久，國民黨軍隊即由閩回蘇，開始他們曾經長期準備了的第五次『圍剿』，蔣介石改變了作戰方針，聘德人賽克特爲顧問，採取步步爲營，穩紮穩打的堡壘政策，並以『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口號，來進攻紅軍、在帝國主義的各種支援之下，蔣介石親率大軍百萬，對中央蘇區實行重重包圍，四面進攻，此時，紅軍在軍事領導上發生錯誤，輾轉於敵之主力與堡壘之間，完全陷於被動，一九四九年秋，敵人迫近蘇區腹地，贛昌戰役後，『單純防禦路線』造成了蘇區極端嚴重的形勢，欲在內綫與敵決定性之戰爭已屬不可能，乃轉變戰略方針，避免與敵作過早之決戰，保存紅軍主力，決定突圍北上，實現民族革命戰爭之主張；同年七月，組織北上抗日先遣隊，由方志敏、尋淮洲率領，經閩入浙向北進發。另外又組織西進遠征支隊，由蕭克、任弼時率領，向贛西湖南挺進，積極宣傳願與敵軍官兵停

止內戰一致抗日之主張。同年十月，除留部份負責幹部率領軍區武裝堅持游擊戰爭外，主力紅軍（一、三、五軍團），乃實行突圍，從福建、江西出發，經過了廣東、湖南、廣西、進入貴州。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遵義會議，糾正了五次反圍剿中單純防禦路線的錯誤；集結主力於遵義附近擊潰國民黨軍隊的追剿部隊，進行了半個月的休整補充之後，復向雲南突進，繞道川康邊境轉入四川，與紅四方面軍會合於懋功。河口會議之後，張國燾違反繼續北上的決議。舉兵南下，造成紅軍的分裂局面。但紅軍第一方面軍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領導之下，經過甘、陝境內的殘酷戰鬥之後，於一九三五年冬，勝利的進到陝北蘇區，完成了舉世矚目的紅軍主力北上抗日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紅軍進入陝北之後，就達到了抗日的前進陣地。更便於實現其抗日主張，所以七七事變爆發後紅軍一經改變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就能迅速進入山西、河北、及時挽救了華北全面淪陷之禍。

## 二 『九一八』到『七七』

### （一）『九一八』事變

一九二九年，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總危機爆發，除蘇聯外，世界各國，都陷於嚴重的經濟危機之中，帝國主義列強爲了逃出這個危機起見，企圖挑起重新瓜分殖民地及勢力範圍的戰爭，來取償於防衛薄弱的國家。特別是先天不足的日本帝國主義，在經濟危機爆發之後，對外貿易驟然減縮，商品輸出自一九二九年——三一年，兩年之間竟銳減百分之四十五，因此滯貨堆積，生產停頓，失業工人和破產之農民激增，而地主資本家更加重了對於勞苦大眾之剝削；日本工農大眾反抗地主資產階級和天皇制度之革命運動，則日益增漲。因此，日本帝國主義乃企圖以積極進行其大陸政策，滅亡中國之侵略行動，來緩



和國內革命危機之威脅，彌補其在經濟恐慌中所蒙受之重大損失，同時還準備侵犯蘇聯。

日本自滅了朝鮮，便銳意經營滿蒙，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它在滿蒙一帶大量的投資，依靠南滿鐵路和旅順、大連等港口，操縱了東北人民的生計，享受着奴役中國人民的各種特殊權利，儼然以滿蒙的主人自居。但自華府會議以後，英美各國過剩的資本源源不絕地輸入了滿洲，使滿洲在中國的『民族資本』的美名之下，興築濟海，吉海鐵路與北甯路聯接；打通、齊克路直達北滿，與日本之南滿路發生『並行綫』之衝突，關葫蘆島為商港，亦予日本之大連以商業上的打擊，此外開辦工廠，設學校，並懲息奉軍改制易職等，這些活動，無不使日本帝國主義感到嚴重之威脅，英美與日寇之間，在滿洲利益上尖銳的對立，引起日本帝國主的焦急。欲尋一切可能之機會，製造事端，以便排除英、美之勢力，而將滿蒙完全變為自己的殖民地，而侵略滿蒙乃為其推行大陸政策，滅亡中國整個陰謀之第一步。

一九二九年的經濟危機，不但促進了日本侵略中國的慾望，同時還使它認為侵略中國的時機已到。因為此時歐洲列強及美國正在完全忙於國內經濟危機所引起的事情，自顧不暇，蘇聯也忙於國內社會主義的建設，而中國又內亂不止，防禦薄弱，於是他便積極部署以武力侵吞滿蒙之計劃，一面使國內機構日趨法西斯化；一面則屯兵於朝鮮邊境。一九三一年夏，在南滿路兩側增兵達二萬餘，潛置東北之所謂『日本在鄉軍人』亦達七千人以上，日駐滿警察亦增至五六千名，在南奉路沿綫更築有砲台八十餘座，此外又派遣浪人，勾結流氓、『胡匪』、『蒙匪』，共約數千人。這些準備就緒之後，乃製造種種『地方事件』，向中國挑釁，一九三一年七月二日，在吉林萬寶山地方，日人驅使韓國農民攔河築壩，強掘民田，與中國農民發生衝突，日本軍警則開槍慘殺中國農民，這就是所謂『萬寶山慘案』。此案發生之後，日寇蒙蔽真象，捏造事實，日報在朝鮮大肆煽惑，誣中國屠殺韓農，虐待鮮民，朝鮮各地在日寇這種挑撥欺騙之下，乃發生激烈的排

華運動，七月上旬，漢城、仁川、釜山……各地的華僑被朝鮮暴民和日本浪人慘殺的在數千人以上，華僑商店住宅悉被搗毀，這就是『朝鮮排華慘案』。萬、鮮兩案發生之後，我外交當局雖數提抗議，均無結果。不久又有所謂『中村事件』發生，日本參謀本部之官吏陸軍上尉中村麗太郎，以遊歷爲名，往內蒙作軍事密探，於八月間失蹤。日寇誣爲興安嶺之屯墾軍所殺，張皇其詞，大肆宣傳，並迅速調兵赴滿洲各地，準備戰爭。九月十八日夜，日軍乘我無備，自行爆毀柳河鐵橋，反誣爲中國軍隊所爲，引作口實，不宜而戰，大舉進攻，以重砲轟擊瀋陽城垣，攻佔北大營，旋即佔領瀋陽兵工廠，以及各關，這就是震動世界的『九一八』事變。

事變發生之日，東北邊防軍奉國民黨南京政府的命令，一槍不發而退出了瀋陽。同日，日軍又佔領營口、莊台、蓋平、鉄嶺、昌圖、開源、安東、鳳凰城、撫順、延吉等十餘縣。同時，南滿路北端日軍亦迅速襲擊長春，進逼吉林，吉林省代主席熙洽投降，二十一日吉林爲日軍佔領。十月八日，日飛機隊大舉轟炸錦州，此後通遼，開原等地亦不斷受日機襲擊，東北軍將領則奉行不抵抗主義，繼續撤退，僅數日間，遼吉兩省萬里錦繡山河，就一變而爲日寇殺戮中國人民的屠殺場了。

日屠侵佔瀋陽的消息傳出後，全國人民無不憤懣填膺，紛紛組織抗日救國會，宣佈與日經濟絕交，檢查日貨，示威，遊行，請願，成立義勇隊，一致要求政府出兵抗日。但國民黨南京政府仍執行其錯誤的『不抵抗』、『不交涉』的政策，而希望英、美等帝國主義出面干涉。因此竭力向國聯申訴，請求制裁暴日。然而英、法帝國主義所操縱之下的國聯，因贊成日本反蘇，又無力制裁日本，故一味遷就日本，反替日本掩蓋侵略罪行，對中國採取敷衍態度，雖會兩度決議定期要求日軍撤退，但結果均爲日本所拒絕。此後，日寇侵略之兇焰更加猖狂，一面進攻北滿，與當時孤軍抗日之馬占山將軍，和各地興起之人民自衛武裝部隊（義勇軍）激戰；一面則唆使漢奸賣國賊袁金鎧、

熙洽等組織偽維持會。日人土肥原，於天津劫持溥儀東渡，籌組偽『滿洲國』傀儡政權。十一月十八日，日軍攻陷龍江，十二月，日軍分三路進攻錦州，東北軍完全退入關內，於是東北三省完全隸於日寇的淫威之下了。

## (二)一二八上海抗戰及其後的局部抗日戰爭

(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四)

南京政府在東三省淪陷以後雖仍堅持着退讓屈服的不抵抗政策，但在高漲的羣衆反日運動的脅迫下，究竟不敢公開承認『滿洲國』。日本帝國主義爲了想用武力脅迫南京政府，正式承認『滿洲國』，並替它鎮壓人民的抗日運動，同時爲了向國際示威，於是發動了上海戰爭。

一九三二年一月，日本和尚五人，在上海虹口附近被人毆傷，日軍藉此唆使日本浪人，焚三友實業社工廠，並向上海市政府提抗議，要求懲兇道歉，封閉抗日團體，上海市政府完全接受日方要求，並立即封閉上日會。而日軍竟於一月二十八日夜，大舉進攻上海閘北。當時駐防抗滬的十九路軍，在民衆反日高潮的推動下，自動的進行抵抗。

淞滬抗戰爆發後，全國人民振奮，中國共產黨發動了上海十萬日廠工人大罷工，並號召了許多工人、青年學生投奔前綫，組織義勇軍與十九路軍並肩作戰，或擔任運輸、交通、偵察、救護等工作。上海各界民衆，也自動恢復了抗日救國會的組織，募集資金、物品，支援前方作戰將士。故在戰爭開始的十餘天中，日軍屢敗，增兵多次，幾度更換指揮官，始漸佔優勢。而南京政府，在汪精衛的策動下，命令十九路軍立即退出上海，停止抗戰，同時蔣介石派三旅入到上海，解除工人學生義勇軍的武裝，並強迫十九路軍繳械。上海的資產階級們，亦多方設法，迅速結束戰爭。

上海的抗日戰爭，堅持了三十五天，日本軍隊死傷六萬，損失奇

重，粉碎了日本軍閥四天佔領上海，一星期攻破南京的狂妄計劃。但終因我方兵力薄弱，彈藥缺乏，得不到本國政府的援助，且受本國軍隊夾擊的威脅不得已於三月間退出淞滬防線，上海抗戰，遂告結束。

當十九路軍總退却以前，國民黨的親日派，經過英美帝國主義，已開始與日本進行和平談判，至五月初，便訂立了喪權辱國的『淞滬停戰協定』，此後，中國軍隊便不准駐紮淞滬。

一、二八的抗戰，雖因親日派的出賣而失敗，然而它打破了日本帝國主義迅速佔領中國的迷夢，給『中國不能抗日』與『三天亡國論』者以迎頭痛擊。同時它提高了民衆武裝抗日的勝利信心，使民衆武裝抗日的運動，得到進一步的開展。

一九三三年二月，日本帝國主義者又集結重兵，佔領榆關，進窺熱河。熱省主席湯玉麟不戰而退，日軍垂手而據承德，未及一星期，便佔有熱省全境，於是日軍氣焰萬丈，想一鼓而下華北，遂又向長城各口進攻。當日軍進到長城各口時，中國駐軍堅守古北口、喜峯口一帶，給橫衝直入之日寇以痛擊，尤以二十九軍的英勇鏖敵，引起了全國人士的興奮，各地民衆，到處捐募款物，發出通電，慰問長城抗敵將士。

南京政府在親日派的把持之下，表面上唱着『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高調，暗地裏派熊斌北上，幫助黃郛與日軍談判妥協條件，不久堅持了兩個多月的長城孤軍抗戰，又被賣國的『塘沽協定』斷送了。『塘沽協定』中公開的內容有：（一）中國軍隊退出綏東一帶；（二）日本可用飛機或其他方法在戰區內施行偵察，中國方面應予保護；（三）日軍退至長城一線；（四）在中日兩軍防線之中間區域，由中國警察維持治安。另外，還有秘密的附件。從此，關東各縣，遂爲敵人所有，華北之門戶洞開，日本帝國主義可以隨時侵佔冀察，威脅平津了。

日本帝國主義在進攻長城各口時，它還組織了偽軍張海鵬李守信等部，攻取察哈爾省。五月下旬，多倫不守，張北、沽源等又相繼淪

陷。當時，北方的進步將領吉鴻昌、方振武、馮玉祥等，在華北民衆抗日運動高潮的影響下，自動捐產，組織「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發動了人民武裝抗日鬥爭。同盟軍成立之初，不過幾千人，自經發動後，各地武裝軍民自動來參加的達十幾萬人。他們的槍械彈藥既不夠，給養又貧弱，還受到國內親日派的造謠破壞，在種種極不順利的條件下，經過了五十餘天的英勇戰鬥，竟將日僞軍從多倫沽源等地驅走，恢復了廣大的失地。後來，因國民黨親日派多方阻撓，派兵威脅抗日同盟軍，勒令解散，暗藏奸細托派份子張慕陶，又從同盟軍內部來挑撥離間，再加以日寇的嚴重武裝進攻，抗日同盟軍遂陷於失敗，方振武出國，馮玉祥調赴南京，吉鴻昌被刺未死，後復遭暗害，北方的局部抗日戰爭，便轉入暫時沉寂的狀態。

自局部抗日戰爭結束後，國內的局勢是：一方面人民與軍隊繼續要求全國武裝抗日，另一方面南京政府實行了新的恐怖政策，用武力鎮壓抗日救亡運動。一九三三年一月，中國紅軍向全國宣言，願意在下列三個條件下，與全國任何軍隊訂立共同對日作戰的協定：（一）立即停止進攻蘇區及紅軍；（二）立即給民衆以民主自由；（三）允許民衆有組織抗日義勇軍和武裝的自由。宣言發出後，感動了江西前綫的剿共軍隊，要求停止內戰，但爲蔣介石所拒絕。是年冬，十九路軍在福建發動抗日事變，並與紅軍訂立抗日協定，但因託派份子的破壞和政客的播弄是非，以及領導者政策上的許多錯誤，遂使福建事變在很短期間招致失敗。

國民黨及其南京政府，雖然暫時阻止了國內革命軍隊的武裝抗日運動。但人民的抗日熱潮，仍然繼續高漲。一九三四年春，上海反日烈士潘洪生出祭，參加者三十萬人，形成了反日大示威。同年五月，國民黨先進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等公佈了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國內名流學者及抗日人民，簽名贊成者，共達十餘萬。此外，全國各大城市學生與職業青年的請願示威運動，連續不絕。國民黨的反動派對於這些人民的愛國運動，竟變本加厲，改用了慘殺的恐怖手段，一

九三三年，北平學生因公葬革命先烈李大釗，先後被捕者達千人，其中死於監獄裏的約四五百人。上海及各大城市的愛國青年，被捕被殺者，日有數起，蔡元培魯迅等也常接到暗殺的警告。國內名流楊杏佛，史量才二氏，皆在此時期慘遭暗殺。國民黨的特務機關任意抓人，連與抗日無關的社會正義人士，均在所不免，塘沽協定後的國內局勢，被一股恐怖逆流沖激成一片黑暗。

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並不因南京政府的退讓屈服而緩進，相反的，却日益加急了。一九三四年四月，日本外務省發表了天羽的『四·一七』聲明，公開宣稱欲變中國為日本之保護國，並明白的提出了將以武力保持對華的一切軍事政治的經濟壟斷權。這一聲明發表後，華北親日派的政客官僚，便彈冠相慶，大事活動，首先在五月間實行了華北與偽滿的通車通郵，設立關卡，接着減低日貨進口稅則，不久，日本外相廣田又發表了對華三原則，更加露骨地表示出日本企圖立即併吞華北，滅亡全中國的決心。

### （三）華北事變與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漲（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四年，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步伐，愈走愈緊，它一方面高唱『中日經濟提携』，提出對華的三原則：一是共同防共；二是承認偽滿；三是經濟合作，想從政治和經濟上來引誘南京政府投降，另一方面積極增兵華北，利用漢奸親日份子作傀儡，在較隱秘的方式下，武裝佔領全華北。

一九三五年五月，日本關東軍藉口中國軍隊侵入非武裝區，向北平軍委分會負責人何應欽提出苛刻要求，並由關外調遣大軍入關。當時何應欽氏乃與日軍司令官梅津談判，訂立了無恥的『何梅協定』，其內容為：（一）取消河北省及平津國民黨黨部；（二）撤退河北省的中國駐軍；（三）撤消河北省主席于學忠職，更換平津兩市長；（四）撤消北平軍委分會；（五）停止河北省的反日活動。不久，察省

主席宋哲元因捕獲日本間諜，被迫引咎辭職，於是冀察兩省主權，大半淪入敵手。

同年七月，漢奸殷汝耕在日本指使下製造了『香河事件』，十一月又策動了『請願自治』的暴動，把冀東二十五縣公開劃為『防共自治區』，成立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同時，日軍萬餘人開到榆關，作為擴大偽自治運動的後援。華北的漢奸親日份子，便到處醞釀着『自治運動』。

日寇的武裝侵略，造成了中華民族的空前危機，華北自治運動，更震動全國，使各階層人民，都感到亡國滅種的大禍，迫在眉睫，到處發出了救亡圖存的沉痛呼聲。這時候，中國共產黨和它領導的紅軍，已放棄江西蘇區，長征北上抗日，同時根據國際國內的新形勢，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發表了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宣言，要求國民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並號召全國人民，不分階級，不分黨派，共同團結，挽救民族於危亡。『八一』宣言發表後，全國人士皆表示熱烈擁護，並得到一部分『剿共』官兵的贊同。但是國民黨的親日派與反動的當權者却固持成見，對日本繼續退讓，放棄國防陣地，把鎮守冀察撤退下來的幾十萬大軍，完全調到後方，追剿與堵截北上抗日的紅軍，對華北漢奸的偽『自治運動』，置若罔聞，而對人民則嚴禁錮印抗日書報，取締一切抗日救國運動。例如日本認為上海新生雜誌侮辱了日本天皇，南京政府便遵命逮捕了新生雜誌的主筆杜重遠。並頒布不得妨礙邦交，必難陸鄰的命令。

處在國防前線的華北人民，親身感受到日寇武裝壓迫的痛苦，已不能繼續忍受日寇漢奸賣國賊們猖獗行爲，憤懣情緒，達於頂點，於是北平的青年學生，首先怒吼起來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各中學校學生萬餘人，不顧敵人槍口刺刀的威脅，走上街頭，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自治運動』的壯烈口號，提出了『停止一切內戰，共同對外』的要求，當天向華北軍政長官提出六項條件：（一）反對防共自治運動；（二）公開宣佈對日交涉經過；（三）

不准任意捕人；（四）保障北方領土安全；（五）停止一切內戰；（六）給予言論、集會、結社、出版之自由，而軍政當局則以大刀水龍回答示威請願的學生，十二月十六日，他們又結合了三萬餘人，衝過大刀隊和水龍的封鎖，在前門召開了市民大會。『反對華北自治運動，爭取民族自由解放』的吼聲，震天動地，使準備即日成立的冀察政務委員會，不得不延期舉行。

一二·九，一二·一六的抗日大示威，打開了全國恐怖沉悶的空氣，使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進入了新的時期。接着一二·九而起的，有杭州、廣州、南京、上海、武漢、長沙等地的學生遊行示威運動，隨後，便是各地普遍發動的晉京運動。

一二·九，一二·一六運動激起了全國廣大愛國人士的同情與聲援，上海總工會、文化界及十四個法團皆通電反對『自治』，要求南京政府出兵討逆。國民黨元老尤烈、馬相伯等，對於政府的退讓屈服政策與壓迫愛國行動的行爲，也表示抗議，國民黨及其南京政府內部的許多愛國份子，也對親日派表示非常不滿，而同情抗日運動了。但是南京政府當局，仍以拘捕、恐嚇、和分化等種種方法，壓迫抗日運動，甚至頒佈了『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橫加鎮壓。

一九三六年春，冀察政務委員會正式成立，以宋哲元爲委員長，實際上這是半傀儡式的政權，一切重要政令的施行，均須得日本當局的同意，在這樣的特殊政治局面下，日本帝國主義吞併華北的計劃，便逐步實現了。在經濟上，它以大規模的走私政策，排斥英美的華北市場，摧毀華北的中國民族工業。在軍事上擴充組織，設立華北駐屯軍司令部，又在各大中心城市遍設特務機關，訓練漢奸，刺探中國軍情。並向北寧路沿綫不斷增兵。同時在成都、北海、海口、上海等地，到處進行武裝挑釁。

九一八五週年紀念日，日軍向駐豐台之二十九軍挑釁，強佔了豐台，且向宋哲元軍長提出『冀察與冀東合流，撤換二十九軍全部反日軍官』等無理要求。結果因人民堅決反對，未能實現。不久，日本大



舉進攻綏遠，綏遠軍民，便自動的燃燒起抗戰烽火。

自綏遠的局部抗戰爆發後，北平、上海等地學生、職業青年、文化人紛紛組織慰勞團北上，許多愛國志士投筆從戎，青島上海等地的日本工廠華工，連續發動反日大罷工，上海文化界、職業界、婦女界的愛國人士，組織了抗日救國會，援助綏遠戰爭，並推動南京政府進行全面抗戰。全國各地皆沸騰起要求和平統一，準備全民抗戰的熱潮。日本帝國主義所挑撥的兩廣事變，就在這種全民的反對『槍口對內』的壓力下，得到了和平解決。

一九三五年底，紅軍經過了二萬五千里的長征，到達陝北，建立了新的抗日民主根據地。次年遣派勁旅東渡黃河，出山西，企圖打通北上抗日的道路，因國民黨派大軍前往堵截，遂回師西岸，以求保持國防實力。同時，發出了兩次通電，號召一切中國軍隊，不分派別，不分信仰，組織全國統一的抗日聯軍，團結救國。中共中央也致書國民黨要求停止進攻紅軍，建議兩黨重新合作，恢復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實行三民主義，結成全民族的統一戰綫，團結抗日，共同建立中華民主共和國。

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國與國共二次合作的主張，得到了社會正義人士的贊助，一部份過去採取觀望態度的民族資產階級，開始轉向抗日戰線了。國民黨中央許多要員，也痛恨親日派禍黨誤國，而要求一致抗日了，但是，親日份子仍佔很大勢力，對日妥協政策在政治上仍居統治地位，蔣介石迷戀於『先剿共而後抗日』的錯誤主張。因此，南京政府一方面不斷的與日本談判，想以較強硬的態度使日本稍稍讓步，以緩和國內空氣。另一方面仍然嚴禁抗日救國運動，十一月間又逮捕了全國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等七人，全國震動。十二月蔣介石親率大軍到東北，準備再度發動大規模的『剿共』內戰。

## （四）西安事變與國內和平的實現

（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

中國共產黨與紅軍堅決主張攜手抗日的影響所及，連當時在西北前線的『剿共軍』張學良，楊虎成部，也深受感動。大部份官兵皆自動要求停止內戰，東北軍更提出了『打回老家去！』的口號，張楊二將領，經歷了十幾年外患與內戰的痛苦教訓，親見全國人民愛國熱潮的奔騰，也不願繼續『剿共』，因屢向蔣介石進諫，但均未被採納。

一九三六年六二月初，蔣介石到西安，督促張楊，繼續積極『剿共』，九日，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組織萬餘羣衆，向張楊請願，痛苦陳詞，要求停止內戰，許多下級官兵對繼續『剿共』戰爭的命令，皆表示憤恨。張楊乃再度向蔣氏進言，蔣介石嚴詞拒絕，斥張違抗命令。十二月十二日，張楊遂以兵諫手段，挾持蔣氏，請求答應停止內戰，『立即抗日』。這便要歷史轉變關鍵的雙十二事變。

西安事變發生後，全國震驚，張學良，楊虎成通令全國，提出八項主張：（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二）停止一切內戰；（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四）釋放一切政治犯；（五）開放民衆愛國運動；（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等一切政治自由權利；（七）確實遵行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日本帝國主義則乘機造謠，兩三次捏報蔣氏身死，並指使漢奸、親日派、托派份子迅速組織大規模的內戰，南京政府在親日派何應欽等把持下，一方面調兵遣將，沿隴河線西上，進攻霍關，又派大隊飛機，轟炸西安。另一方面，電召赴德養病之汪精衛，立即回國，共同進行聯日倒蔣反共的政治陰謀，藉此以擴大國內分裂局面。取蔣氏的地位而代之，托派份子張慕陶等奉日本特務機關的指示，亦趕到西安極力煽動倒蔣內戰。

當時中國共產黨聞訊，即派周恩來赴西安，主張和平解決，聯蔣抗日，周氏並親自與蔣介石懇談國內外形勢及聯合抗日之必要。一面致電南京政府，一面又與西安當局接洽，提出和平解決辦法。同時，全國各界愛國人士皆紛紛呼籲和平。蘇、英、美、法各國也從中斡旋

不久，張學良陪送蔣介石飛至南京，雙十二事變，遂得和平解決。

蔣介石回南京後，國民黨召開三中全會，商討對共產黨與日本的方針。開會時，共產黨中央發出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文，提出五項要求與四項保證，它的內容是：要求，一、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二、給人民以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材，共同救國；四、迅速完成對日寇戰之一切準備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保證：一、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二、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稱為國民革命軍，受南京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三、在特區政府內實施普選的澈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接着國民黨先進何香凝、宋慶齡、孫科、李烈鈞等向三中全會沉痛建議，恢復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聯共抗日。

在西安事變前，國民黨及社會中一部分上層份子，曾迷惑於成見，懷疑共產黨主張團結抗日的誠意，西安事變後，大部分人士，已完全相信共產黨提議合作抗日是出於真誠，而對於聯合共產黨的主張，皆表示贊同。

三中全會中，親日派領袖汪精衛，提出堅持剿共的政治決議草案，陰謀繼續挑動內戰，這一提案受到許多國民黨領袖的抨擊，會中除周佛海等少數親日份子替汪辯護外，大多數人士均表示反對，所以大會中抗日與親日派的鬥爭，非常激烈，結果通過了模稜兩可的決議案。『在外交方面，認為和平之期望猶未斷絕，吾人固願確守平等互惠與尊重領土主權完整之原則下，求其初步解決。』這就是說仍不改變不抵抗的妥協的政策。在內政方面則『根絕赤禍於中國』。三中全會在親日派影響之下，雖然通過了根絕赤禍案使全國人民非常失望；給國際人士以不良的印象，但在實際上，這次會議却在傲慢自大的措辭下，通過了贊成停止內戰與國共合作的意見。

自三中全會後，國民黨駐陝甘之軍隊，已停止進攻紅軍與共產黨

代表繼續談判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的條件，撤換了親日的外交部長，這些事實，證明了國民黨政策已開始轉變而逐漸傾向抗日，國內和平已經實現，結束了十年內戰的局面。

國民黨南京政府的政策稍有輕變，就受到親日派及有反共成見的份子的頑強抵抗，他們一方面胡說：『共產黨是以統一戰線為推翻國民黨與南京政府的烟幕彈』，藉口來反對聯合共產黨以對外，竭力破壞國共合作。另一方面，他們改編東北軍與西北軍，監禁張學良，逼楊虎成出國，對全國救亡運動，仍用高壓政策。因此，國內和平雖已實現，而人民還是沒有絲毫的自由民主權利。在一黨獨裁的專制政體下，國內和平是不鞏固的，於是全國展開了要求實行民主政治的運動。

國民黨南京政府，在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已經頒布了虛偽的憲法草案，原定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召開國民大會，各地代表已在國民黨把持下選定，但全國各界皆表示不滿，要求重選代表，召開真正能代表民意的國民大會，組織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國防政府，實行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中國共產黨亦於此時提出了：『鞏固和平，爭取民主，實現抗日』的方針，號召全國人民為實現民主政治，準備對日抗戰而奮鬥；同時，和各種破壞統一戰線的言論，作無情的鬥爭。

## （五）七七事變與全面抗戰的開始

（一九三七）

西安事變後，中國內部的團結，引起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不安，它提出了所謂對華的『新認識』與『新政策』。一方面用欺騙的方法，繼續爭取南京政府，參加防共統一戰線，以分化中國。指使托派、漢奸、親日派竭力破壞國共二次合作，挑撥各黨各派間的關係，分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又派駐華大使川樾，不斷地與南京政府談判『調整中日關係』問題。另一方面，則增加華北駐軍，積極佈置軍隊，準備進行大規模的侵華戰爭，企圖以武力一鼓征服全中國。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夜，日本帝國主義在北平附近的蘆溝橋，向中國駐軍進攻，當時駐守蘆溝橋的二十九軍將士，立即英勇抵抗，全國人心興奮，紛紛發出通電，請求南京政府出兵抗戰，南北各大報紙，皆一致主張迅速下定決心，發動全面抗戰。

七七事變爆發後，南京政府的當權者，仍希望「和平解決」，七月十七日，蔣介石在江西廬山發表談話，認為「蘆溝橋事件是否擴大為中日戰爭，全繫日本政府的態度，和平繼續之關鍵，全繫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後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由和平外交方法，求得蘆溝橋事件的解決。『同時申言』萬一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只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必不得已的辦法。）」

妥協之門既未閉，南京外交當局及華北政界皆積極與日本談判，商討和平解決的條件，親日派頭子汪精衛則公開其宣傳抗戰必敗論，他說：「戰呢！是會打敗仗的、敗了再打，打了再敗，敗個不已，打個不已。……」結果是「無論通都大鎮。無論是荒村僻野，必使人與地俱成灰燼……」。

中國共產黨於七七事變的第二天，即通電全國，指出：「不管日寇在蘆溝橋這一抗戰行動的結局，即將擴大成為大規模的侵略戰爭，或者造成外交壓迫的條件，以期導入於將來的侵略戰爭，平津與華北被日寇武裝侵略的危險，是極端嚴重了。」因此主張：「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我們要求立刻給進攻的日軍以堅決的反攻，並立刻準備應付的大事變，全國上下，應該立刻放棄任何與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與估計。」應該「立刻動員全國海、陸、空軍準備應戰。」同時紅軍將領亦聯名致電蔣介石，要求實行全國軍事總動員，紅軍全體將士，正枕戈待命，願為前驅。

日本帝國主義一方面向華北當局提出最後通牒，壓迫冀察政務委員會接受他的新要求，並聲明不擴大事態，地方事件由地方政府解決，以緩和華北的緊張局面，和麻痹南京政府。另一方針，則擴大北平

近郊的戰事，並大批調動朝鮮及關外駐軍，向平津進發、集中。不久，日本陸空軍向二十九軍猛烈進攻，包圍平、津，二十九軍無力支持，平津遂告陷落。

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大規模武裝進攻，並不以佔領華北為滿足，它想以速戰速決的方針，消滅中國主力軍隊，逼使南京政府投降，而於最短期間征服全中國，乃於八月十三日，藉口虹橋事件，突然進攻上海，南京政府在日寇堅決進攻與人心激憤的壓力下，開始定下了初戰的決心。八月十三日上海實行抗戰，十四日南京政府發表了抗日自衛的宣言，於是開始了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戰。

全面抗戰開始時，南京國民政府的內政外交，較前大有進步，八月，修改了『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釋放了沈鈞儒等救國會領袖，及一部分政治犯。八月二十二日，正式公佈改編紅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明令委派朱德、彭德懷為八路軍總副司令，蔣介石又發表了贊成國共二次合作的談話。同時，中國與蘇聯訂立了互不侵犯條約。因此，國內團結，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就正式形成。

中國共產黨，亦於此時發表了國共二次合作的宣言，並公佈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提出持久抗戰以爭取最後勝利的戰略方針。

中國四千餘年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全民族一致的神聖反侵略戰爭，這樣的開始了，從此中國的歷史，發生了急劇的轉變，在艱苦的長期抗戰中，部分的地區，日漸擺脫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變成了新民主主義社會（解放區），打敗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之後，經過繼續努力，自由的、獨立的、民主的、統一的、團結的、繁榮的新中國，就能實現了。

## 第二輯 論文選讀

### 一 大革命失敗後中共繼續戰鬥

#### 中共高舉起革命的大旗

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建議，召集了有共產黨人參加的第一次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訂出蘇俄、聯共、扶植農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黃埔軍校，實現了國共兩黨及各界人民的民族統一戰綫，因而在一九二五年，掃蕩了廣東的反動勢力，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舉行了勝利的北伐戰爭，佔領長江流域及黃河流域，打敗了北洋軍閥政府，發動了廣大的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人民解放鬥爭。但是到了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正當北伐戰爭向前發展的緊要關頭，這個代表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國共兩黨及各界人民的民族統一戰綫及其一切革命政策，就被國民黨當局的叛賣性的反人民的「清黨」政策與屠殺政策所破壞了。昨天的同盟者——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被看成了仇敵，昨天的敵人——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者，被看成了同盟者。就是這樣背信棄義的向着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來一個突然的襲擊，生氣蓬勃的大革命就被葬送了。從此以後，內戰代替了團結，獨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國代替了光明的中國。但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並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乾淨身上的血跡，他們又繼續戰鬥了。他們高舉起革命的大旗，舉行了武裝的抵抗，在中國廣大的區域內組織了人民的政府，實行土地的改革，創造了人民的軍隊——中國紅軍，保存了與發展了中國人民的革命力量。被國民黨反動份子所拋棄的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由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及其他民主份子承繼下來了。（論聯

### （合政府第三節）

x                    x                    x                    x

一九二七年的八月一日，我們的國家曾經是怎樣的黑暗阿！跟蔣介石在上海的四月叛變以後，汪精衛、孫科在武漢也舉行了七月叛變。一九二五年的大革命在全範圍內失敗了。以蔣介石為首的帝國主義走狗們，建立了比北洋軍閥更加依賴外國帝國主義，更加殘酷的壓迫剝削人民的南京反革命政府。大革命的主力共產黨人及其他民主份子和工農羣衆，到處遭受逮捕和殘殺，被縮小了的中國共產黨就在這個時候，如毛澤東同志所說：「從地下爬起來揩乾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他們又繼續戰鬥了。」正是這個小小的共產黨代表了我國四萬萬五千萬人民堅強不屈的求生意志和奮鬥傳統，他們的繼續戰鬥的第一聲，就是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的南昌起義，在朱德、賀龍、葉挺等革命將領領導下，出現了我國歷史上第一支完全屬於人民的軍隊，無數次悲慘的教訓終於使我國人民得到一個覺悟：就是爲了保自己的生存權利，實現自己的革命要求，就必須組織一支完全屬於人民的、立場堅定、勇敢善戰、紀律嚴明的徹底革命化的軍隊。（新華社社論：「人民解放軍二十週年」）

## 中國人民偉大的鬥爭

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到今年是二十週年了。這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頭子蔣介石集團公開反革命的日子，是中國人民不能忘記的日子。因爲這個反動集團從那時起，已經爲害二十年之久，使中華民族受制近百年來空前所未有的痛苦。

如果大漢奸曾國藩從頭至尾做反革命，那末袁世凱已經不同，他不能不一度假裝贊成民主共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最後一個代表，中國最後的一個大漢奸大封建主蔣介石，則在人格上比曾國藩、袁世凱還要卑鄙。他是「早年參加革命」的，他要靠「革命」來爬上去，靠「革命」來取得政治資本，否則就爬不上去，就沒有政治資本，翻



雲覆雨，背信棄義。一方面是無數的漂亮字句和諾言，另一方面是最殘暴的屠殺壓迫與剝削。所謂「好話爲先生說盡，壞事爲先生做完」，這就是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末代統治者的確切不移的寫照。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所以如此無恥，乃是這個反動階層將要死亡的表現，乃是中國人民覺悟提高與力量壯大的表現。

四一二慘案是最無恥的屠殺，沒有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沒有孫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聯工農三大政策，北伐是不可想像的；沒有中國共產黨黨員與許多國民黨革命份子在前線中和在各地領導人民起來響應，北伐的勝利是不可想像的：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上海八十萬工人的總罷工與起義歡迎，北伐軍進入上海也是不可想像的。在北伐過程中，蔣介石的一路是毫無戰功的，而且在南昌還打了一個很大的敗仗。一切功勞都是別人的，蔣介石要冒得功勞，已經是無恥之尤；然而蔣介石的狠毒竟到如此程度。這個對於自己的民族極端殘忍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對於帝國主義者又是怎樣呢？當時英國帝國主義的軍艦對南京轟了幾砲；另一方面又統了蔣介石大的賄賂，蔣介石就服從帝國主義的意志，向人民倒轉槍頭了。（新華社社論：「中國人民偉大鬥爭二十年」）

但是，帝國主義者和一切反動派的盤算，以爲經過蔣介石之手，便可以消滅中國的革命，而任他們爲所欲爲，這種盤算是愚蠢的，是完全錯誤了。中國究竟是英雄主義的偉大民族。中國人民能够打倒歷史上的一切暴君，能够在歷史上亡而復興，能够打倒袁世凱和後來的北洋軍閥，便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打倒蔣介石，推翻蔣介石主義，打敗一切帝國主義的侵略，而使中國獲得獨立自由與富強。偉大的毛澤東寫過這一段生氣勃勃的歷史：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並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乾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他們又繼續戰鬥了。他們高舉起革命的大旗，舉行了武裝的反抗，在中國廣大的區域內，組織了人民的政府，實行了土地的改革，

創造了人民的軍隊——中國紅軍，保存了與發展了中國人民的革命力量。被國民黨反動分子所拋棄的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由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及其他民主分子繼承下來了』（『論聯合政府』）。

誰是這人民的英雄鬥爭的領袖呢？不是別人，正是寫出這些英雄辭句的毛澤東。

這個偉大的中國英雄，從來認定農民革命乃是推翻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壓迫的基礎。如上所述，在大革命中，毛澤東堅持這一條農民革命的方向；正當蔣介石與汪精衛謀叛而使革命處在危急關頭的時候，毛澤東便大聲號召必須放手發動農民革命，繼續革命的進攻，以挽救革命的危急。而因為陳獨秀機會主義沒有接受他的政策，結果使中國人民遭受了蔣介石與汪精衛這個反革命的痛苦。大革命失敗的時候，毛澤東領導了井崗山的進軍，以抵抗蔣介石的屠殺；保衛革命的有生力量，打起土地革命的大旗，以建立中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更深厚的社會基礎。毛澤東在大革命失敗時期，經過農民土地革命，把正確的革命退却與正確的革命進攻結合起來。大革命的失敗，固然使革命從大城市退却下來，但革命失掉了城市，却舉行了向農村的進攻，却進行了武裝的農村革命，從農村包圍了城市。革命性質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革命進攻的直接目標是反對帝國主義的走狗——以蔣介石為首的叛賣革命的國民黨，反對封建地主階級，進攻的道路（是其內容，又是其形式）是土地革命，武裝鬥爭與建立革命根據地。所以，這個進攻，是比北伐戰爭時期進一步了。當蔣介石反革命的黑暗恐怖橫掃全國的時候，毛澤東和朱德引導中國共產黨全體黨員和革命工農兵，繼續了大革命時代的革命成果，向反革命下了這樣的攻擊令、鼓勵了全民族的希望。這是極大膽的攻擊，又是極清醒的攻擊。這個攻擊，開始還是『星星之火』，但後來就發展為『燎原之火』了。

（中國之命運）

紅軍的產  
生與發展

一九二七·八，一：爲保衛革命果實，回答「四一二」以後國民黨對人民的大屠殺，朱德，葉挺，賀龍，率領國民革命軍兩萬餘人，舉行南昌起義。紅軍自此誕生。

一九二七年秋冬：毛澤東同志領導湘鄂贛農民舉行秋收暴動，彭湃領導廣東海陸豐農民暴動，劉志丹領導陝西渭華暴動。蘇兆徵、張太雷領導廣州市工人暴動，成立廣州公社，開創了中國蘇維埃運動的新紀元，廣西、福建，江蘇各省也都爆發起農民運動，開始建立紅軍。

一九二八·五：朱毛井崗山會師，成立紅四軍，毛澤東手訂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規定中國工農紅軍的性質任務及建軍工作，打垮了國民黨三次進攻。

一九二八·七：彭德懷領導平（江）瀏（陽）暴動，成立紅五軍，拉上井崗山。

一九二八·十二：朱·毛下山東徵，開始建立蘇區，成立蘇維埃政權。

一九三〇：三軍圍打長沙，一軍攻南昌，蘇區形勢初步奠定。當時計有：中央蘇區（贛閩邊轄第一方面軍）、湘鄂邊蘇區（轄第二方面軍、閩浙贛蘇區（轄紅十軍），通南巴蘇區（川陝邊，轄第四方面軍），湘鄂贛蘇區（轄紅十六軍）、鄂豫皖蘇區（轄紅二十五軍、二十八軍），陝甘蘇區（轄二十六，二十七軍），湘鄂蘇區，廣東東江蘇區等共十九處（一九三〇年初統計），共有紅軍十三個軍，約六萬二千人（一九三〇年五月統計）

一九三一·一：紅軍粉碎國民黨十萬大軍之第一次圍剿，消滅張輝瓚主力，連師長在內全部九千人一齊殲獲。

一九三一·五，三十：紅軍粉碎國民黨二十萬人之第二次圍剿，十五天（自五月十六至三十日）走七百里打五仗繳槍兩萬餘。

一九三一·十：紅軍粉碎國民黨三十萬人並由蔣介石親自出馬任

總司令之第三次圍剿，連打三仗，打敗上官雲相，郝夢齡，毛炳文等三個師，繳械逾萬。乘其退却時，又消滅蔣鼎文一個旅，韓德勤一個師。

一九三一·十二，十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成立。

一九三一·十二，十四：國民黨二十六路軍在趙博生、董振堂領導下舉行寧都暴動，成立紅軍第五軍。

一九三三·五：紅軍向全國軍隊發表宣言，號召在三個條件之下（立即停止進攻蘇區與紅軍；立即給人民以民主自由——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示威等自由；允許人民有組織抗日義勇軍和武裝的自由）與全國武裝部隊訂立共同戰鬥的戰鬥協定。

一九三三年，春：紅軍粉碎國民黨四十萬人之第四次圍剿，一舉消滅四川，陳時驥兩個師，又於草苔岡消滅其另一個師，兩役繳槍萬餘。

一九三三，秋：國民黨發動近百萬人的第五次圍剿。

一九三四，七：紅軍派出北上抗日先遺隊，由方志敏、尋淮洲同志率領。

一九三四，十，十二：主力紅軍突破五次圍剿，奔赴抗日前線，舉行亙古未有的兩萬五千里長征。同時留下少數主力（二十四師三軍團）與紅色游擊隊地力伍裝。繼續在湘、贛、閩、鄂、豫、皖、粵、桂（即南方八省）各省邊境，堅持游擊戰爭，開始由項英，陳毅同志領導，敵人佔領中央蘇區後，紅軍的剩餘武裝就退入南嶺分散游擊。閩西一帶是譚振林，鄧子恢，張鼎丞同志領導堅持，閩東由葉飛同志領導堅持，湘贛由譚玉賢同志領導堅持，浙江一帶是項英，粟裕同志領導堅持，湘鄂中傅秋濤，鍾期光，張瀋同志領導堅持，大別山是紅二十八軍，河南是周駿鳴等同志領導堅持，粉碎國民黨無數次的搜剿。

一九三五，一：主力紅軍衝過烏江天險。

一九三五，二：主力紅軍衝過金沙江。

一九三五，四：主力紅軍通過裸棵區。

一九三五，五：主力紅軍強渡大渡河，槍渡瀘定橋。

一九三五，六：主力紅軍爬過雪山。

一九三五，七：主力紅軍爬過大草地。

一九三五，八：一、發表「爲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提出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建立國防政府，抗日聯軍與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等主張（即有名的八一宣言）。

一九三五，九：主力紅軍突破天險臘子口。

一九三五，十：主力紅軍與川陝邊四方面軍徐向前在吳起鎮（陝北靖邊縣南二十里）勝利會師，紅軍到達抗日前進陣地——陝北。

兩萬五千  
里長征

自一九三四年十月起，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止，中國工農紅軍完成了兩萬五千里長征，一年中，紅軍主力遍走了福建、廣東、江西、湖南、貴州、雲南、四川、西康、甘肅、陝西十一省，擊潰反動派四百一十個團，數十萬敵軍、土匪、反動民團，佔領了五十四個中心城市，跋涉千山萬水，通過不毛之地，終於勝利的到達前進抗日陣地——陝北。

紅軍走的道路是迂迴曲折的；革命的道路也是迂迴曲折的，武裝在長征中經歷了多次艱難困苦，勞動人民的子弟，在苦鬥裏飽嘗了寒酸酸幸，偉大的中國工農紅軍，從革命實踐的嚴格訓練裏，贏得了光輝的勝利，成爲中國革命的一支鐵流。

### 衝過烏江天險

一九三四年十月，紅軍主力從江西出發。

三十五年一月，到達貴州的中部，冬夜的烏江，水流是湍急而寒冷的，紅軍必須渡過這前進途中天險的水障。

對面的敵人擁有四個團的兵力，他們晝夜的監守着江面，船隻是早已被燒光了。

這時在紅軍中有一個連隊，他們聽了首長動員「突破烏江天險，

創造渡江英雄」之後，竟全體要求首先渡江。經過一翻挑選，十八名年青的共產黨員站了起來，他們每人帶了一枝駁殼槍，脖子上繫了一棵炸彈，奮身跳進冰冷的浪濤里，向對岸敵人的陣地游去。他們悄悄的登岸繞到了敵人背後，敵人還在睡夢中，十八個英雄一聲喊殺槍聲齊起，守江敵人的一個排哨，已經被衝散了，英雄們佔領了險要渡口，此時紅軍大隊人馬迅速從剛剛築成的橋上沖過江去。

### 巧計奪取金沙江

沖過烏江天險，紅軍主力進抵雲南境內到達金沙江時，江口又為敵人嚴密封鎖。

金沙江的形勢更加險惡，兩岸高山蔽日，崖石陡峭，江口收集的四隻渡船還被敵軍扣在對岸，紅軍在這裏又遭到了嚴重的困難。

從俘獲敵人口中，紅軍了解了敵人的一切情形和兵力佈置，很明顯，根據現有的條件，又是應設計奪取的。

劉伯承同志當即率領教導團，全部化裝成「中央軍」，巧妙的把對岸敵人的四隻渡船騙來了，又從另一個地方找到了十幾隻船，紅軍部隊從兩個渡口分別乘船渡江，衝上對岸，抄到敵人側後，猛烈的夾擊衝殺起來，敵人的一營守兵當發覺是紅軍時，已措手不及，被擊潰散了。

紅軍隨即控制了對岸高山，在先頭部隊的掩護下，全部紅軍安全都過去。

### 經過獯獯區

獯獯是中國西南少數民族之一，住在四川西南由冕寧以北到大渡河南岸，方圓百餘里的山地中，漢朝漢人為征服獯獯，諸葛亮曾七擒孟獲。由於統治者長期以大漢族主義向獯獯進行狡滑的壓榨，引起他們對漢人的仇視，他們尤其反對漢人「官兵」入境。

紅軍為了擺脫敵人的追擊，勝利完成北上，必須搶渡大渡河，並

決定取道獐獐區。

部隊裏首先進行了動員，說明無產階級的隊伍應該尊重和團結少數民族，應經過說服爭取和平通過。

但文化落後和懷着民族仇恨的獐獐，並不了解紅軍。他們結羣阻止紅軍的前進，甚至把掉隊的工兵連全部解除行裝，脫去衣服。雖然如此，而紅軍仍然使通司向他們耐心的解說，表明紅軍不是來擾害他們的，後來蕭華同志屢與談判，劉伯承同志又與獐獐首領小葉丹兄弟殺雞起盟，結為兄弟，表示願幫助他們，終於爭取團結了這一少數民族獐獐歡喜的接受了紅軍的好意，紅軍和平的通過了獐獐區。

### 強渡大渡河

從獐獐區進入漢地，紅軍順水推舟解除了一個反革命民團的武裝，先遣隊連夜兼程向大渡河進發，他們的任務是搶渡大渡河。

先遣隊一天一夜趕走了二百四十里，拂曉時，奪取了渡河點——安順場西岸唯一的一隻渡船被俘獲了。

河水每秒奔流四米突，洶湧、架橋已屬難能，唯一的希望便是依靠，便是僅有的一支渡船，他們找來八位老艚公，十八個共產黨員自報奮勇的參加了敢死隊，驚濤駭浪中，一葉扁舟，載着英勇紅色的戰士們飄搖的向對山中渡去。

艚公會敘述太平天國時的石達開的三十萬大軍，怎樣在這裏全部覆滅；但是艚公錯了，紅軍不是石達開，對岸的敵人守兵瘋狂的掃射小船，船底被槍彈貫穿，近岸時英雄們撒下滿水的船隻，飛躍登岸，花機槍立即掃向敵人。留在西岸的紅軍部隊齊聲吶喊助威，守的江一營敵兵敗北退走，新繳的三支渡船，把西岸的紅軍陸續運過大渡河。

### 搶奪瀘定橋

紅軍右縱隊在安順場強渡了大渡河時，左縱隊繞道趕向大渡河另一渡河點點一一瀘定橋，是大渡河上唯一的鐵索橋。

橋上的木板已被敵人燒燬，只剩下十三條鐵索赤裸裸的懸在河面，二十四名共產黨員充任了搶橋英雄，黃昏時分，開始奪還定橋。

在岸邊機槍，迫擊砲的掩護下，英雄們攀上鐵索，敵人的槍彈在河面上恐怖的飛嘯打擊着河上的鐵索，但彈雨阻止不住英雄；英雄匍匐在鐵索上迅速向對岸攀進。

守敵被隔岸紅軍猛烈而準確的砲火動搖了。一面喊着繳槍，一面燃燒橋亭。英雄們熄住烈火熾灼，穿過火障，登岸向守敵猛撲，正在挖鑿鐵索基的敵人，也被一起消滅了。

紅軍趕走橋頭的敵人，享受了他們遺下的晚餐。

### 爬 雪 山

在冕甯，迷濛的就可以望見大雪山，經過了兩星期的行軍，六月七日才到了大雪山脈南面一個高山——夾金山的山下。

夾金山在四川和西康邊境，山上終年積露，雪積最深的有十幾丈，山頂空氣稀薄，從來很少人從此經過。

到了雪山下，寒氣一陣陣向人襲擊，紅軍戰士都穿起所有的衣襖。有的人在打着寒顫，誰能相信這是七月的天氣？但是寒顫威脅不了英雄們的烈火。

山頂發着亮，紅軍的戰士開始往上爬，一個跟着一個，越往上爬呼吸越困難，雖然越累，但誰也不敢停止休息。

一位炊食員同志挑着担子，被一陣大風刮倒，接着便被冰雪埋葬了。

紅軍與嚴寒和危險搏鬥着，從深雪裏謹慎的跋涉着脚步，越過夾金山頂，白塚壘壘起伏綿互的大雪山，便留在紅軍背後了。

### 過 草 地

在四川西康青海邊境，紅軍進入一望無際的荒涼草原，這裏到處生長着一人多高的水草，地上儘是一尺餘深的泥濘，間或有強悍的番



民縱馬馳過，此外就絕少有人光顧這塊煩惱的地域了。

草原裏每天都是細雨紛飛，走路是異常困難的；有時不幸陷進泥灘，便喪掉生命；有時掉隊後高草迷惘，便再也趕不上隊伍；更使人戒備的，還有番民的突然襲擊。部隊斷絕了食糧，飢寒和疲倦折磨着紅軍戰士，夜晚，就找樹宿營，找些野菜充飢。有些同志餓得沒有辦法，連皮帶和草鞋的皮底也煮着吃了。

但紅軍堅定不移的鐵的意志，是任何困難削弱不了的。

經過四個月的繼續行軍，紅軍排除了一切困難和災害，終於完全脫離了荒涼的草地，到達岷山腳下。

### 突破天險臘子口

臘子口，這是紅軍完成北上任務的最後一道難關，鐵的隊伍又在這裏打擊了敵人。

已經是一九三五年的九月，紅軍部隊穿行在岷山峽谷裏，懸崖陡壁，怪石聳立，「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天險臘子口，顯現在岷高峯，戰士們拉緊了戰鬥的心弦。

勇猛的二營向臘子口進行了七次衝擊，以逸待勞的敵人，踞高臨下抗擊着紅軍，成羣的手榴彈在岩石上爆炸，山谷回響着極巨的共鳴，七次衝鋒仍然毫無進展。

夜，寂靜的月光籠罩着羣峯，紅色英雄們，用綁帶做了繩梯，艱難的攀登着陡峭的石壁。

守敵魯大昌曾驕傲的叫囂：「你們打到明年也不要想通過我魯司令的防區臘子口」拂曉，當攀上高峯的紅軍奮勇隊前後夾擊突然向他衝殺的時候，魯大昌的狂妄變成狼狽了。

紅軍突破天險臘子口，又摧垮了敵人的第二綫石崖陣地，繼續撲向岷州城。

一九三五年十月，紅軍到達陝北，萬千的紅軍在吳起鎮會師了。

紅軍戰士帶着長期奔波的風塵和沿途鏖戰的辛勞，歡欣的聚集在

一起，親愛的戰友們會見了；該是怎樣的興奮鼓舞啊！

他們回憶着，難忘一年裏，他們怎樣衝過了烏江天險，怎樣巧妙的奪取人？沙江，怎樣神奇的通過了裸裸區，怎樣強渡過浪濤翻滾的大渡河，怎樣從彈雨裏攀過了瀘定橋；雪山草地的生活確實是困苦的，臘子口的突破又是怎樣的艱難啊！——但這一切都已經過去了，紅軍終於從千難萬難裏走了過來，為苦難的中國殺出一條血路。

光榮的長征結束了，中國工農紅軍匯集了自己的隊伍，整齊步伐，奔向中國西北抗日前綫！開拓革命鬥爭的新紀元。（中國人民解放軍英勇奮鬥二十年）

## 毛主席在土地革命時代

紅軍的情況在物質和政治兩方面，都開始有進步了，但其中還有許多惡劣傾向，例如：「游擊主義」就是一個弱點，這反映了訓練的缺乏，民主政治的誇大，觀念和組織的鬆懈等等。還有另有一個傾向不得不與之搏鬥，就是『流氓性』——不喜歡在政府的嚴重工作中安身，喜歡變動和新的事變。還有一種是軍閥主義的殘餘，有些官長虐待甚至毆打弟兄，並且隨意反對自己個人所討厭的人，而對其餘的表示好感。

許多這樣弱點，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閩西的一個會議召開後，都一一克服了。會議討論了各種改進的理想，消除許多誤解，並採取新的計劃，這樣奠定了紅軍中崇高的思想領導的基礎，在這以前這些上面所提過的傾向是非常嚴重的，並且為黨中托派和軍事領袖所利用以削弱這運動的力量。同時，進行了一個對托派的猛烈鬥爭。有好多人被剝奪了他在黨中和軍隊中的官職，我們發揮了他們在戰時當領紅軍陷入艱難的地位，企圖毀壞紅軍，在這次敗仗以後，他們的計劃是十分明顯了。經驗表示了他們的錯誤，將他們從負責的職務中革除，並且在這個會議後邊就失勢了。

福建會議開闢了建立江西蘇維埃政權的道路，次年贛南全部落入

紅軍手中，一九三〇年二月七日一個重要的地方會議在贛南召開，討論蘇維埃以後的綱領，到會的有黨軍政的地方代表。會中土地政策經過長時間的辯論，而對『機會主義』（爲反對重新分配土地的人所領導）的鬥爭是克服了。大會決議實施土地分配和成立蘇維埃，當時紅軍只是成立了地方蘇維埃和縣蘇維埃，在大會上大家決議建立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於瑞金，對於這個新的綱領，農民報以熱烈的援助。

漸漸地，紅軍對羣衆的工作進步了，軍紀加嚴，而組織羣衆的新技術，也在發展起來。早在井崗山時，黨軍已經對戰鬥員訂下了三個簡單的規則，即服從命令、不沒收任何貧農的財產，將一切沒收地主的物品立即交給政府處置。在一九二九年的會議後，對於取得農民幫助的工作異常努力，在上述的三種條件之外另加了八項規則：當你離開一個人家，將一切門板（睡覺用）放到原處，歸還你所睡的草蓆並將它捲好，對老百姓要謙和並隨時加以幫助，歸還一切借用的物品，賠償一切損壞的物件，和農民以誠相待，購買一切物品須付錢，講衛生尤其是在距離人家很遠的地方設立廁所。

這八點的施行，愈來愈見成功，到今天還是紅軍士兵的規律，要他們記憶並時時復誦，另有三種任務交給紅軍，當作它基本宗旨的：第一、誓死與敵人鬥爭，第二、武裝羣衆，第三、有錢幫助戰爭。

除開這種運動的政治基礎還不算，紅軍的戰術也進步了，這是順利的軍事發展的原因，在井崗山時，我們有四個口號，都是游擊戰術的主要方法，紅軍就是靠了它發展起來的。這些四個字一條的口號是「敵進我退」「敵停我援」「敵避我攻」「敵退我追」，最初爲許多人所反對，他們不主張採用這種戰術，可是許多經驗證明它們的正確，凡是紅軍脫離了這種戰術的時候，普通總是失敗的。紅軍的人數很少，比敵人少一二十倍，他的資源和軍需是有限的，所以，只有巧妙的把計策和游擊戰術聯合起來，才有希望戰勝有着廣大富庶根據地的敵人。

紅軍戰術中最重要的就是，能在攻擊時集中它的主力，而隨後能

更加迅速的分散，這就是說要避免陣地戰，而在運動中要用盡各種方法和敵人的部隊接觸，並且擊潰他，根據這種方策，雖然許多有經驗的軍人不讚成，紅軍發展了這種神奇的運動戰，即迅速而有力的「速戰」。

在一般的發展蘇維埃區域，紅軍是偏於一種「波浪式」的發展的，而非常不平衡的前進，即以跳躍獲得前進，並且鞏固所佔領的土地，這種政策是切乎實際的，正和上述的戰術一樣，是從多年的集體的軍事政治的經驗而來的。這些戰術受當時中國共產黨書記李立三的嚴厲批判，他說紅軍的方法是一種「新的右傾主義的傾向」，李立三希望攻擊而不要防禦，前進而不要鞏固後方，到大城市加以驚人的攻擊，伴隨着反動和極端主義，當時，李立三路綫把持了蘇維埃區以外的黨部，並且勢力很大，並在某種程度上强迫紅軍接受這種路綫，不顧在戰地中官長的判斷，其結果為進攻長沙和進攻南昌，可是在這次冒險中，紅軍並沒有停止游擊隊的活動和打開它的後方讓敵人進來。

一九二九年秋，紅軍移到贛北，攻擊和佔領了許多地方，並擊退敵軍多次。當紅軍距南昌臨近時，它突然折向西面進攻長沙，在這次行軍中，他們與彭德懷的部隊會合，彭已經佔領過一次長沙，不過終因受強大優勢敵人的包圍而退却，彭是一九二九年四月退出長沙的，此後即在贛南一帶活動，結果大大的增加了他的軍隊，一九三〇年四月他在瑞金會與朱德和我會合，並在一個會議後，決定響應在湘贛邊區活動，後朱德和我則移到福建去。一九三〇年六月，我們重新建立了聯絡，並開始第二次總攻長沙，我們的軍隊則合併為第一方面軍，以朱德為總司令，我為政治委員，在這種領導下。我們到達了長沙城外。

這時中國農工革命委員會組織起來，我被推為主席，當時紅軍在湖南的勢力很廣大，在江西也差不多，我的名字流傳於湖南農民之間，因為抓獲到我有十萬重賞。不論生死，還有朱德和其他共產黨員，我在湘潭的土地（靠了這個地租，我在大革命時代曾用以組織湖南的

農民暴動)現在爲反動政府沒收了,我的妻妹以及我兩個兄弟的妻子和我自己的兒子,都被拘捕起來,我的妻和妹被處決,其餘的後來都釋放了。

紅軍的威信在農民中一天天增高了,而且竟達到我的家鄉湘潭,因爲我聽說,當地農民都相信我不久就要回轉家鄉,并有一天,一架飛機飛過時他們斷定這就是我,他們警告耕種我的土地的人們說我已經回來視察我的田莊,看看有沒有樹木被砍倒,如被砍倒的話,他們說,我要向蔣介石先生索償!

不過第二次進攻長沙失敗了,大批援軍開來,城中駐紮了大軍,此外在九月間,新的敵軍源源開來攻擊紅軍,在這次圍攻中,只發生了三次主要的戰爭,此役我們消滅敵軍兩旅。不過,我們並沒有能攻下長沙城,在幾週後,我們都又回江西去了。

這次失敗,幫助我們毀壞「李立三路線」並拯救了紅軍使它沒有向武漢進攻,這是當時李立三所要求的,當時紅軍的工作是招募新兵,開闢新的蘇維埃區,尤其是鞏固整個已經落入紅軍手中的區域的蘇維埃政權,因爲這一類計劃,如進攻長沙,並非急務而切含有機會主義的原素,不過,第一次佔領後而且作爲暫時的舉動,不想守這個城和建立一個政權,它的影響可說是有益的,因爲革命運動所引起的反應是非常大的,所謂錯誤是關於戰略一方面的,就是在後方的蘇維埃政權沒有鞏固時,企圖以長沙爲根據地。

但李立三將當時紅軍的戰鬥力量和民族政治背景的革命因素估計過高,他深信革命已接近成功,而且不久就可取得全國的政權,這種信仰更因受了當時的久長而疲竭的內戰的鼓勵,它使前途好像大大地偏護李立三,可是紅軍的意見以爲敵人正在準備大舉進攻蘇維埃,只要內戰不停止,而現在不適用於艱險的「盲動主義」和冒險。

在湖南事件之後,紅軍回到江西,尤其是佔領吉安之後,在軍隊中,李立三主義被克服了。李本人錯誤已經證明,不久他便失去在黨中的勢力(李現在莫斯科研究),不過在李立三主義確定地埋藏以前

在軍隊中有一個很危險的時期，一部份軍隊傾向李的路綫，並要求其他軍隊脫離。不過，這一部份的指導員——彭德懷猛烈地與這種傾向搏鬥，並能維持他的部下的統一，和對高級指揮的忠誠，還有一些紅軍部隊公開叛亂了，並逮捕許多官吏，並根據李立三路綫政治的攻擊我，這件事在富田發生，就叫富田事變。富田靠近吉安——當時蘇維埃區的中心，這件事產生了一種激動，許多人都以為革命的前途，全要看次戰鬥結局如何了，但，因了黨部的健全，紅軍的忠誠和農民的支助，這次叛變也就很快鎮壓下去了，為首的被逮捕，其餘叛徒都經繳械消滅，我們的路綫重新加強，堅決地鎮壓李立三路綫。結果，以後的蘇維埃運動獲得了重大的進展。

現在反動政府澈底感覺到江西蘇維埃的革命潛力之大了，在一九三〇年底開始對紅軍的第一次的圍剿，敵軍共有十萬人，開始包圍紅區，分五路進犯，當時紅軍共動員四萬人來對抗這些軍隊，靠了巧妙地利用計策戰術，我們克服了第一次圍剿，獲到了絕大勝利，依據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戰術，我們以主力分別攻擊，各個擊破，讓敵軍深入蘇維埃領土，然後以超越的人數對隔離的部隊突然加以攻擊，佔據了優勢的陣地，我們可以包圍敵人，這樣反轉了數量遠佔優勢的敵軍的戰略利益。一九三一年一月間，第一次圍剿完全失敗，我相信假若紅軍在這以前沒有能得到以下的三個條件，勝利是不可能的。三個條件是：在集中指揮下的我們力量的鞏固，李立三路綫的清算，和黨部對肅清紅軍及蘇區中的AB團及反革命份子的勝利。

休息了只有四個月，第二次圍剿開始了，由現任軍政部長何應欽作最高指揮，他的軍隊超過二十萬，分七路進攻蘇區，一時蘇區的情勢好像很危險，因為蘇區政權非常弱小，資源有限，而且敵軍的物力幾乎各方面都遠勝蘇區，但，紅軍仍就抱定了前次得勝的同一戰略應付這一次進攻，讓敵軍的縱隊深入蘇區後，我們的主力突然集中在敵軍第二路，打敗了好幾團，並摧毀了它主要的進攻力量。在我們攻擊以後，馬上接二連三地依次擊敗了第三第六和第七路，第四路不戰而

退，第五路一部份被毀，在十四日之內，紅軍作戰七次，行軍八日；以決定的勝利結束。隨着大路的崩潰或退却，第一路蔡廷楷是指揮之一，沒有大打就退了。

三個月後，以三個最有能力的指揮為輔，蔣介石先生率領三十萬人作「赤區的最後一次的清剿」。蔣企圖以狂風驟雨的方法掃蕩「赤匪」，他開始每天只八十里的行軍進入蘇維埃領土的心臟，這恰恰給予了紅軍所最擅長的戰鬥條件，它立即證明了蔣的戰術嚴重錯誤，以僅有三萬人的主力，靠了一串燦爛的戰略，我們的部隊在五日之前攻擊了五個不同的縱隊，在第一戰，紅軍俘獲許多部隊和大量軍火，大砲和軍需品，到了九月，第三次圍剿已經失敗，十月間蔣撤回他的軍隊。

現在紅軍進入了一個較為平和，及充根的時間，很快的擴展起來。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第一次蘇維埃大會召開，建立了蘇維埃中央政府，我為主席，朱德被選為紅軍總司令。四月，寧都暴動發生，萬餘反動政府軍叛變而加入紅軍……。

現在，紅軍開始它自己的攻勢，進擊了好幾個城市，從一九三二年起一直到長征西北為止，我個人的時間幾乎全部限於蘇維埃政府的工作，軍事指揮交給朱德和其他人。

一九三三年四月，第四次圍剿開始，也許是最艱險的一次，在第一戰，敵軍兩師被繳械，兩個師長及三萬人被俘，另一師，當時最精銳的一師，接着被消滅，幾乎全部被繳械，師長重傷，這些捷戰證明了決定的特點，第四次圍剿不久就結束了。

到了第五次，最後一次圍剿，蔣動員了近百萬的人並採用了一個新的戰略和戰術，在第四次圍剿時，蔣已經採用德國顧問的建議，開始利用封鎖和堡壘制度。到了五次圍剿，他把全部信賴都放在這上面，用他的軍隊來實施嚴厲的封鎖和整個的包圍蘇區，他謹慎地推進，一面建造汽車路，堡壘和壕溝，避免主力 and 紅軍接觸，並且僅僅地在堡壘的後面作戰，只是完全在飛機大砲和機關槍的掩護下作短短的推

進。

這時期，我們講了兩個大錯，第一是在一九三三年閏變時未與蔡廷楷的隊伍密切聯合，第二是採取了單純的防衛的錯誤戰略，放棄以前用計誘敵的策略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要想與佔優勢的軍隊作陣地戰，在這方面，無論在技術上或精神上，紅軍非所長。

因了這些錯誤的結果和新策略，加以在數量上，技術上遠勝紅軍的敵軍，紅軍不得不於一九三四年，企圖改變它在江西的生存條件，因為它很快地惡化起來了。而當時民族政治的情勢，也影響了我們到西北活動的決議，在日本侵略滿洲和上海之後，蘇維埃政府早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就和日本正式宣戰了。自然這種宣戰在當時是不能發生效力的。跟着我們又發表宣言，號召中國各軍結成聯合陣綫。以抵抗日本帝國主義。早在一九三三年蘇維埃政府就宣佈它情願據三個條件和任何軍隊合作。這三個條件是，停止內戰和對蘇維埃及紅軍的攻擊；保障羣衆結社集會言論的自由和民主的權利；武裝人民對日作戰。

這個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圍剿，開始於一九三三年十月。一九三四年一月，第二次全國蘇維埃大會在蘇維埃首都——瑞金召開，對過去革命的成就加以檢討，會中我作一個長報告，並在會中選了今日蘇維埃中央政府工作人員，不久長征的準備就開始了，這是一九三四年十月着手的。恰在發動第五次圍剿一年之後。

一九三五年一月，紅軍主力抵×河，接下去四個月，紅軍幾乎一直在流動之中，並且發生了最激烈的戰爭，經過許多許多困難，跨越幾個最高最險的山道，經過土番所居的地方，經過無限的草原，經過嚴寒和酷熱，經過風雪和暴雨，後面追着全部敵軍的一半，經過所有這些天然的障礙，沿途和廣東、湖南、廣西、貴州、雲南、西康、四川、甘肅和陝西的地方軍隊作戰，最後，在一九三五年十月，紅軍到達了陝西，並建立了在中國的偉大的西北根據地。

這次紅軍光榮的進軍和勝利地到達陝西，第一是因為共產黨的正



確領導；第二是因爲蘇維埃人民基本組織的偉大技巧，英勇堅決和幾乎是超人的忍耐力和革命的熱忱，中國的共產黨在以前、現在和將來，將永遠忠誠於馬——伊主義，並對每一個機會主義鬥爭，這種決心，解釋了他的不可克服性和它的最後勝利的必然。它的不可克服性的另一理由，就是在革命組織中的人材的特別精幹英勇和忠誠，許多許多的優秀同志，許多獻身於革命的人，在一個宗旨下工作，同時也造成紅軍和蘇維埃運動。而那些未來，將要達到它的最後勝利。

## 朱總司令在土地革命時代

### 大無畏的精神

北伐當中，朱總司令在南昌辦軍官教育團、辦工會、辦農會訓練班，後來共崗山上的幹部，多半是在這裏訓練的。北伐第二年（一九二七年）四月間，賣國賊蔣介石叛變革命，殺開上海工人了。六月，總司令便被南昌的反動派趕了出來，七月裏，他又悄悄跑回南昌，同葉挺，賀龍同志組織「八一」起義。朱總司令那時帶着教導員三百來人，同反革命軍隊打仗，總是打前鋒。反革命勢力大，紅軍又要打仗，又要籌款、做宣傳，可是却打得很頑強。有一次，朱總司令帶一個營，打敵人三個團，一直打了八點鐘。又有一次，敵人用全力來打他，連攻了五次，都沒有攻過來，總司令帶的隊伍很少，堅持的時間却很长。後來，南昌起義的主力，在廣東打了敗仗，朱總司令雖是和二十五師守三河壩，打了三天三夜，把敵人進攻的三個師打退了。反革命因有帝國主義援助，工農紅軍又是剛剛生長，南昌的起義畢竟還是失敗了。當時紅軍才剩下幾百人，大家都以爲小部隊絕對不能同反革命大軍打，許多人都悲觀得很，開了小差，朱總司令却一點也不悲觀，他有一種大無畏精神，就是不怕任何帝國主義，不怕任何帝國主義同反動派結合的勢力。當時他把起義失敗的幾百殘兵收拾起來，對他們說：「只要有十個人十桿槍把革命幹下去，就一定能夠幹下去，現在

我們有幾百人，幹下去就能發展到幾千，幾萬，幾十萬人。中國革命是有前途的，願意革命的跟我來！」那幾百人都被這大無畏精神感動了，大家就跟着朱總司令從廣東打到江西，後來就到了井崗山同毛主席會合，編成紅四軍，朱總司令當軍長，毛主席當黨代表（就是今天的政委）。從此，國內同國外，都知道中國有朱毛紅軍。

### 朱德扁担

井崗上在江西甯崗縣，彎彎曲曲，重重疊疊，隊伍每天上上下下去挑糧食，朱總司令也砍了一條扁担，同大夥兒一道去挑，每天來回兩三次。扁担上面，還寫了「朱德扁担」四個字。紅軍士兵看見自己的軍長，和他們一樣的不辭艱苦，十分興奮，大家幹的很起勁，還編出了這樣一首歌：「朱德挑穀上坳，糧食絕對可靠，粉碎敵人圍剿，且聽歌聲載道。」井崗山人紅軍的生活，吃的穿的，官兵一樣總司令衣服很舊，熱天也是短褲裹腿，和戰士一樣樣。只有在打仗的時候，身上多一付望遠鏡。有一次司令部裏殺了一頭牛，士兵沒有吃肉以前，朱總司令只喝一點肉湯。

紅軍在這裏打垮過反革命的三次圍剿，最初反革命還隔得很遠，後來紅軍在山上，反革命的軍隊便在山下，講話唱歌都聽得到。沒有飯吃，就吃南瓜，有人講：「打倒資本家，天天吃南瓜，」沒有蓋的就蓋稻草，晚上就把稻草蓋起，外面遮一個門板，門一打開滿屋都是稻草，人一走進去，稻草下面就會叫起來：「你踩着我的頭了！」反革命時常叫罵：「毛澤東，朱德，有膽量下山來！」要紅軍去拚命。紅軍却回罵他：「反革命有本領上山來拚，打開井崗山金子銀子多得很多！」朱總司令在當時，就是拿這樣艱苦奮鬥的作風，反對了拚命主義同逃跑主義，保存下革命種子。

### 伙夫頭

紅軍在湖南時，有一天，朱總司令帶了一連人，路上過一個地方

。天黑了，大家疲倦得不行，便在那裏歇下。那知到了半夜，那地方。反革命地主武裝——民團却打來了，三四百匪把朱總司令的一連人包圍住，朱總司令帶着他這半睡半醒的一連人，從幾個地方往外衝。衝到後來，朱總司令剛從一個窗口跳出來，却迎面碰着一個民團隊長，那隊長問他：你是做什麼的？朱總司令用手一指說：朱德往那面去了。那個隊長朝他指的方向跑，朱總司令自己却往相反的方的跑出來。事後，隊伍裏的人。都親愛地取個綽號叫「伙夫頭」)

朱總司令還常對同志們講：「作一個黨員，首先就要遵守黨章的第一條，那就是：服從組織。如果組織上要我去當伙夫，我統去當，我也真的會作菜。」

### 鄙視敵人

在井崗山上的時候，朱總司令同毛主席，有一次曾經打退江西蔣匪兩個師的進攻。那兩個師長，一叫楊如軒，一叫楊池生。當時紅軍裏有兩句歌謠是：「紅軍不費三分力，打垮江西兩隻楊。」兩楊匪軍，寫了許多標語，笑朱總司令是抬轎出身的，朱總司令打完仗後，對部隊講話說：說我是抬轎子的轎夫出身，很好。那是勞動人民，無產階級。如果說我是軍閥出身，那就不得了了。

蔣介石賣國賊：那時幾次發動大軍來圍剿蘇區紅軍，每次都要懸賞「捉拿」毛主席和朱總司令，說：如有割下他們的頭來獻的，賞洋多少萬，賞格起初是五千元，後來加到五萬元，後來又加到二十五萬元。聽到這些說法時，朱總司令只是很鄙視的對部下說：「現在我在銀行裏的存款有好幾萬元了呀！」大家聽了都笑起來。

### 同張國燾作鬥爭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朱總司令帶領江西的紅軍，衝破反革命五次圍剿，到北方來抗日，這就是有各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在長征的路上總司令留在西康的第四方面軍裏，那時，第四方面軍還由叛徒張國

黨領導，張國燾不服從黨中央的決定，還叛變黨；組織他自己的「中央局」。朱總司令一個人，一面同張國燾作不妥協的鬥爭，一面說服全體幹部堅持黨的北上抗日路線。一九三六年六月，任弼時、賀龍、向應同志帶領的第二方面軍到了西康，朱總司令就率領着留在西康的全部紅軍，經過大草地長征，到達陝甘甯，同毛主席、彭德懷同志率領的第一方面軍會合。（藍田：朱總司令的故事）

## 二 毛澤東同志的戰略思想

中國資產階級本來是也受着帝國主義壓迫的，他們也曾經領導過光榮的革命鬥爭，也曾經在革命中起過主要的或部份的領導作用，例如：辛亥革命，北伐戰爭與當前的抗日戰爭。但是，他們曾經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六年這一個長時期內勾結帝國主義，並與地主階級結成反動同盟，背叛了曾經援助過他們的朋友——共產黨，無產階級，農民階級與其他小資產階級，背叛了中國革命，變成了人民的公敵，造成了革命的失敗。所以當時革命的人民與革命的政黨（共產黨），曾經不得不把資產階級也當作革命對象之一。在抗日戰爭中，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一部份，以汪精衛為代表，已經叛變，已經變成漢奸，所以抗日的人民也已經不得不把這些背叛民族利益的大資產階級份子當作革命對象之一。

由此可明白，中國革命的敵人是異常強大的。中國革命的敵人不但有強大的帝國主義，而且有強大的半封建勢力，而且在一定時期內還有勾結帝國主義與半封建勢力以與人民為敵的資產階級。因此，那種輕視中國革命敵人力量的觀點是不正確的。

在這樣的敵人面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與殘酷性就發生了。因為我們的敵人是異常強大的，革命力量就非在長期間內不聚積與鍛鍊成爲一個足以最後戰勝敵人的力量，因為敵人對中國革命的鎮壓是異常殘酷的，革命力量就磨鍊與發揮自己的頑強性，不能堅持自己的陣

地與奪取敵人的陣地。因此，那種以爲中國革命力量瞬間就可以組成，中國革命鬥爭頃刻就可以勝利的觀點是不正確的。

在這樣的敵人面前，中國革命的方法，中國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須是武裝的，也就決定了。因爲我們的敵人不給中國人民以和平活動的可能，中國人民沒有任何的政治自由。斯大林說：「中國革命的特點是武裝的人民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異常正確的規定。因此，那種輕視武裝鬥爭，輕視革命戰爭，輕視游擊戰爭，輕視軍隊工作的觀點是不正確的。

在這樣的敵人面前，革命的特殊根據地問題也就發了。因爲強大的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反動同盟軍，總是長期地佔據着中國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隊伍不願意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妥協，而要堅持奮鬥下去，如果革命隊伍要準備蓄積和鍛鍊自己的力量，並避免與強大敵人在力量不够時作決定勝負的戰鬥，那就必須把落後的農村造成先進的鞏固的根據地，造成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文化的偉大革命陣地，藉以反對利用城市進攻農村區域的凶惡敵人，藉以在長期戰鬥中逐漸爭取革命的全部勝利。在這種情形下面，由於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農村經濟不完全依賴城市）。由於中國土地的廣大（革命勢力有迴旋的餘地）。由於中國反革命營壘內部不統一和充滿着各種矛盾。有於中國革命主力軍的農民的鬥爭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這樣，就使在一方面，中國革命有在農村區域首先勝利的可能；而在另一方面，又造成了革命的不平衡狀態，而使爭取革命全部勝利的事業帶來了長期性和艱苦性。由此也就可以明白，在這種特殊根據地上進行的長期革命鬥爭，主要的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農民游擊戰爭。因此，忽視以農村區域作革命根據地的觀點，忽視對農村進行艱苦工作的觀點，忽視游擊戰爭的觀點，都是不正確的。

但是着重武裝鬥爭，不是說可以放棄其他形式的鬥爭；相反，沒有武裝鬥爭以外的各種形式的鬥爭相配合，武裝鬥爭就不能勝利，着重農村根據地上的工作，不是說可以放棄城市工作及尙未成爲根據地

的其他廣大農村中的工作；相反，沒有城市工作及其他農村工作，革命根據地就處於孤立，革命就會失敗，而且革命的最後目的，是奪取作為敵人主要根據地的城市，沒有必要的足夠的城市工作，就不能達此目的。

由此也就可以說明，為要使革命在農村與城市都勝利，不破壞敵人鬥爭的主要工具即敵人的軍隊，也是不可能的。因此，瓦解敵軍的工作就成為極端重要的工作。

由此也就可以明白，在敵人長期佔領的反動的黑暗的城市與反動的黑暗農村中進行共產黨的宣傳工作與組織工作，不能採取急性病的冒險主義的方針。必須採取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其領導人民對敵鬥爭的策略，必須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公開合法的法律命令及社會習慣所許可的範圍，從有理、有利、有節的觀點出發，一步一步與穩紮的去進行，決不是大喚大叫與橫衝直撞的辦法所能成功的。

。（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第二章）

△                      △                      △                      △

一九二七年至現在的蘇維埃戰爭，是在新的情況之下進行的。戰爭的敵人，不但是帝國主義，而且是大資產階級與大地主聯盟的統治。民族資產階級則做了大資產階級的尾巴。領導戰爭的，惟一的只是共產黨。共產黨的這種絕對領導權，是使戰爭堅持到底的最主要的條件，沒有共產黨這種絕對的領導，是不能設想戰爭能有這樣的堅持性的。

中國共產黨是英勇堅決的領導了中國的革命戰爭，在十五年的長歲月中，在全國人民面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為了保護人民的利益，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火綫的最前綫。

中國共產黨以自己難苦奮苦的經歷，以幾十萬英勇黨員幾萬英勇幹部的流血犧牲做代價，在全民族幾萬萬人中間起了偉大的教育作用。中國共產黨的這一偉大的歷史成績，使得今日處在亡國滅種的緊急關頭有了救亡圖存的前提條件，有了一個為大多數人民所信任

的，被人民在長期間內考驗過因此選中了政治領導者，現在共產黨說的話，比其他任何政黨說的話，都易於為人民所接受，沒有中國共產黨過去十五年的艱苦奮鬥，挽救新的亡國危險是不可能的。

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戰爭中，除了犯過陳獨秀主義與李立三主義兩個錯誤之外。還犯過了下述的兩個錯誤；其一，是一九三二——一九三五年的左傾機會主義，這個錯誤使得蘇維埃戰爭受到嚴重的損失產生了五次圍剿不能戰勝，反而喪失蘇區削弱了紅軍的結果，這個錯誤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的遵義會議時糾正過來了，其二，是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張國燾的右傾機會主義，這個錯誤發展到破壞了黨與紅軍的紀律，使一部分紅軍遭受嚴重的損失；然而由於中央的正確領導，紅軍中黨員與指戰員的覺悟，終於也把這個錯誤糾正過來了，所有這些錯誤對於我們的黨我們的革命與戰爭；當然是不利的然而我們的黨與我們的紅軍，却從這些錯誤中鍛鍊得更加堅強了。

中國共產黨領導了，而且繼續領導轟轟烈烈光榮勝利的革命戰爭，這個戰爭不但是解放中國的旗幟。而且是具備着國際革命的意義，世界的革命人民都把眼睛望着我們。在新的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階段上，我們將引導到中國革命的完成後也將給東方及世界的革命以深刻的影響，在過去的革命戰爭中證明，我們不但需要馬克斯主義的正確的政治路線，而且需要馬克斯主義的正確的軍事路線，十五年的革命與戰爭，已經鍛鍊出來這樣的政治路線與軍事路線了，今後的革命戰爭的新階級上，我們相信使這樣的路線根據新的環境，更加發展充實，與富豐起來，達到戰勝民族敵人之目的，歷史告訴我們政治與軍事的路線，不是自然的平安的產生，與發展起來的，而是從鬥爭中產生與發展起來的，一方面同左傾機會主義作鬥爭，另一方面同右傾機會主義作鬥爭，不同這些危害革命戰爭的有害傾向作鬥爭，並且澈底的克服他們，正確路線的建設與革命戰爭的澈底勝利，是不可能的，我在這本冊子中時常提錯誤方面的意見，就是爲了這個目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第二章）

△                      △                      △                      △

「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由於蔣介石汪精衛背信棄義地對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突然襲擊，『生氣勃勃的中國大革命就葬送了。從此以後，內戰代替了團結，獨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國代替了光明的中國』。在十七年即一九二八年十月間。毛澤東對於蔣介石叛變革命後各階級間的情勢，作過以下明確的分析：

『現在國民黨新軍閥的統治，依然是城市買辦階級與鄉村豪紳階級的統治，對外投降帝國主義，對內以新軍閥代替舊軍閥，對工農階級經濟的剝削與政治的壓迫比從前更加厲害。從廣東出發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半路被買辦豪紳階級領導了去，立即跑向反革命路上，全國工農平民以至資產階級，依然在反革命底下，沒有得到絲毫政治上經濟上的解放』。

這裏是說：大革命失敗後蔣介石所代表的政權，乃是買辦豪紳的政權，也即是大洋行買辦與大封建奴隸主的政權。蔣介石的反革命，乃是大資產階級的買辦性與封建性的必然走到的結果，而在他叛變之後，他就直接表現為公開的大買辦與大地主的代表人。大資產階級叛變以後的政權並不是資產階級的政權，而是必然成為大買辦與大封建地主反革命聯盟的政權。自由資產階級（特別是它的右翼份子）附和了和參加了四一二的反革命政變，但這既然是以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為基礎的反革命政變，把革命鎮壓之後，政權便落在大買辦與大地主的手裏，而不會落在自由資產階級的手裏。自由資產階級並沒有得到真正的權力，而在經濟上的發展却受到新的打擊。依時局的發展，自由資產階級，就逐步變成蔣介石政權的在野反對派，也有些自由資產階級分子在九一八後即轉到同情革命的方面。（人民公敵蔣介石）

△                      △                      △                      △

百年來，革命與反革命在中國已有許多次的反覆。一九二七年國民黨首要人物先後反叛革命，算是最大的反覆，而由此所引起各階級關係重新結合的錯綜複雜，也為以前所沒有。



國民黨的首要人物及其助手們屠殺了革命的工農和革命的小資產階級，代替了北洋軍閥的舊統治。他們得到了權力了。但這種權力究竟是代表了那個階級（或那些階級）的權力？它和北洋軍閥的舊權有沒有差別？如果有差別的話，是內容的差別，還是限於形式的差別？如果內容有差別的話，是全部的差別，還是限於個別部分，但不是決定的差別？我們黨需要答覆這些問題，因為這是決定我們黨全部政策的基礎，并得打碎一切反革命（包括托陳取消派在內）的噁舌。一九二八年十月間，毛澤東同志在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代表我們全黨極明快地答覆了這些問題：

「現在國民黨新軍閥的統治，依然是城市買辦階級與鄉村豪紳階級的統治，對外投降帝國主義，對內以新軍閥代替舊軍閥，對工農階級經濟的剝削與政治的壓迫比從前更加厲害。從廣東出發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半路被買辦豪紳階級領導了去；立即跑向反革命路上，全國工農平民以至資產階級，依然在反革命統治底下，沒有得到絲毫政治上經濟上的解放。」

十年內戰期間國民黨區域內的一切史實，對於毛澤東同志這個分析，沒有增加一個字，也沒有減少一個字。

毛澤東同志說這是新軍閥的統治，這就是說，這是反革命的軍事專政，北洋軍閥的統治也是反革命的軍事專政；但是，這是新的反革命的專政，其所以是新的，因為這是國民黨式的軍閥，而不是北洋式的軍閥，這種新式的軍閥和舊式的軍閥分別在那裏呢？分別在於；這種新式的軍閥在實行反革命的軍事專政以前，曾經是參加過革命的，曾經是在革命旗幟下和舊軍閥打過仗的，因此，他們對於革命方面的事情是頗為知道，甚至是熟悉的，他們在反革命後就夠利用這方面的經驗變成反革命的用途；其次，他們既然參加過革命，有過或多或少的一定程度的影響，他們反革命後，那種影響雖然會消失下去，但是，他們也會善於利用那種影響作為反革命的欺騙，以補助反革命的直接軍事恐怖，那却是無疑問的。不僅如此。這種新式的軍閥和舊式

的軍閥之最大的分別，更在於：這種新式的軍閥是有一個以政黨為形式，并有這種政黨的各種補助形式的集中組織，以作為自己反革命的工具的；特別是這個政黨先前曾經是革命的政黨，包括過各階級的革命成分，在民族中有它的歷史地位，在人民中會成為一面革命的通俗旗幟，但是，新軍閥却篡奪了這個黨的領導權，并篡奪了這面旗幟這個黨的歷史名義，來做反革命的專業，而舊式的軍閥卻沒有這種政黨的組織，沒有這種反革命的便宜。

這種新軍閥的統治，是代表一定的社會階級的統治，按照毛澤東同志所說，就是：『依然是城市買辦階級與鄉村豪紳階級的統治』。所謂『依然』，就是說，新軍閥所代表的基本階級內容還是相同的。但是，經過一度大革命的風暴，大買辦大地主的舊式統治已經統治不下去了，他們需要新式的統治。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就是他們開始形成這種新式統治的調度，帝國主義者則實際上在背後發號施令。一些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由於爬上了權力，而仇視了民衆，參加了反革命，同時也把自己轉化為買辦資產階級，并轉而充當了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表。新軍閥的統治就是大買辦大地主新的反革命的軍事專政。這個新的反革命的軍事專政，是以上海的或所謂『江浙』的流氓式的金融買辦勢力為中心構成的。上海流氓頭子們在這時候公開登上了政治舞台，成為決定國家政治和國家財政的『黨國要人』。買辦，流氓，軍閥，黨棍彼此在金融上在政治上互相變化，并混合為一體，造成買辦和流氓的特色政治。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在第一次大革命失敗以後所出現的一種特色政治。此外，這個大買辦大地主的新專政在其建立的初期，不但他們的某種新代表曾經充當過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可以迷惑人們一時的視聽，而且還特別故意提拔個把子那種平日和民族資產階級有特別明顯聯繫的分子或政治代表人。叫他充作這個政權底下的一個毫無權力的不起何種決定作用的腳色，當成粉飾品，并表示這是對於民族資產階級參加反革命的酬勞。但是即使是這麼一種腳色，也在很快的時間就被踢開了。

這樣的專政，本來是帝國主義所策劃上台的，必然是對外投降的帝國主義。各帝國主義者炮擊南京，結果反而得到南京政府的道歉，示敬，賠款。日本帝國主義者屠戮濟南，不但沒有得到抵抗，各地『日僑』同時反而得到特別通令的保護，……。帝國主義者不但利用這種新軍閥的統治而捲土重來，恢復大革命前的聲勢，並且進行新的覬覦了。

這樣的專政，反革命的新軍事專政，和當時托陳取消派所說的相反，並不是什麼『資產階級的勝利』。這個專政只是保護城市買辦和鄉村豪紳的利益。工農小資產階級在大革命時代所鬥爭得來的一切自由民主權利都被取消，他們鬥爭得來的經濟利益都陸續被剝奪了。並且民族工業資產階級也依然沒有得到自由的政治地位和所希望的經濟利益。

×                      ×                      ×                      ×

托洛茨基陳獨秀派認為國民黨的統治是『資產階級的勝利』這不過是掩飾買辦豪紳階級這個反革命統治的實質。這種反革命的護士是經不起歷史事實和毛澤東同志理論的駁斥的。

因此，這就又是毛澤東同志所說的：『中國迫切需要一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個革命必須是由無產階級領導才能完成的』。

這又就是毛澤東同志所說的：『中國現時的階段，確實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中國徹底的民權主義革命之完成，是包括對外推翻帝國主義特權，求得民族的徹底解放與統一，對內肅清買辦階級的城市勢力，消滅鄉村封建關係，完成土地革命，推翻豪紳階級變形政治組織的軍閥制度』。（前面所行，均見華聯邊二代決議）『要這樣才能培養出中國革命的社會主義前途，若果否認這個民權革命的階段，認為中國革命已經到了社會主義的革命時機，這種誤解於中國革命極有害。我們經過的鬥爭中，證明國際意見的真實』。（紅四軍六次代表大會決議）

×                      ×                      ×                      ×

至於在農村的一般情況，當時毛澤東同志給中央信也是反映出來的：『……全國受着殘酷的豪紳階級的封建統治，廣大力量的被壓迫階級還沒有發動。所以變成冷冷清清的打江山』。在這點上，六次大會是這樣寫的：『農民戰爭此起彼落的向前發展，並且還只在散漫不集中狀態中』。

可是，革命的低潮却絕不是像托陳派對於革命所咒詛的：革命業已完全死亡，不，完全不是。上面所敘述的大革命失敗後，各階級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各種歷史結果，還不只是說明了國民黨新軍閥的統治是代表買辦豪紳階級的新統治，不只是說明了中國革命的性質還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且又說明了這個反革命的統治基礎是脆弱的，也就是說，並不是鞏固的。買辦豪紳階級固然經過帝國主義的幫助，經過殘忍的陰謀和無情的屠殺，篡奪了大革命，打敗了革命，但是，我黨六次大會說得對：『凡是引起革命的矛盾，沒有一個是解決了的』。這個反革命統治的基礎——如上面所敘述的階級關係，——仍然是脆弱的。從另一方面說來，這也就是：革命發展的基礎又依然是深厚的。毛澤東同志給林彪同志的信中，非常深刻地分析了這問題：

『（一）中國革命的主觀力量雖弱。但立於中國脆弱的社會經濟組織之上的統治階級的一切組織（政權、武裝、黨派組織等）也是脆弱的。這樣就可以解釋西歐各國革命的主觀力量雖然比中國革命主觀力量要強得多，但因為他們的統治階級的力量比中國統治的力量更要強大得許多倍，所以他們仍然不能即時爆發革命；中國革命的主觀力量雖弱，但因為客觀力量也是弱的，所以中國革命之走向高潮一定比西歐快。

（二）大革命失敗後革命的主觀力量的確大為削弱，剩下的一點小小的主觀力量，若據形式上看，自然要使同志們（作這樣看法的同志們）發生悲觀的念頭，但若從實質上看，便大大不然。這裏用得着中國的一句老話：「星星是火，可以燎原」。即是說，現在雖只有一點小小的力量，但它的發展是很快的，它在中國的環境裏不僕具備了

發展的可能性，直是具備了發展的必然性，這在五卅運動及其後的大革命運動已得到了充分的證明」。

同志們！大革命失敗後，對於當時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複雜關係，第一個瞭如指掌，並在理論上給我們以最明確的行動方向的，不是別人，正是毛澤東同志。一方面，他批評了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他們「看大了主觀的力量，而看不了客觀的力量」。毛澤東同志指出：「這種估量多半是從唯心觀點出發，結果無疑的要走上盲動主義的錯誤道路」。另一方面，他也不同意「把主觀力量看得小一些，把客觀力量看得大些」。毛澤東同志又指出：「這也是一種不切當的估計，又必然要產生另一方面的壞結果」。事實證明毛澤東同志是對的。毛澤東同志這種深刻的分析，不是從空想出發得來的，而恰是從具體的階級關係的深刻分析出發得來的。

毛澤東同志認為對於「中國高潮是否快要到來」這問題，如要得到理解，則不能只據形式上看，而要從實質上看。實質就是矛盾，也就是說，要從矛盾上看：「只有詳細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種矛盾是否向前發展，才能決定」。毛澤東同志怎樣地察看了這各種矛盾的發展呢？請讀他所寫的。

「如果我們確切認識了關於帝國主義相互間，帝國主義與殖民地間，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間的矛盾是發展了，因而帝國主義爭奪中國的需要就更迫切；帝國主義爭奪一迫切，帝國主義與整個中國的矛盾和帝國主義者相互間的矛盾，就同時在中國境內發展起來，因此就造成中國統治階級間的一日擴大一日，一日激烈一日的混戰——中國統治階級間的矛盾就越益發展起來，伴隨統治者間的矛盾——軍閥混戰而來的賦稅之無情的加重，就促令廣大的負擔賦稅者與統治者間的矛盾日益發展；伴隨帝國主義與中國資本主義的矛盾，即中國資產階級得不到帝國主義的讓步，就即刻發展了中國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間的矛盾，即中國資產階級不得不加重對工人階級的剝削；伴隨着帝國主義商品侵略，商業資本剝蝕，與賦稅負擔加重等，對於地主階級的

矛盾，使地主階級與農民的矛盾越益深刻化，即地租與利息的剝削越益加重；爲了外貨的壓迫，工農廣大羣衆消費力的枯竭和政府賦稅加重，使國貨商人及獨立小生產者，日及於破產之途；爲了無限制增加軍隊於餉不足之條件之下及戰爭之日多一日，使得士兵羣衆天天在飢寒奔走傷亡的慘痛中；爲了國家賦稅加重，地主租息加重及戰禍日廣一日，造成了普遍全國的災荒與匪禍，使廣大的農民及城市貧民走到求生不得的道路；因無人開學，使在學學生有失學之憂；因生產落後，使畢業學生無就業之望，認識了以上這些矛盾，就知道中國是怎樣的在一種皇皇不可終日的局面之下，怎樣在一種無政府狀態之下，就知道反帝反軍閥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樣的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很快的要到來』。（見給林彪同志的信）

你看！從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時起的十年內戰期間內，凡乎全部歷史都活躍在一九三〇年一月毛澤東同志所寫的紙上。這裏所寫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全部矛盾；帝國主義和整個中國的矛盾以及帝國主義爭奪中國相互間的矛盾，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絕治者和廣大被統治者（負擔賦稅者——包括工農小資產階級乃至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矛盾，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軍閥和士兵羣衆的矛盾，教育制度，生產情況和知識分子及青年學生的矛盾，毛澤東同志不是把這一切矛盾平列來看，亦不是把這一切矛盾各個孤立來看，而是看出它們之間的互相聯系，看出它們之間的互相推移，并看出了帝國主義和整個中國的矛盾這個決定的因素（這正是半殖民地中國的特點，）如何促成了或影響了其他矛盾的發展。

由買辦豪紳階級佔統治的中國，上述的各種矛盾是一定無法緩和下去的，更說不上可能解決任何的矛盾。因此，統治階級內部的爭奪必仍將一天一天激烈起來，而革命之火是不能熄滅的。

當一九二八年十月間，蔣介石輩在下北京之後，正大慶祝其所謂『統一』中國的時候，毛澤東同志那時候就這麼指出，即將要更大的戰爭到來：

『國民黨新軍閥蔣桂馮閻四派在北京天津沒有打下以前，有一個對張作霖的臨時的團結。北京天津打下以後，這個團結立即解散，變為少派內部激烈爭鬥的局面，蔣桂兩派且在醞釀戰爭中。中國內部各派軍閥的矛盾爭鬥，反映着帝國主義各國的矛盾與爭鬥，故無論如何不能妥協，所有的妥協都是暫時的。今天暫時的妥協醞釀着明天更大的戰爭』，（湘贛邊二代決議）

在毛澤東同志預言後的數月之間——從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到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九日——蔣桂戰爭爆發起來，自從北洋軍閥統治以來更綿延不斷的，更大規模的軍閥戰爭也從此開始了，

不僅如此，當一九二八年濟南慘案之後，即當民族資產階級參加了反叛革命專業之後不久，毛澤東同志不僅指示了工農的革命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且更大膽地指示了民族資產階級還不是最後的反革命，它還可能變化，還可能重新參加反帝反軍閥運動，毛澤東同志指出了，這是新的事實（問題的本質不在當時那投機政派——改組派的活動，問題的矛盾是在乎那時這階級的政治實際）。所謂『新的』，就是情況和清黨開始后有變化了。一九二〇年官廳出版的上海勞資糾紛統計這麼寫過：『在十七年抵制外貨風潮很劇烈的時候，棉織業尙易維持，風潮一過，外貨充斥市場』。濟南慘案之後所引起的反日風潮，對於民族資產階級是有他的興趣的，這裏也完全證明了。

是的，不管托洛茨基陳獨秀派如何替買辦豪紳階級幫忙，叫破了喉嚨，稱頌南京政府『統一』中國，稱頌新軍閥內部混戰和反革命的戰爭為『統一戰爭』，而對於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主義和所進行的革命運動，則加以無微不至的惡毒的咒詛，但歷史却最無情地說明了他們反革命的無恥。歷史說明了：在新軍閥的統治（即反革命的新軍事專政）下，中國的統一是不可能的，而人民也決不可能經過和平的通路，從那種反革命軍事長政的集中統治者手裏，得到任何真實的政治權利，所以托陳取消派的『國民會議』口號僅僅是一種反革命的欺騙。中國人民採取了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主義，採取了毛澤東同志的革

命主義。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同志這個革命方向，對於整個中國歷史，對於過去，現在和將來所引起的作用和影響，簡直是很不容易衡量的而這種方向的決定，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精確地計莫了中國國情的結果。

×                    ×                    ×                    ×

按照毛澤東同志對於中國的分析：一方面，從經濟結構上看，是『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其特點也即是『地方的農業經濟（不是統一的資本主義經濟）；另一方面，從政治情況上看，由於這種經濟的特點，以及『帝國主義勢力範圍的分裂剝削政策』，就產生了『買辦豪紳階級支持着的各派新舊軍閥，從民國元年以來，他們中間的繼續不斷的戰爭』。這種特殊政治情況，毛澤東同志稱之為；『這是半殖民地的中國的最大特徵。不但全世界帝國主義國家沒有一國有這種現象，就是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殖民地也沒有一處有這種現象，僅僅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中國才有這種現象』。這種特殊的政治情況不是憑空來的，而恰是中國經濟結構的反映。

×                    ×                    ×                    ×

我們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則洞察了中國社會，這樣活生生的矛盾，並從此規定了最革命的政策，進行了最革命的行動。

既然中國無產階級是一個有力的集中的階級，那末，作為這個階級集中表現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這個黨又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武裝，又久經過政治鬥爭的考驗，這個黨就有充分的能力領導中國革命前進，而中國革命如果沒有這個最革命的階級及其政黨來作領導，要前進一步也是不可能的，就是沒有疑問的了。

既然中國是農民的國度，那末，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如果在革命上不是聯系農民羣衆——不是和農民羣衆相結合，就將不能成就任何事業，同時，又因為中國農民羣衆在政治上組織上的散漫，如果不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下弄清政治目標組織起來，他就不能成就解放的事業，這也是沒有疑問的了。



x                      x                      x                      x

經濟變為政治，反革命又產生出革命，

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及其理論之所以有力，所以不可抵抗，就正是因為它是馬克思主義的，這馬克思主義恰如列寧所說的，是『把嚴格的最高的科學精神（它代表着社會科學中的權威）與革命精神結合起來』。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的所以是科學的，而又是最革命的，就正是因為他正確地計算了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和政治結構，而又把全部感情的熱火和羣衆的鬥爭融合為一。由於上述的中國經濟和政治的具體情況，所以，在大革命失敗後，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一方面少數小塊地方建設了赤色政權，一方面全國還沒有普遍的民權，工人農民以至民權派的資產階級，一概沒有言論集會權。共產黨乃是最大的犯罪』（前委對中央的報告）。這是大革命失敗後全部中國政治長期的基本特點（這裏只說是基本的，並不是說，除此而外，就沒有別的特點），首先明確地指出了這種特點，加以分析，而得出在四圍白色政權中可能有赤色政權長期存在的結論，並堅持這結論，而和全黨同志及革命民衆奮鬥不懈的，正是毛澤東同志。

毛澤東同志在後來所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回憶了當初的情況說：『當着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春天，中國游擊戰爭發生不久，井崗山的同志們中有人提出「紅旗到底打得多久」這個疑問的時候，我們就把他指出來了（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會議）。因為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不答覆中國紅軍能否存在發展的問題，我們就不能前進一步』。我們現在手裏沒有湘贛黨的第一次代表會議決議，只有湘贛黨的第二次代表會議決議，這個會議所解決的『最基本的問題』，就是赤色政權能否存在多久的問題。列寧說：『革命的基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毛澤東同志正是最初把這個基本問題解決了。

毛澤東同志說：『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赤色政權長期的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這種奇事

之發生，有其獨特的原因」。因此，要在理論上解決這個問題，這在馬克思主義思想上，乃是破天荒的事業。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它的發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國家」（這比如我們前面說的帝俄），「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又直接統治的殖民地」（這又比如我們前面說的印度），而「必然在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因為這種奇怪現象，必定伴在另外一種奇怪現象之上，那就是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既然如此，所以馬克思主義在過去既還來不及提出這問題，並去解決這問題，而擺在中國革命的議事日程前面，却迫切地需要解決這問題。真的，這個理論的創造對於中國革命的價值，真是無限的，康生同志是說得對的：『毛澤東同志對這個理論的創造，是應該放進馬克思主義總寶庫裏面去的新的東西』。這新的思想的東西，經過中國共產黨全體同志和革命工農羣衆的實際，就變成了新的現實生活的東西了。

環繞在四圍白色政權中赤色政權長期存在（即反映革命的長期性）的問題上，是三個內容，三個問題：一、農民土地革命；二、民衆武裝；三、革命根據地。革命的根本社會內容是農民土地革命。革命的領導者是中國無產階級和它的政黨。這是上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農業國度的產物，假如這個國度雖然是農業國度，而農民并不受封建的壓迫，又過着豐衣足食的生活，那當然不會產生出土地革命，可是事情不是那樣，而是這樣：即在這佔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農業人口中絕大多數耕種的不是自己的土地，或者自己只有一塊衣食不足的土地，且橫守各種野蠻的經濟的和政治的掠奪。

×                      ×                      ×                      ×

我們民族是多難的，歷史生活的發展有更多的曲折，更大的複雜，但毛澤東同志的方向是說靈了的，也做靈了的。大革命失敗以來，中國革命是按照毛澤東同志的方向走的，並沒有按照別的方向走。沒有長期的『工農武裝割據』的革命運動，去反對反革命的苛徵和統治階級的民族投降政策。沒有十年內戰鍛鍊而成的中國紅軍成爲民族抗

戰的大動力和中堅，則今天中國的局面，簡直不堪設想。毛澤東同志後來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上說得好：

『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十八年來，我們黨的發展鞏固與布爾塞維克化，是在革命戰中進行的，是與游擊戰爭不能分離。沒有武裝鬥爭，沒有游擊戰爭，就不會有今天的共產黨這個拿血換來的經驗，全黨同志都不要忘記』。

所謂武裝鬥爭，就是無產階級和它的政黨領導下的農民革命的武裝鬥爭，也就是有根據地的武裝鬥爭，斯大林說：『中國革命的特點同時又是優點，是武裝的人民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正是毛澤東同志具體的、實際的把斯大林這個思想發揮了、應用了。毛澤東同志在對中央的報告中也有這麼一句概括的話：

『以農業為主要經濟的中國的革命，以軍事發展暴動，是一種特徵』。

毛澤東同志這一句概括的命題，一針見血，確定而明瞭，真是可以和斯大林上面的命題并美的。

長期的武裝鬥爭既是中國革命的特徵和優點，所以，我黨不但需要正確的政治路線，而且需要正確的軍事路線，才能把中國革命推向前進。在黨的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這麼回憶過：『到今天為止，我們可以自信的說，中國共產黨在十七年的鬥爭中，不但鍛鍊出來了一條堅強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路線，而且鍛鍊出來了一條堅強的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路線。我們不但會使用馬克思主義去解決政治問題，而且會使用馬克思主義去解決戰爭問題』。我們黨正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把這種堅強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路線，和堅強的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路線結合在一起的。沒有上述的堅強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路線，也就不能產生出堅強的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路線，而沒有堅強的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路線，也就不能實現上述的堅強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路線。我們黨的歷史說明：凡是在政治上犯錯誤的，在軍事上也錯了

；而在軍事上犯錯誤的，正是導源於政治上的錯誤，並且又轉變為政治上的錯誤。毫無疑問的，了解毛澤東同志的軍事路線，乃是了解毛澤東同志的政治路線所不可缺少的一個主要方面，因此，每個同志都必須認真地研究毛澤東同志所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和他在抗戰後所寫的論持久戰。關於這問題，我不準備在這裏多說了。

×                      ×                      ×                      ×

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政策，他的戰略思想或策略思想，就是：依靠羣衆，取得陣地，利用矛盾，發展力量，在統治階級政權破裂時期可以採取比較冒險的政策，但仍是**有步驟的有陣地的前進**，在統治階級政權暫時比較穩定的時期，則採取**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反對冒險政策，而對比較強大的敵人勢力取守勢，對那比較薄弱的敵人勢力取攻勢。更簡單概括的說來，這個戰略思想或策略思想，就是：**依靠羣衆，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這五句話。

毛澤東同志認為必須根據時局的變化，而變化自己的政策。在各種不同時期採取一樣的死硬的政策是錯誤的。把在某一種時期用得着並且必須用的政策，放在用不着或必須不用的另一個時期，是錯誤的（例如：『八月失敗，完全在不明瞭當時正是統治階級穩定的時候，反採取統治階級破裂的時候的政策，分兵向湘南冒進，致邊界與湘南同時失敗』）。必須把統治階級破裂時期和統治階級暫時的比較穩定的時期嚴格分別開來。而上述毛澤東同志在這兩種不同時期所規定的不同政策，由生活所證明，恰是完全正確的。這種靈活的政策，不但適用於赤白區之間的直接武裝鬥爭，而且也完全適用於白區中的革命工作和革命鬥爭。要知道：毛澤東同志和許多同志在赤區採用這種靈活的政策，因而使得紅軍力量由星星之火變成燎原之火。有些同志在白區拒絕了這種靈活的政策，就使得白區工作受了長期的挫折（劉少奇同志致中央的信對這些早有精闢的分析了），而這些同志由白區轉到赤區以後，反又把在白區工作的直綫的僵死的政策應用到蘇區中去，也使得蘇區受了很大的挫折。

×                    ×                    ×                    ×

以下，我們要說到對於資產階級的政策。（這裏所謂資產階級，指的就是民族資產階級，也就是工業資產階級。）

清黨時代，中國資產階級參加反革命，并特別參加對於廣州公社的殘酷屠殺，這是事實，這是沒有爭辯的問題，而且也不應該忘記了這種歷史事實。當時資產階級由於心地狹窄，眼光短小，驚慌於工人階級的鬥爭潮流，投到反革命，真有點像『鹿死不擇蔭』了。事實上，中國工人階級的鬥爭本來帶有很大的反帝性質，既就罷工而論，也是這樣。民國二十二年上海官廳所出版的近十五年來上海罷工停業記述了這十五年的罷工潮，有『四分之一的案件集中於十九家廠號』。那這樣寫道：

「這十九家廠號都是執各業的牛耳，十五年間共發生了三一二起案件，佔全數百分之二十八（按：十五年間上海罷工案件全數為一一二一起）這幾家多事的廠號，可稱為勞資衝突的總匯，階級爭鬥的戰場了。各廠僱用工人的衆多，工會組織的嚴密，實為工潮屢見的主因。同時，這十九家中，大半是外籍的廠號……若依國籍分類，則十九家中，中國廠號八家，共有案件七八起，日本廠號四家，共有案件一一八起，英國廠號五家，共有案件九一起。法國廠號一家，共有案件一八起，美國廠號一家，共有案件七起。從上列的分類，我們可以看到這三一二起案件中，二三四起或百分之七十五集中於十一家外籍的廠號。……在日籍的廠號中，爭議事件，尤屬層出不窮」。

如果按毛澤東同志的方法，不從形式上，而從實質上看，那末，我們可以了解中國罷工之帶有極深刻的反帝性質，而對於這種罷工的發展，假如又不從形式上看，而從實質上看，也正是對於民族工業的發展前途有好處的，因為這主要的鋒芒是打擊外資的企業，（固然，從更遠更深的歷史意義看來，工人階級從鬥爭中取得自己的政治地位，比起資產階級所得的，還要更大的好處）。但是，中國資產階級看不到此，飲鴆止渴，參加反革命，急於要把工人階級的氣燄鎮壓下去

，自壞長城，而主要得利的，乃是外國資本家，從此，更助長了外資的侵入，使得外資對於華資更日益佔領了上風。中國資產階級參加清黨的反革命苦迭撻，所得者小，所失者大。在新軍閥統治下，隨着時間的發展，中國資產階級是在逐漸改變態度了。只有極深刻的觀察和最大的理論勇氣的人，才敢於在資產階級叛變不久的時候，即指出了資產階級與現統治階級的不一致，指出了這個階級反帝反軍閥的運動，『其性質是迫切需要的民主革命之一部分』，而重新考慮無產階級對於這個階級的政策，這個人就是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二九年一月紅軍第四軍的佈告（這是一個傑出的佈告）把黨的綱領和黨的政策這樣明確地結合在一起）裏面，毛澤東同志和朱德同志提出了洋貨排擠國貨的問題（『洋貨越多，國貨受困，帝國主義，那個不恨』）提出了爭取城市商人的問題（『城市商人，積銖累寸，只要服從，餘昏不論』）等等，這都是把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的政策——首先是爭取它中立的政策——考慮在裏面的。

當然，資產階級在某些時期，還只是統治階級的純粹在野派。他們的反帝反軍閥運動可以成爲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但並不是說他們已如何革命了。毛澤東同志的話是有分寸的。

×                    ×                    ×                    ×

至於說到對於小資產階級的政策，『左』傾機會主義的荒唐，就更加『可以』了。大家知道，『要轉入沸熱的全國高潮的革命中去，則包括小資產階級在內的政治的經濟的民權主義革命之發動與完成，乃是必經的路』。他批評了對城市太損害了小資產利益的工作。他指出了貧農孤軍作戰是很嚴重的問題（均見對中央的報告）。在對中央的報告上，他這樣對照了對小資產階級錯誤政策和正確政策，有兩種大不相同的結果。

×                    ×                    ×                    ×

比如對於敵軍（紅軍第四軍佈告特別這麼寫道：『軍隊待遇，亟須改訂，發給田地，士兵有分，敵方官兵，准其投順，以前行爲，可

以不問」。但左傾機會主義却限於只要士兵)、對於赤區內的地主富農(毛澤東同志主張富農和其他農民一樣分田,地主不反革命的亦分田;但「左」傾機會主義則主張富農分壞田,地主不分田。也即是主張在經濟上消滅富農作為階級,在肉體上消滅地主)等等,這裏不多詳細分析了。

×                    ×                    ×                    ×

要把我們黨和毛澤東同志所提出的革命任務和革命政策變成現實的東西,就必要建設有很好的共產黨,建設有很好的革命軍隊進行很好的羣衆工作。

就像毛澤東同志在紅四軍黨的九次代表大會(即古田會議)決議案上所寫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意識非常之濃厚,對於黨的正確路線之執行,給了極大的妨礙,若不澈底糾正,則中國廣大革命鬥爭加於四軍的任務,是決然担負不來的』。所以建設黨是決定革命發展的基本環節。沒有一個很好的黨(就是說,真正布爾塞維克的黨),就不能建設起很好的革命軍,就不能進行很好的羣衆工作。

這個黨又是必須和武裝鬥爭相結合的。這個黨要進行土地革命,要建設根據地,如果沒有和武裝相結合,便是不可能的。就像毛澤東同志所說的:『所謂割據,必須是武裝的,那一處沒有武裝或武裝不夠,或有武裝而應付的策略不對,就立即讓給白色(白軍保安隊,挨戶團)割據去了』(對中央的報告)。黨創造了革命的武裝,革命的武裝反轉過來又創造了黨。因此,建黨和建軍是互相聯系的。

我們的黨和武裝是為人民的,除了人民事業之外,沒有我們黨單獨的、孤立的任何事業,就像毛澤東同志所說的:『紅軍之打仗,不是為打仗而打仗,完全是為了宣傳羣衆,組織羣衆,武裝羣衆,幫助羣衆建設政權,才去打仗的,離了對羣衆的宣傳、組織、武裝、政權等目標,就是完全失了打仗的意義,也就根本失了紅軍存在的意義』(紅四軍九次大會決議)。這也就是說:我們黨及其所領導下的軍隊,其目標就是為人民的解放,就必須進行很好的羣衆工作,必須和人

民羣衆相結合，同時，人民羣衆如果不和我們的黨相結合，如果不和革命的武裝相結合，那末，要得到任何的解放，也必是不可能的。所以建黨、建軍和羣衆工作，又是互相聯系的。

把建黨、建軍和羣衆工作看成一個血肉，打成一片，這是毛澤東同志的革命理論與革命實際之特色，這特色是反映了，掌握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革命之特色的，也正如斯大林所說的『中國革命的特點又是它的優點，是武裝的人民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個理論在各個方面、各個戰綫上的具體發展。

但是，要建設一個很好的布爾塞維克化的共產黨，要建設一個在這個黨領導下的革命的軍隊，又因而得以依靠這樣的黨，這樣的軍隊，去做好羣衆工作，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裏遇到的困難，就是和我們的農村環境相聯系着的，就是因爲在大革命失敗後，在根據地，我們『黨的組織基礎最大部分是建築於農民及其他小資產成分之上』。至於我們的軍隊，則又是農民佔主要成分的軍隊，是農民的軍隊。毛澤東同志是充分地估計了由這裏所產生的各種困難的，他說：『邊界的經濟，不但是農業經濟，且還在杆白時代……。社會組織是普遍的以一姓爲單位的家族組織。黨在村落中的組織，因居住關係，許多是一姓的黨員爲一個支部，支部會簡直就是家族會議，這種情形下的『鬥爭的布爾塞維克黨』之建設，真是難得很。……各縣間地方主義很重，一縣間各區乃至各鄉之間亦有很深的地方主義……多半靠白色之非地方主義（如兩省會剿等），才可以在鬥爭中利害共同上面，逐漸拋棄他們的地方主義。在許多的客觀教訓之中，地方主義逐漸減少了』（對中央的報告）。雖則有如許困難，然而。我們黨的創造，既然是從沒有力的集中的產業無產階級的基礎上成立起來，發展起來，我們黨既然經過大革命的鍛鍊，有了豐富的政治上組織上的經驗，既然我們黨的領袖和許多重要的幹部，由毛澤東同志起以至許多同志，從他們開始進行政治活動的時候，即和工人階級及其鬥爭有了血肉的相關，並且有了最好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修養，在另一方面，中



國革命既然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而在全世界範圍內，又有集中全世界各國無產階級鬥爭及其他革命鬥爭的經驗的共產國際（這個共產國際因為已成就了自己應負的歷史使命，才於一九四三年宣告解散）作為指導，又有社會主義蘇聯的種種成功足供模範，又有各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各國共產黨的實際鬥爭隨時足供揣摩借鏡，這樣，我們在戰鬥的農村環境中，也就有能力建設一個真正布爾塞維克化的共產黨，有能力建設一個富有無產階級革命紀律的軍隊。並且，正如毛澤東同志平日所告訴的，由於無線電的存在，縱使我們在農村環境中，但我們在政治上却不是孤立的，我們和全國全世界的政治活動的關係是很密切的。同時，縱使革命在各個農村是被分割的，而經過無線電，也就能形成集中的指導了。

問題是如何建黨、如何建軍，問題是建黨的方法。解決了這兩方面，羣衆的工作也就解決了。

毛澤東同志全面地提出了從思想上建黨的問題。斯大林說得好：「不能把黨看做是一種與周圍的人們隔絕的東西。黨在圍繞它的環境裏生活着和行動着。無怪不健全的情緒往往由外界侵入黨內的」（聯共中央在十七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與大會決議）。既然我們黨是處在農村的環境中，那末，農民及小資產階級的狹隘性、散漫性、宗派性，以及舊的家長制度殘餘，這一切不健全의思想和習慣，就會時常浸入我們黨內；這是必有的現象，只要我們還在農村環境中，只要小農和小資產階級，還大量存在在我們周圍，有這種現象就并不可怪，如果沒有這種現象，倒是可怪的了。而且我們四圍過去有白色政權和軍閥軍隊的存在，現在有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軍隊的存在，它們和我們有經常的接觸，也就能够或多或少地給我們內部一些分子以影響。但是我們如果讓這種現象自流下去，不加以堵塞，任令這一切不好的東西來侵蝕我們，我們的黨和革命的武裝，那就是很危險的。因此，毛澤東同志強調了：「黨內無產階級意識領導問題，非常重要」（對中央的報告）。要達到這個目的，毛澤東同志在古田會議上提出

了思想改造的問題，提出了黨內教育的問題：『紅軍黨內最迫切的問題，要算是教育的問題。爲了紅軍的健全與擴大，爲了鬥爭任務之能够負荷，都要從黨內教育做起。不提高黨內政治水平，不肅清黨內各種偏向，便決然不能健全并擴大紅軍，更不能負擔重大的政治任務。因此，有計劃的進行黨內教育，糾正過去之無計劃的聽其自然的狀態，是黨的重要任務之一』。

毛澤東同志這種建設黨的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

×                    ×                    ×                    ×

毛澤東同志認爲必須反對這種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使黨成爲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所指導的黨。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方法：『唯一的是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生活都政治化科學化』。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就要：『（一）教育黨員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作政治分析和階級勢力的估量，以代替唯心論方法的分析和估量。（二）使黨員注意社會經濟的調查和研完，由此來決定鬥爭策略和工作方法，使同志知道離了實際調查，便要墮入空想和盲動的深坑。（三）黨內批評要肅清唯心論的和技術的精神，說話要有證據，討論工作要注意它的政治意義』。

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這就是『無產階級意識指導』的黨，沒有這樣的黨，我們就不能領導革命前進一步，就不能領導農民土地革命，創造武裝和根據地，使之得到最好的結果。

這樣的黨在思想上就必須進行兩條戰綫的鬥爭：一方面，反對那種保存實力避免鬥爭的觀念非常濃厚的機會主義或其殘餘，這種錯誤的思想，像毛澤東同志所舉的例子：『有少數同志，囿於四軍局部環境，以爲除此以外就沒有革命勢力了』。這是沒有看見革命發展的前途，是反映一種坐井觀天的小農思想，是會阻止革命的發展的；另一方面，反對那種只想大幹，滿腦筋充滿着唯心的幻想的盲動主義或其殘餘，這種錯誤思想，像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不顧主客觀條件，犯着革命的急性病，不願意艱苦地做細小嚴密的羣衆工作』，『是由於

疏出無產階級意識與小資產階級意識匯合而成』，是不能成就任何的革命事業的。

毫無疑義的，不在思想上進行這種兩條戰綫的鬥爭，我們也就不能在思想上建設一個完整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

其次，我們在組織上，我們在組織上要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黨？按照毛澤東同志平日的說法，這樣的黨，就是民主集中制的黨，也即是集中的統一的黨。要建設這樣的黨，就必須和那種『小農思想一直到資產階級思想影響到黨內』的各色個人主義或小團體主義（毛澤東同志又稱爲本位主義，後來又總稱爲宗派主義）對立起來，和它鬥爭。這種個人主義，乃是：『完全從個人觀點出發，不知有階級利益，亦不知有整個黨的生活，只知有自己個人。他的目標不在敵人階級，而在自己隊伍裏別的個人。這是很能削弱組織、削弱戰鬥力的一副消蝕劑』。而小團體主義則『表面上是個人主義的放大，骨子裏依然是極狹隘的個人主義，它同樣具有很大的消蝕作用和離心作用』。因此，反對個人主義和小團體主義乃是建設一個無產階級集中的統一的黨的基本條件。這個無產階級集中的統一的黨，就是按照民主集中的原則和制度組織起來的。

毛澤東同志在古田會議上寫出：必須『在組織上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其路綫是：（一）黨的指導機關要有正確的指導路綫，遇事要拿出辦法，以建立領導的中樞。（二）上級機關要明瞭下級機關情況，及羣衆生活情況。成爲正確指導的社會來源。（三）黨的各級機關決議事情，不要太隨便，一成決議，便須堅決執行。（四）上級機關的決議，凡屬重要一點的，必須迅速地傳達到下級機關及黨員羣衆，其方法就是開活動份子會，或支部以至縱隊的黨員大會（須查看環境的可能），派人出席報告。（五）黨的下級機關及黨員羣衆對於上級機關的指示，要經過詳盡的討論，以求澈底了解指示的意義，並決定它的執行方法』。

復次，毛澤東同志又寫出：『黨的紀律之一是少數服從多數。少

數意見在黨的第一次會議失敗之後，後一次會議未開之前，必須擁護多數的決議，除再後一次會得再提出討論外，不得在行動上有任何反對的表示」。

這就是無產階級民主集中制的黨。也就是後來毛澤東同志所概括的：「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局部服從全體，全黨服從中央的民主集中制」的黨。沒有這樣的黨，我們也就不能領導革命前進一步，就不能領導農民土地革命，創造武裝和根據地，使之得到最好的結果。

這樣的黨在組織上就必須進行兩條戰綫的鬥爭，一方面，反對從『左』方面來的極端民主化和絕對平均主義。這種極端民主化的思想來源，像毛澤東同志所寫的：『在於小資產階級（小農生產及城市小資本）的自由散漫性』。『極端民主化的危險，在於損傷，以及完全破壞黨的組織，削弱以至完全毀滅黨的戰鬥力，使黨擔負不起鬥爭之責任，由此必然走到革命的失敗，同時亦就是幫助了統治階級反革命壽命的延長』。『這種思想是和無產階級的鬥爭任務根本不相容的，客觀上實在是反革命思想的一種，具有這種思想的人，若不努力糾正而任他發展下去，必然的要走反革命的路』。至於絕對平均主義的來源，則『實在是和政治上的極端民主化一樣，都是手工業小農經濟的產品，不過一則見之於政治方面，一則見之於物資方面罷了』。毛澤東同志寫出：『在紅軍的物資的分配，應該做到最大限度的平均，如官兵薪餉平均等，因為這是現時環境中紅軍鬥爭的需要，但必須反對不問一切理由的絕對平均，因為這不是鬥爭的需要，適得其反，是於鬥爭有妨礙的』。

另一方面，反對從右方面來的自由主義和個人特殊化，即所謂『非組織意識』，這種自由主義，例如：『提議被否決，表現非常地噁氣及不誠意執行黨的決議案』，『利用批評去做攻擊個人的工具』，『黨員不在黨內批評而在黨外批評』等；而個人特殊化，則『藉口事情忙，實際是不願接近羣衆，又怕羣衆批評，因此不到支部大會及小組

會，到會亦不作工作報告，種種異於一般黨員，其結果脫離羣衆，脫離黨。在此事件上，支部負責人不但糾正這種現象，反而怕了這些特殊黨員的表現。這種自由主義和個人特殊化，不消說也是違反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的，是會破壞黨的組織，而消蝕黨的戰鬥力的。

不論從『左』方面來的極端民主化和絕對平均主義，或從右方面來的自由主義和個人特殊化，在實際上都不過是個人主義或小團體主義的具體表現罷了。

毫無疑義的，不在組織上進行這種兩條戰線的鬥爭，我們也就不能在組織上建設一個完整的無產階級民主集中制的黨。

綜括說來，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所進行建設的黨，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統一集中的無產階級政黨。

這樣的黨，根據上述的基礎，而在我們戰鬥的農村環境中，按照思想改造的方法，是能建設起來的，並且早已建設起來了，任務是要逐步去改進它，更提高它。那些扭於成分的機械偏見，以爲我們在戰鬥的農村環境中不能建設這樣的黨，只是一種錯誤的見解，那是無須爭辯的了。

這個黨是戰鬥的黨，不但是在反革命的鬥爭中生長壯大起來的，而且也是在和黨內的各種錯誤傾向和機會主義的鬥爭中生長壯大起來的。所謂『思想改造』或『教育方法』，並不是黨內就要沒有鬥爭，沒有批評，大家客客氣氣起來，假如那樣，這個黨就不會變成生氣勃勃的黨了，也就不能成爲真正的戰鬥的黨了。不！不是這樣，毛澤東同志正是主張發揚黨內批評的。毛澤東同志說：『黨內批評是堅強黨的組織，增加黨的戰鬥力的武器』。問題是要政治的批評，而不要誤用批評去攻擊個人，因爲『誤用了去攻擊個人，結果，不但毀壞了個人，而且毀壞了黨的組織』。至於對於黨員的資格，毛澤東同志是很重視的。既然這是戰鬥的無產階級政黨，不稱責的人就不該讓他進來，加進來，就應該開除出去。古田會議責備了當時紅四軍黨的情況：『黨員加入太隨便，許多不够黨員資格的也拉了進來，特別是官長，』

不要任何條件，一概拉進。因此，黨的质量就弄得很差了」。所以，古田會議這麼決定：『舊的基礎厲行洗除，如政治觀念、吸食鴉片、發洋財及賭博等，屢戒不改的，不論幹部及非幹部，一律洗清出黨』。根據一九二八年九月以後湘贛邊界嚴格限制黨員成分的經驗，『黨員數量減，戰鬥力反而增加』。古田會議這種決定，恰是我們這戰鬥的黨所需要的。就是說：清除壞分子，是把黨增加了生氣勃勃的力量了。

不但如此，這個黨要生氣勃勃起來，還必要使黨的會議在內容上要有生動具體的實際的東西，而在形式上則要有活潑的空氣，就是說，必要反對黨會議的『八股』。按照毛澤東同志的提出：

『第一，會議要政治化實際化。第二，要把會議的重大意義時常對同志提醒，尤其是新黨員及工作不積極的黨員。第三，決議不要輕易，一成決議，就要堅決執行。第四，上級機關要勤快答覆下級機關的問題，不要拖延太長，失了熱氣。第五，負責人事先要準備議事日程，議事日程要具體化；對問題的內容和環境先要調查清楚，並對於怎樣解決先要想一想。第六，主席指導會議要採用很好的技術，要引導羣衆的討論潮流奔赴到某一問題，但有重要意義的超出題外的發展，不但不要大殺風景地去喝止他，而且要珍重地捉住這一發展的要點，介紹給大家，成立新的議題。這樣會議才有生趣，問題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決，同時會議也才真正實現了教育的意義。第七，廢止封建的會場秩序。共產黨的會場是要反映無產階級之積極活潑的爽快的精神，把這些做成秩序』。

這樣，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民主集中制及其表現的生動的形式結合起來，集中起來了。

這是列寧式的黨，斯大林式的黨，也就是毛澤東式的黨。這樣的黨，就會是無敵於天下的。

毛澤東同志就是按照這樣建黨的方向去建軍的。

由這樣的黨所建設的軍隊，必然是可以成爲最好的，最革命的軍

隊。

這樣的革命軍隊必須是反對軍閥主義的，按照古田會議的精神概括說來：第一、這個軍隊必須承認政治是指導軍事的，必須承認黨是領導軍隊的，而不是相反，不是使黨與軍事分離。第二、這個軍隊必須是和人民羣衆相結合的，是打仗而又宣傳、組織民衆的，而不是孤立於人民羣衆之外或高立在人民羣衆的頭上的。第三，這個軍隊必須是沒有本位主義，而把地方民衆武裝起來當成自己重要的任務之一的。第四、這個軍隊必須是不能像國民黨的軍隊一樣，可以由軍官以軍隊壟斷政權的。第五、這個軍隊的負軍事責任的同志必須是不能像國民黨的軍隊一樣，可以使負軍隊責任的黨員成爲黨內特殊的部分的。第六、這個軍隊的本身必須是民權主義的。

毛澤東同志寫道：

『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又如此苦戰不息，仍能維持不弊者，黨的作用之外，就是徹底的民權主義之實行。官長不打士兵，官兵穿吃一樣，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言論之自由，繁濬禮節之廢除，經濟之澈底公開，士兵代表審查決算，伙食由士兵管理……這些辦法，使士兵特別滿意；尤其是新來的俘虜兵，他們感覺得前日的營壘中與今日的營壘完全是兩個世界。他們雖感覺紅軍的物質生活比較不如白軍的好，但精神得到解放，所以尙能相安。同時一個兵，前日替敵軍打仗不如今日替紅軍打仗之勇敢，乃是這種民權主義的影響。紅軍像一座火爐，俘虜過來馬上溶化，這是一種事實。中國不但工農羣衆需要民權主義，軍隊需要民權主義更切。徹底的民權主義之施行於軍隊，將是破壞中國封建的僱傭軍隊之重要政策，因爲封建僱傭軍隊中的士兵生活，簡直不是人能忍受的』。（對中央的報告）。

這是中國軍隊的空前大革命，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創造，這是毛澤東同志和朱德同志以及全體紅軍將士的偉大創造。中國這種革命軍隊的創造，本來已開始於共產黨人在黃埔軍官學校和國民革命軍中工作的時候，因而有了北伐軍隊的輝煌戰績，然而這個學校和國民革

命軍在中途被買辦豪紳階級的政治軍事代理人篡奪去了，所以這種完全革命的民權主權的人民軍隊之建設，實在是在這時候，才經過毛澤東同志朱德同志和全體紅軍將士之手而實現的。只有這樣的軍隊，才能把打仗、羣衆工作、給養工作三者由軍隊自身結合起來，創造了許許多多的奇蹟，堅持了史無前例的長期的艱苦的解放戰爭。

復次，這樣的軍隊又必須是反對流寇主義的，初期的紅軍在若干隊伍中，曾經有這種思想的存在。雖然他們是革命的，但是如果流寇思想存在，則不但不能繼續發展擴大，而且在現在的中國，這是有被敵人消滅的危險，因此，反對流寇思想，成爲當時建軍最嚴重的任務。

毛澤東同志在古田會議上這麼分析了初時紅軍中的流寇思想：

『紅軍中流寇思想的來源，在於：（一）紅軍中遊民無產階級佔大多數，這是近的原因；（二）全國特別是南方各省遊民大羣衆之存在，這是遠的原因。由於遠近兩個原因，就產生了紅軍中流寇主義的政治思想和行動主張。但是黃巢李闖洪秀全式的大規模流寇行動，爲帝國主義統治着的中國，特別是進步武器（手榴彈、銅砲、機關槍等）進步通信方法（軍用電話及無線電），和進步運輸方法（汽車、輪船、鐵路）已經輸入了的現時代的中國所不許可，因此流寇思想自然不會成爲紅軍行動上的最後有力的主張。但是它的影響表現在各方面的仍是很大，如（一）不願堅苦耐勞的幫助羣衆建設政權，由此去擴大政治影響，而只想用流寇游擊的方法，去擴大政治影響；（二）擴大紅軍的組織路線，不走由擴大地方赤衛隊、地方紅軍以至於擴大非地方紅軍的路綫；而要走「招軍買馬」「招降納叛」去擴大紅軍的路綫。（三）不耐煩和羣衆在一塊作艱苦鬥爭，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凡此一切流寇主義的表現，妨礙革命加於紅軍的巨大任務之執行非常厲害，故肅清流寇思想，實爲紅軍黨內思想鬥爭一個重要目標』。

『（一）從教育上去變更黨內基於遊民成分的不正確思想，以肅



清流寇主義。(二)現有紅軍基本隊伍及以後新來的俘虜兵，加緊反流寇意識的教育。(三)引導有鬥爭經驗的工農積極份子加進現有紅軍隊伍，改變它的成分。(四)從鬥爭的工農羣衆中創造出新的軍隊」。

是的，我們的黨終於把這一類的流寇思想克服過來了。由於克服這一類的流寇思想和反對軍閥主義在一起，我們黨才能把農民土地革命、建設武裝和根據地這三位一體的任務實現出來，堅持下來。一切反革命派（從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以至托派）希望我們得到黃巢李自成洪秀全的結果，也終於因此變成了落花流水的可憐幻夢了。

但是，不論建黨也好，不論建軍也好，要真正能夠弄得好，並真正能成爲革命事業，按照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是必須『經過羣衆路線』，是必須『取得羣衆』，否則，是不可能的。

毛澤東同志認爲我們的應該成爲羣衆的黨，這樣的黨才是真能戰鬥的。他說：『四軍（指紅四軍）之所以艱難百戰而仍不潰散者，「支部建在連上」，乃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兩年前，我們在國民黨軍中的組織，完全沒有抓住士兵，卽葉挺部猶是帝國一個支部，真是豈有此理；』（對中央的報告）關於軍隊，毛澤東同志提出了要警惕脫離羣衆的危險！他指出那種『過分相信軍事力量，而不相信羣衆力量』的單純軍事觀點，是完全錯誤的。

要建設羣衆的黨，要建設與人民血肉相結合的軍隊，就必要宣傳羣衆、武裝羣衆、幫助羣衆建立政權，……就必要做各種羣衆工作。就不能『忽視士兵會的組織及工農羣衆的組織』。這一切的羣衆工作要在黨指導之下，又要經過武裝鬥爭來執行；同時，羣衆又會反轉幫助黨做得更好，幫助軍隊做得更好。

毛澤東同志寫出：『一切工作，在黨的討論和決議之下，再經過羣衆路線去執行』。只有經過羣衆路線，黨關於工作的決定才能執行得有力和澈底，而決定的正確或錯誤，才能得到真正的考驗。因此，命令主義是錯誤的。

毛澤東同志寫出：『發動地方黨對紅軍黨的批評，及羣衆政權機

關（蘇維埃）對紅軍的批評，以影響紅軍黨及紅軍士兵」。必須藉助羣衆的批評力量，而不是拒絕羣衆的批評，才能把黨搞好，把軍隊擴好。因此，官僚主義是要不得的。

一九四三年一月任弼時同志在陝甘寧邊區高幹會上的演說，論到黨的領導一元化的問題，論到反軍閥主義傾向和反官僚主義傾向的問題，一切都特別強調到和歸根到羣衆路線，他指出了要反對各種不好的東西，發揚好的東西，『唯一的辦法，就是在黨內發動所有的黨員羣衆，在政層系統中發動發大的勞動羣衆，大家來進行批評和監督。這種羣衆的批評和監督，應當成爲我們肅清官僚主義與軍閥主義傾向、肅清貪污腐化和反對其他各種不正確的思想傾向，以及對這些不正確思想傾向採取自由態度的一種重要武器』。真的，羣衆路線是推動一切工作的鑰匙，也就是毛澤東同志思想的鑰匙，掌握了這鑰匙，就有了好的黨、有了好的軍隊、有了好的羣衆工作，三位一體，那末，一切事情就都有辦法了，一切困難都可克服了。一切反革命對於我們革命也就無可奈何了。

我們中國革命的一切事情要看對於毛澤東同志所提出的這種三位一體的建設是否做得好，是否配合得好，來作最後的決定，業已由事實完全證明了，今後仍將由事實來證明它，我們是不要忘記自己進一步的努力的。

在這裏還應該說到我們共產黨員在革命鬥爭中，在各種工作中的態度問題，大家知道：列寧斯大林時常語誡自己的同志，勝則勿驕，敗則勿餒。斯大林特別警戒過同志們，不要因爲勝利而沖昏頭腦。毛澤東同志在古田會議也正是提出了這個問題的，他嚴責了有些黨員這種態度；『打勝仗就驕傲，打敗仗就消極』。中國革命的事業是大事業，共產主義的事業是大事業，我們要做的事情是無限的，我們走的路是很曲折的，我們共產黨員的態度必須是『日日新，又日新』。如果因爲我們得一勝利就驕傲起來，打一敗仗就消極起來，那末，我們的努力就會停止，我們的進步就將中斷，我們的前途就將有限，因此

我們也就將不能領導羣衆前進，我們就將被羣衆所拋棄了。所以，是否記住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同志關於勝利勿驕，敗則勿餒的誡誡，并身體力行之將是我們共產黨員是否能夠和羣衆一起前進的試金石，我們也不要忘記了。（陳伯達：「內戰時期的反革命與革命」）

## 三 土地革命的實施與成就

### 查田運動的初步總結

（載一九三三年紅旗雜誌第六十一期）

#### 一、偉大的勝利

查田運動在黨與中央政府的號召之下，已經廣泛的開展起來了。如果說，查田運動過去還僅僅在開始的階段上，那末在六月的八縣查田大會後，七月一個月的工作，便已超過了去冬以來大半年中所做的成績。一般說，在開會的八個縣中，查田運動已經進入了一個新形勢，查田運動已經成了一個廣大的羣衆運動。瑞金與博生成績最大，兩縣共查出了二千幾百家地主農富，勝利、雩都、會昌、汀東、長汀、石城、寧化各縣，亦都有了初步的成績。在一切查田有成績的區鄉，廣大的羣衆鬥爭發動了。蘇維埃工作中，黨的工作中，許多過去停頓着的狀態，現在都活潑起來了。蘇維埃中的壞分子許多被洗刷出去了，暗藏在農村的反革命分子，受到了嚴厲的鎮壓。一句話，封建殘餘勢力，在廣大羣衆面前遭受了殘敗。在這個基礎上，各種工作更加開展了。在查田有成績的區域，擴大紅軍與擴大地方武裝，推銷經濟建設公債與發展合作社，秋收秋耕與發展勞動互助社，以及俱樂部夜學小學等文化建設事業，都得到了極大的成績。一切工作進行更加順利了。在羣衆活躍的基礎上，大批積極分子自己創造成為各種工作幹部，許多工農積極分子加入了黨，被吸引到蘇維埃工作中來。最好的例子是瑞金的王田區。王田區的查田運動在中央政府工作團幫助之下，

五十五天中發動了全區的羣衆，澈底消滅了封建殘餘，查出了地主富農三百家，槍決了羣衆所謂「大老虎」的十二個反革命分子，鎮壓了反革命活動。在羣衆面前檢舉了蘇維埃工作人員中犯了嚴重錯誤的一些分子，清洗了一些混進蘇維埃來的階級異己分子出去。全區查出土地二萬七千担，全區二萬餘勞苦羣衆差不多平均每人重新得了一担二斗穀土地，分配了豪紳地主的無數財物給予羣衆。依靠於羣衆積極性的空前提高，五十五天中擴大紅軍七百餘人進瑞金模範師去，沒有一個開小差；節省穀子賣給紅軍，達到一千九百餘担，全縣沒有任何區比得上它。在各鄉的要求下，全區担任推銷經濟建設公債四萬元，地主罰款富農捐款已收得七千五百元，承認繼續去籌的一萬元。合作社迅速發展了，文化教育建設如俱樂部，識字班夜學增加了。黨員數量擴大，黨的領導加強了，工會工作也進步了。全區另換了一種新氣象，由瑞金的一個落後區在五十五天中變換了地位，成了與武陽區相等的一等區了。我們現在要問：壬田爲什麼得到這樣大的成績呢？那我們應該指出，由於他們認識了查田任務的重要，由於他們的動員方式，階級路線與羣衆工作，都是堅決執行了中央局與中央政府的正確指示，他們做了真正布爾塞維克的工作。在任務的認識上，他們懂得查田運動與革命戰爭有密切聯系，因此他們認真的做這個工作，抓緊了查田運動的領導，有計劃的去佈置當地的工作。在動員方式上，他們在全區十一個鄉中，抓緊了最落後的與比較落後的七個鄉的工作，在這七個鄉中動員了黨，動員了團，動員了鄉蘇，動員了工會與貧農團及其他羣衆團體，經過他們去動員廣大的羣衆。在階級路綫上，堅決執行了依靠僱農貧農與聯合中農的策略，廣大的發展了貧農團。他們說明了查田不是分田。查階級不是查中農貧農僱農階級，他們「講階級」的工作做得很充分。當着鵝鳳鄉的地主恐嚇中農，使部份中農發生恐慌的時候，我們的同志找了幾個中農來作個別的談話，經過他們去傳達其他的中農，鵝鳳鄉的中農立即穩定起來，接着積極擁護蘇維埃的查田政策，從受地主富農欺騙轉到與貧農工人一致進攻地主富農

。王田鄉的同志亦會錯誤的處置了幾家成份，但他們迅速的改正了錯誤。關於領導羣衆鬥爭的工作，首先他們做了廣泛的宣傳不是開全區全鄉會，他們開的是村子屋子會，這樣去接近更廣大的羣衆，向他們作了多少次的宣傳鼓動，所以全區羣衆都明瞭查田查階級是自己的責任，自己的利益。其次調查階級的成份，發動了多數人去查，詳細搜查了各個成份的材料證明給羣衆看，所以沒有發生羣衆不滿意的事。其次通過階級成份，是首先經過了查田委員會的分析決定，提交貧農團討論通過，送達區蘇批准，再到被沒收入的村子裏召集本村羣衆大會，解釋明白，舉手贊成，然後進行沒收。在分配財產與土地上，工作人員都能了解自己應做模範不拿東西，而把東西完全分給羣衆，沒收的村子多分，其他村子少分，得到了羣衆的完全滿意。土地也迅速分配了；別地拖延很久才分的現象，王田區是沒有的，所以迅速發動了羣衆。他們打進落後大村子的辦法也是正確的。他們不畏懼這些大村子，他們也不用登聲的辦法來應付，他們對大村子是集中了火力，做了更多的宣傳，從爭取當地積極分子着手，團結他們，教育他們，經過他們去動員其他的羣衆。他們很耐心地去辦這種村子裏工作，表面上看是遲慢的，但實際上是迅速的，他們在五十五天中把王田區所有落後大村子一概發動了，很短期間消滅了這些村子的落後。坑柏坑鄉的一個村子打下進去，原來那裏有兩個著名『大老虎』一向在作怪，他們就採取了不同的辦法，首先捉到這兩個壞東西在當地開巡迴法庭審判他們，經過羣衆熱烈擁護槍決他們，那裏的羣衆鬥爭就像烈火一般燃燒起來了。他們開了十次羣衆審判大會，三次巡迴法庭，都是經過了極廣泛的羣衆的路線，本鄉的人多到，別村的人每村派代表，小鄉十幾人，大鄉四五十人，所以每一次公審與裁判的結果，都立即傳播到全區各鄉各村去，不但使各個鄉村的羣衆都覺得今天審判的這個人該罰該殺，而且使他們立即想到自己地方那個同樣作惡分子也該處治他。王田區的查田運動真算得全蘇區的模範，瑞金九堡區的工作也有極大的成績，他們首先是抓緊三個鄉去做，召集各鄉的查田委員

會委員到區蘇開了三天訓練班，講明了動員方式階級路線與爭取羣衆的方法。他們在沒收分配問題上創造了一個好辦法。他們的辦法是：要沒收一家地主了，就號召本村本屋的羣衆一同去，在羣衆大會上舉出沒收分配委員會，在羣衆的監視下進行沒收，沒收的東西堆在一個大坪上，再經過羣衆同意立即分配給應得東西的羣衆。吃得的東西又是一個處置，就是殺豬煮飯讓羣衆大吃一頓。這個辦法在九堡區收了極大的成效。他們的沒收分配委員會不是經常組織的，而是臨時組織的，更加密切的聯系了羣衆（關於土地的沒收分配，仍由經常的土地委員會負責）。一切東西不挑到鄉蘇去，不待集中了若干家然後分配，免去了拖延時日與被別人偷去的毛病。九堡區在其他的路線上方法上一般也是正確的，所以能夠發動廣大羣衆自己動手查階級。他們辦到了沒有一個地主富農到蘇維埃來鬧成份，與過去查田時的情形完全相反，過去總有許多被查的地主富農到蘇維埃來橫鬧，說把他們查錯了。不但本人，甚至有時有個別鄉代表貧農團負責人也有來替他們求情討保的。這次當然不是地主富農不鬧了，而是要鬧也鬧不起來了，他們的同宗，他們的親戚，沒有一個人贊助他們，地主富農軟了勁，沒有鬧的可能了。這件事證明九堡區發動羣衆的工作做得極充分，不然是辦不到這個地步的。

所有這些光榮模範的例子（這種例子別的地方還有不少）給了黨與中央政府的號召以布爾塞維克的回答，證明了中央局與中央政府的指示的絕對正確性。那一處完全執行了這些指示那裏就立刻取得偉大勝利。但是誰違背了這些指示，忽視了這些指示，那裏的工作就犯了錯誤，沒有成績或者成績很微弱。讓我再拿事實證明。

## 二、有些地方放棄查田運動的領導

查田運動的鬥爭任務，在中央局查田決議發出之後，在中央政府訓令及召集八縣查田大會之後，查田運動在各縣的開展，並沒有普及到一切地方，這如福建全省查田的成績還只當得博生一縣的成績，勝

利，零都，會昌，石城每縣的成績，還只當得瑞金最好一個區至兩個區的成績，各地有許多區的查田委員會沒有開過一次會，甚至縣查田委員會，亦還有幾個縣沒有去抓緊全縣的查田工作。（會昌、零都、石城、甯化）。許多區與鄉的查田委員會，區鄉主席不做主任，藉口別的事忙，放棄查田不管。黨對查田的領導，在一切查田有成績的地方，都明顯的表示出黨的堅強領導作用，黨員羣衆的大多數，在支部與區委的領導下，做了很多勇敢戰鬥的工作。但在一切查田沒有成績及成績微弱地方，就表示出黨部忽視查田運動，這如會昌縣委在中央局查田決議發出後，差不多兩個月沒有討論過一次查田工作，直到七月底才開了一次會討論查田。瑞金的下肖區委在一個時期中，對查田運動完全放棄不管。瑞金市委雖在查田開過一次會，却沒有推動四郊支部去注意查田的領導，各個支部沒有爲了查田運動開過會的。在別的地方如零都，勝利，石城，寧化，縣委與許多區委，同樣沒有用大力去注意查田工作。黨與中央政府說：『查田運動成爲發動羣衆深入農村中的階級鬥爭。澈底解決土地問題與肅清封建半封建的有力方法』（中央局決議），『查田運動是各地蘇維埃一刻不容再緩的任務』（中央政府訓令），『查田運動是目前工作中心最主要的一環』（八縣大會總結）。我們的許多同志却在說：『忙得很，沒有工夫照顧查田運動』。黨的決議說：『一切以官僚主義與形式主義的敷衍態度來對付查田運動。是最有害的』，這些同志却還是以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來對待查田運動。

### 三、有些地方竟對地主富農投降

在查田運動開展了的地方，也還表現許多個別的仍是嚴重的錯誤，那就是這些地方黨部中蘇維埃中還常常遇到個別的同志，在查田運動這個激烈的階級爭鬥的面前，表現了他們的機會主義動搖。這主要在當着查田運動激烈發展的時候，他們丟棄不了姓族與地方的關係，包庇同姓同村的地主富農成份。或者錯誤的分析階級成份，把地主當

富，農把富農當中農。有些裁判部的工作同志，在他們的極端疏忽中接受了地主富農假冒羣衆名義對於查田積極分子的誣告。另一方面我們有些保衛局與裁判部的同志，又沒有跟着羣衆查階級鬥爭的發展，去積極鎮壓反革命，甚至當着羣衆請求捉拿與槍決抵抗查田運動的地主富農分子時，還有不接受羣衆請求的，瑞金的裁判部就是做了許多這樣錯誤的例子。

#### 四、侵犯中農的傾向是最嚴重的危險

『左』的機會主義傾向，在七月查田中，又在很多地方發生了。這裏應該着重指出的就是侵犯中農的傾向。雖然在中央局的決議上早已明白的寫着：『必須特別注意與中農羣衆的聯盟，中農是革命後蘇維埃農村中最廣大的基本羣衆，一切我們的處置與策略，必須獲得他們的贊助與擁護。每一個貧農團與蘇維埃的決定，必須是在一村或一屋的羣衆會議上得到中農羣衆的擁護，一切中農羣衆的呼聲，必須注意聽。並須嚴厲的打擊任何侵犯中農利益的企圖』。在八縣大會的結論上指出：『查田的目標是查階級，而不是再分田』，『聯合中農應從不侵犯中農的利益做起』，『在查田的開始，應普遍宣傳蘇維埃聯合中農不侵犯中農的政策。在查田進行中，應審慎決定介在中農與富農之間的疑似成份，不使弄錯』。但是這樣的指示，並沒有為許多地方的同志所注意。瑞金城區查田，一起始即按家按畝去查，查得中農恐慌，竟有中農跑到蘇維埃來請求改變自己成份，他們請求改為貧農，他們說：『中農危險得很，握上就是富農，改為貧農咧，隔富農就遠了一點』。這樣沉痛的呼聲，還不值得我們傾聽嗎？黃柏區洋古鄉的同志向羣衆說：『查階級不查別的，只查中農富農地主階級』。踏巡區的同志，插起牌子遍查，查得一部份中農恐慌逃跑躲到山上。博生縣的某些鄉中，同樣是插牌子遍查，同樣發生了中農恐慌的事。八縣大會的結論早已經說了：『那種說到查田就以爲應插牌子的意見，是不對的』，但全未為這些同志所注意，這種插牌子遍查的方法每縣



都有發生，這是異常嚴重的情形。他們把查田與分田混合了。不錯，分田是應該插牌子的。是要一坵一坵查清數目，然後拿去分的，但若把這個辦法應用到查田運動上來，那就混亂了農村中的鬥爭目標。過去我們曾經指出：『查田與分田，必須嚴格的分別，這種分別，不但爲了鞏固農民的土地所有權、便他們不起分田不定的恐慌，而且是爲了查階級鬥爭的勝利。必須集中全力，特別是聯合中農，去對付地主富農的反抗，這種時候，決不應在農民自己的隊伍內發生任何的紛擾』（八縣大會結論）。這樣的策略，是我們領導查田鬥爭中整個策略最重要的一部份，可是還爲許多的同志忽視了。這種忽視，一刻也不能再忍耐下去，那些經過指導還故意在做這些錯誤的，當地的上級蘇維埃須給他以嚴厲的處罰。要在黨內團內開展思想鬥爭，反對任何黨員團員侵犯中農利益違反聯合中農策略的思想與行爲。已經做了錯誤，如已經沒收了中農的土地財產的地方、蘇維埃人員要向當地中農羣衆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把土地財產賠還他。去年與國會賠還許多中農的土地，取得了中農羣衆的滿意，是一個寶貴的教訓。

#### 五、貧農團的關門主義與忽視僱農的領導作用是錯誤的

『貧農羣衆是黨和無產階級在農村中的支柱，澈底地進行土地革命的堅決擁護者』，『依靠貧農』是我們查田運動及一切土地鬥爭的重要策略之一，而貧農團則是查田運動中有極偉大作用的團體。八縣貧農團代表大會已經指出過去貧農團的關門主義傾向是錯誤的，應該廢除介紹制，向貧農工人打開大門，一切男女老少的貧農工人均可報名加入。但是，許多地方仍然沿着舊辦法不改，仍然非有介紹不能進貧農團，甚至在瑞金踏逕區當着尙未入會的貧農羣衆跑來參加貧農團會議的時候，貧農團負責人居然拒絕他們參加。博生的竹磔區，七月一個月中貧農團沒有發展一人。在一切查田有成績的區鄉，貧農團是廣大發展了，而在沒有成績或成績微弱的區鄉，那裏的一個表徵，就是貧農團的關門主義狀態，僱農在查田運動中的偉大領導作用、同

樣爲許多同志所不認識。黨的決議說：「僱農羣衆是城市無產階級在農村中的兄弟，是土地革命中的先鋒隊，因此蘇維埃的工作人員必須與工會取得密切聯繫，經過工會來發展與組織工人羣衆的積極性，使他們成與爲田運動的先鋒隊」。我們的同志，依照這個指示去做的，仍然不是多數，這裏主要的方法，是使農村工人加入貧農團，而在其中成立單獨工人小組，經過這些工人小組，去團結貧農積極分子，發展貧農團，推動查田運動前進。黃柏區山河鄉的經驗是可寶貴的，當我們的同志兩次召集貧農團開會不成的時候，就去開了一個農業工會與手藝工會的會員羣衆聯合會，發動了幾十個工人積極起來，每人帶領一個貧農分子加入貧農團，第二天貧農團再開會，果然一齊到了，開展了山河鄉的查田運動。山河鄉這個經驗應該把他運用到一切農村中去。這裏工會的上級領導機關，應該給下級工會以積極的指導，要把查田運動看成爲工會的重要任務之一。

## 六、關於富農問題的不正確觀念

農村鬥爭中整個我們的策略，是依靠貧農，堅決的聯合中農，並使僱農起先鋒隊作用，團結所有一切力量，去消滅地主階級與反對富農。關於富農問題黨已經正確的說了：「必須把地主富農分別清楚，在無情的消滅封建殘餘鬥爭中，決不容許任何消滅富農的企圖。」七月查田中，雖然還沒有發現公開主張消滅富農的理論，但是把富農分子當做地主全部沒收了他的家產的，就已經在許多地方發現了。這一錯誤的來源，是由於抹煞富農的勞動力。當着我們說「沒有勞動或只有附帶勞動而有地租等等剝削的是地主」的時候，有些地方就把在生產中用了相當多的勞動的分子，認爲是「附帶勞動」一類，把他當地主看待。有些地方，則把富農兼有高利貸剝削的認爲是「高利貸者」而照着「消滅高利貸者」的辦法去對付這種富農。有些算陳賬，算到革命前若干年上去，一人在革命前五六年甚至十幾年前講過長工的，也把他當做富農。或者僅僅只請過一年兩年長工而前後沒有請過的富

裕中農分子，也放在富農一類，更加嚴重的是過去與國某地方的例子，那裏的辦法，拿剝削的種數去分別地主與富農的成份，三種剝削的叫地主；兩種剝削的叫富農，比如請了長工、收了租，又放了債，則不管他家裏有幾多人勞動總之他就是地主了。還有『反對富農』這個問題，在許多地方弄得頗糊塗。武陽區一家富農兼商人，七個人吃飯，因過去他家有一人加入AB團，在兩年前被殺了，兩年之後那裏同志一定要全家沒收他。在別的許多地方，同樣發生許多這類的事把富農在暴動前不十分嚴重的反革命行為如參加『收三成租穀』之類（瑞金），暴動後幾年他也沒有做過反革命的活動，羣衆的多數對他不要懲辦，而我們有些同志，則一定要沒收他。正確的說，我們對待這類分子的辦法，在鞏固了的區域與尚未鞏固的邊區，應該有策略上的不同，在邊區，無疑要採用嚴厲辦法，鎮壓一切包括富農在內的反革命分子。在中心區則要分別情形決定，暴動前有過嚴重的反革命行為，或暴動後還在做反革命活動的，自然應堅決的沒收他，否則不應該沒收。有些一家中只沒收他本人以及同他反革命行為直接關係的分份，其他的人則不沒收。這樣處置才是正確處置。

七、工農檢察部沒有負起自己應有的責任有些並且做出了

### 錯誤

我們的工農檢察部的同志，許多不認識查田運動開展中正是開展思想鬥爭；反對官僚主義，反對貪污腐化與消極怠工，驅逐階級異己分子出蘇維埃去的最好時機，因此，對於這些工作做的異常不夠。許多我們工農檢察部同志，在這個劇烈的階級鬥爭面前，表現了自己的消極動搖，自己的官僚主義與形式主義。甚至如瑞金市蘇工農檢察科長，包庇市蘇裁判科長的極大貪污行為（私用公款千餘元）。工農檢察科長對於區蘇主席放棄查田不管，也不去批評他與檢舉他，工農檢察部的渡頭區的檢舉運動，有些地方又走到了別的錯誤方向，把戀愛問題當着腐化，把拿了地主的東西當作貪污，對於這樣的分子進行檢

舉甚至公審，有些地方把犯了輕微錯誤的開除職務。不去有系統的發動自我批評，開展思想鬥爭，把這種艱苦的工作省去，而代之以簡單的懲辦主義。不消說，蘇維埃工作人員中那些犯了長期與嚴重錯誤的分子，是應該堅決洗刷出去的，但是錯誤不到這種程度的也給予撤職處分，則是過分了。關於階級異己分子的問題，普遍的祇講成份，不講工作，只要是出身壞，不管他有怎樣長久的鬥爭歷史。過去與現在怎樣正確執行黨與蘇維埃的路綫政策，一律叫做階級異己分子，開除出去了事。完全不錯，我們要堅決洗刷那些階級異己分子，那些成份壞又加工作壞的（包括地主富農、消極怠工、貪污腐化等等）無疑地應該洗刷乾淨，但如果不是這樣也把他洗刷出去，那就是過分的了。

#### 八、關於查田鬥爭的領導藝術

瞭解了任務與路綫，但沒有領導羣衆鬥爭的布爾塞維克的藝術，查田運動是仍然不能開展的。本文的開頭已經說了壬田區等處許多很好領導鬥爭的例子，但在另外許多地方却在這個問題上犯了不少的錯誤，有些地方對於地主富農集中的落後大村子，不知道用各種方法去發動鬥爭，即如有種大村子只有首先捉拿著名兇惡即羣衆所謂『大老虎』的那些豪紳地主分子，才能開展當地的鬥爭，我們的同志却沒有這樣去做。關於用分配沒收來的財物去發動羣衆鬥爭這個最好的方法，還有許多地方不知道採用。在瑞金踏涇區的瓦子鄉甚至把東西只發給查田幹部與貧農團會員，其他不發，理由是自己不積極的不應分東西。有些地方沒收的東西分配得很慢，甚至沒收了一個多月還未發給羣衆。沒收的土地分配得更慢，不少地方的同志不知道去動員蘇維埃的各部，動員各個羣衆團體，不知道動員所有的黨員團員，在各個羣衆團體中各個村屋中，去起核心領導作用。工作推不動，就說這裏本來沒有辦法的。有些地方當着羣衆查階級的鬥爭已經發動起來了，許多羣衆都來報告地主富農請求去查田沒收時，我們的同志不能立即抓緊羣衆這個熱潮去領導羣衆開展鬥爭，把查階級工作開展到各個村子

裏去。有些地方，則在查了一番之後，羣衆的鬥爭熱情不能繼續向上高漲，表現了停頓狀態的時候，我們的同志不能用各種方法去鼓勵羣衆，使鬥爭繼續高漲，一直領導到消滅封建殘餘的地步。許多地方當着經過了查田運動，羣衆鬥爭熱情蓬勃發展起來了的時候，不知道把這種熱情組織到別的戰線上去，比如當着羣衆得了東西得了土地的時候，即在那時的羣衆大會上，或在其他一切有利時機，鼓勵羣衆去當紅軍，去買公債票，去進合作社鼓勵羣衆去加緊秋收秋耕的工作，去建立俱樂部識字班，發展夜學與小學。把這種好的時機放過去，另等上級對於這些工作督促來了，才有重新開頭去做宣傳鼓勵，這種落在羣衆鬥爭熱情之後的尾巴主義的領導，乃是最有害於革命工作的。

另一方面，在許多別的地方，又發生了少數人蠻幹的惡劣現象。我們會經着重地指出：要反對對於爭取大多數羣衆的忽視與命令主義的工作方式，只有耐心的艱苦的去發動羣衆爭取羣衆的工作，才取得大多數羣衆的擁護，得到消滅封建殘餘的目的。這樣的羣衆工作，是執行階級路線的唯一保障。查田運動的開始，必須在一切村屋中做廣大的宣傳，向羣衆說明查田運動的必要，說明查田不是分田，查階級不是查中農貧農僱農的階級，特別重要的是把什麼叫做地主富農中農向羣衆分析清楚。村屋的羣衆大會應該不只開一次，特別是那些落後的村屋應該多去開幾次，應該不讓一個勞動分子不聽到我們的宣傳。爲了達到這個目的，應該首先在鄉蘇代表會，工會貧農團，女工農婦代表會，及其羣衆團體中，向一切積極分子解釋明白，經過他們去去向廣大羣衆作宣傳。查階級應該不是少數人去查，要發動多數人去查。通過階級成份不但在貧農團鄉蘇區蘇通過，而且要在被沒收人的村屋中開羣衆大會，取得羣衆的同意，才能進行沒收。分發財物，要發給本村本屋羣衆，取得本村本屋羣衆的滿意。所以要這樣，都是爲了爭取羣衆的大多數。黨與蘇維埃工作人員每個時候，每件工作，都不要忘記羣衆的大多數，我們要面向羣衆，要面向羣衆的大多數，我們的工作要深入羣衆，要深入一切大的小的村莊，一切大的小的市鎮

裏的羣衆。要嚴厲反對少數人幹的關門主義命令主義錯誤的辦法。可是我們的同志許多地方並不是這樣去做的，在瑞金，許多區鄉沒中有向羣衆講過一次階級（沒有分析過什麼是地主富農中農）。在瑞金及別縣的許多地方都發現不經過宣傳就動手去查，以至地主富農跑出來造謠欺騙中農，說什麼本鄉地主富農多得很，或者說本鄉有幾百家地主富農要查（瑞金），而我們的同志，還不知用明白的『講階級』辦法，去打破這種造謠。贛昌的地主說：『查田運動是中央政府要過去欠債的人把債還與中央』，我們同志沒有立即去揭穿這種鬼話。在踏逕區的幾個鄉中除了不做宣傳之外，查階級只是查田委員會的幾個人查，通過階級不但不經過羣衆大會，連貧農團也不經過，他們說：『羣衆靠不住，羣衆不會分析階級，階級成份提到羣衆大會去通過是要發生糾紛的，還是只由查田委員會通過是靠得住的』，這個踏逕區同志的理論，真算是天下奇聞！好幾個地方沒收地主時，不在白天而在晚上，唯一的理由是怕地主跑掉了。有一處地方開羣衆大會，用了『全區大會』的辦法。可是到的不上兩百人，三個人輪流從上午演說到下午，不讓羣衆休息，也不讓羣衆喝水吃飯，說是怕羣衆跑掉了，這樣蠢幹的辦法，又算奇聞的一種。

### 九、開展兩條戰綫鬥爭克服自己錯誤爭取查田運動的徹底勝利

無疑的，查田運動是在廣大地區內開展了。但當這個運動進的時候，當着我們正確估計了已得成績，並奠定了運動發展的基礎的時候，我們還要警覺的注視運動中途的障礙物，只有發動兩條戰綫鬥爭的火力去清除這些障礙，才能推進查田運動更加迅速的前進。開展反右傾的思想鬥爭，反對對查田運動嚴重意義的估計不足。反對對地主富農的妥協投降，反對對羣衆鬥爭的尾巴主義，是每個共產黨員的責任。同時要把侵犯中農的危險喚起全體黨員的注意，要嚴厲打擊任何侵犯中農利益的企圖，因為這是目前查田工作中已經明顯表現出來了的

十分嚴重的危險。對富農不正確觀念，也無疑要影響到中農上去，一切命令主義的蠻幹，對於聯合中農是最大的危害，用兩條戰線鬥爭的火，來掃蕩查田運動道路上的一切障礙物，查田運動就可以大大踏步前進，它的徹底勝利就有了充分保障了。（毛澤東：「論查田運動」）

## 長崗鄉調查

### 羣衆生活

#### 1. 今年碰着飢荒

今春時雨前，竟有百分之八十的羣衆缺糧，要向東固、沙村、富田、水南等很遠地方辦米。這百分之八十的人平均整差一個月的糧，每人每年需谷五担，月計四斗，全鄉一、五〇〇人的百分之八十爲一、二〇〇人，一個月糧計四八〇担，都從遠地辦來解決了，無餓飯的

#### 2. 明年則不怕

今年春耕雖好，因蟲秋收不好，只等於去年的收成。但一、秋耕好，番薯豆子均比去年增加四成。二、冬耕又加種蔬菜胡豆雪豆與油菜。三、去年秋收後羣衆曾把谷子大批賣給商人，每担價僅二八〇〇文，不足一元，固然需要錢用，抓緊些少糶出點是可以的，但沒有注意到。今年開了全縣的會，議定非四元不賣給商人，並應少賣。四、去年秋收後供豬供雞鴨浪費許多，今年供的少了。五、去年一二兩期公債，買兩元須費去二担半谷，今年經濟建設公債，買十元只須交谷兩担。因此可保證明年春不荒。

#### 3. 油有多餘

花生比去年好，可打油。家家多少分了一點木子嶺又有些大油。油不少，還有多餘。

#### 4. 豆子可以換鹽，但食鹽量大減

今年豆子收成好（水勻，去年則幾全受水害），豆價也好，（去

每担九元，今年十二元），可交換全鄉食鹽百分之六十，餘百分之四十，可以多餘的油（油多百分之三十）去交換。

老少平均每人每天須鹽四錢（月十二兩），今年七月減少一半只二錢（月六兩），十一月三錢多一點（月約十兩）。羣衆食酸菜水，鹽與放鹽差不多（這是國民黨的罪惡，衝破封鎖才有鹽吃）。

#### 5. 吃肉貧農增一倍，工人增二倍

『供豬』的人家約百分之八十五，不能供的約百分之十五，平均每家每年豬賣出約值二十元，買進豬肉約十二元，餘八元。但在暴動前平均每年每家只能買進豬肉約十元。以階級分，暴動前中農買進豬肉約十二元，貧農約六元，工人約四元，現在差不多都有十二元，（其中一部份人無此數）。過去不說逢圩，即過年過節也吃不到多少肉，現在不說過年過節，每次逢圩大家都要買點肉吃了。

#### 6. 雞鴨多數自己吃，過去則多數賣出

#### 7. 生活好起來。柴火少出賣

柴火本地不缺。過去挑柴火城裏賣的多，現少了百分之三十，因有許多人不需賣它了。

#### 8. 衣增一倍

衣服一切算在內，平均每人每年需新製一套單衣褲。中農過去，現在無甚改變。貧農工人則現在較過去改了一倍，比如現在製二元衣服，過去則只能製一元。

#### 9. 雇農的生活改良了

雇農全鄉約二十二家，十分之六比最貧的貧農要好些了，因為分了東西。本鄉地主只二家，沒收了富農的（十二家）不少，從城市又分了好些來。十分之四則同於貧農。

#### 10. 中農尙留在原地位

一般說來，中農生活與過去差不多（蘇維埃應該注意中農生活的改良）。

#### 11. 羣衆的生活與勞動



每人每月平均約有五個整天（許多次會合起來）的開會生活，即是他們很好的休息時間。因出外的多，鄉間勞動力減少，羣衆的勞動強度還是同於暴動前，但勞動的意義不同了。

× × × ×

蘇維埃是羣衆生活的組織者，只有蘇維埃用盡他的一切努力解決了羣衆的問題，切切實實改良了羣衆的生活，取得了羣衆對於蘇維埃的信仰，才能動員廣大的羣衆加入紅軍，幫助戰爭，爲粉碎敵人的圍剿而鬥爭。應該明白：長岡鄉在戰爭動員上的偉大成績，是與他們改良羣衆生活的成績不可分離的。

## 勞動力的調劑與耕牛問題

### 1. 模範耕田隊

四村各一隊，共約七十人，紅軍家屬有勞動力者組織之，每隊一個隊長。隊下分小隊，比如長岡村模範隊二十多人，分三小隊，按住所接近，有三人的，有七人的。每小隊管其附近幾家或十幾家，經常注意使這些人家的生產弄好。今年八月割禾時組織的，作用是調劑勞動力。

辦法：勞動互助社幫紅軍家屬耕田（不要工錢），模範隊則幫助羣衆耕田（要工錢）。比如某個互助社社員正要幫紅屬耕田，而他自已家裏的田又正待耕，模範隊就派人幫他耕；或者代替他幫助紅屬耕田，由他出工錢與模範隊員。這樣來調劑勞動力。因此模範隊須與互助社取得密切的聯系。

### 2. 勞動互助社

四村每村一個，除紅屬外，凡有勞力的，十分之八都加入了，全鄉社員三百多。

全鄉人口中：

全勞動的百分之十（在全鄉總人口中約佔一五〇人）。

半勞動的百分之二十（約三〇〇人）。

附帶勞動的百分之三十五（約五二五人）。

無勞動的百分之三十（約四五〇人）。

前二項共約四五〇人，大部份加入互助社。

全鄉出外的三二〇人（內二二六人當紅軍，九四人做工作）中，除十幾個人屬於半勞動外，全部都是『全勞動』的，此數對於現留的『全勞動』一五〇人，為百分之六十八對百分之三十二之比，因此勞動力的有組織的調劑，成為生產上的中心問題，因此羣衆熱烈的歡迎勞動互助社。

互助社的工作是優待紅屬，社員互助，與社員幫助『孤老』均完全達到目的，紅屬的田一般耕得好。其辦法如下：

優待紅屬：本鄉紅軍家屬，緊時，平均每家每月須幫助約二十五個工，平時，平均每家每月須幫助約十個工。羣衆勞力多的多幫助，少的少幫助，無的不幫，女人帶了小孩子的也少幫。天約緊時全家有勞動的須幫出十三四個工，一個勞動力的須幫出六七個工，半個勞動力的幫一工兩工做輕便工作，應該幫這多而少幫了，則須算給工錢於多幫的。比如緊時甲家每月應幫紅屬七工但只幫助五工，乙家應幫七工而幫了九工，則甲家應算給兩個工的錢給乙家。

社員互助：工數對除，少做了的工，按工找算工錢於多做了的。

幫助孤老：只要吃飯，不要工錢。

以村為單位，全盤計劃生產，調濟人工。

每個月底清算一次，找出工踐（拿錢的多，物品抵的少，都能找清）。

工價：今年割禾分三等；最高八〇〇文（如打禾），其次六四〇文，（如割禾，挑桿），最低三二〇文（如拿禾，點豆）。七月間全社員大會議定的（此次到了上百人）。去年割禾工價：開頭八百文，緊張時一四〇〇文為最高工價。

減低工資：願農工會是贊成的，他們因為分了田更欠人工。勞動力多的也不反對，他們因為優待紅屬須幫工多。

互助社委員五人，內主任、組織、宣傳各一、受鄉的秋收秋耕委員會指導。

×                    ×                    ×                    ×

勞動互助社在農業生產上的偉大作用，長岡鄉明顯的表現出來了。根據於羣衆的願意，以村爲單位，統籌生產，一切地方都可實行，特別在擴大紅軍數多的地方。必要時還可以鄉爲單位，甚至區爲單位統籌，上杭才溪區就是這樣做的。耕田隊可以合併到勞動互助社，使組織上統一起來。這裏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動員女子參加生產。長岡鄉十六歲至四十五歲的全部青年成年七三三人，出外當紅軍做工作去了三二〇人，在鄉四一三人，其中男子只八七人，女子竟佔三二六人（一與四之比），因此長岡鄉的生產，絕大部份是依靠女子，長岡鄉提出了『婦女學習犁耙』的口號，女子已是成羣的進入生產戰綫中，這證明有組織的調劑人工與推動女子參加生產，是不可分離的任務。長岡鄉擴大紅軍如此之多，生產不減少，反增加了，即因爲他們把這個問題很好的解決了。（農村調查）

### 合作社運動

起始於一九三一年三次戰爭結束後柳木鄉（長岡那時屬於柳木）的古林村。本村羣衆以每股五角爲單位，集了八十多元，開始做生意，有成積。一九三三年一月。改爲柳木鄉合作社，沒有增股。貨比市上便宜，得到羣衆歡迎，到九月，做了三百塊錢生意，賺了錢。去年九月，區社成立，全區集了八百股（每股五角），把柳木鄉社并於區。

職員：村社時代，社長（李奎應，後任鄉社區社縣社的社長），採辦（李某後任鄉社區社縣社的採辦），會計，營業（王仁森，後任鄉社區社的會計）各一人，吃社內飯，無工錢。改鄉社時，決定每人每月工錢三元，但三人不受。

貨從茅店直接辦來。

村社鄉社時，社員及紅屬買貨，每千文減五十，即百分之五。非社員不減但照市價實際上便宜些，一串錢貨便宜二十文上下，即百分之二十。區社今年十一月改為鹽布每串錢減二十（因鹽布貴，賺錢少），他貨仍減五十，非社員照市價，此時一百元先約賺二元。

區社去年九月至今年三月（半年），四百多元本錢賺了六〇〇多元，以百分之五十為公積金，百分之十為營業者及管理委員審查委員的獎勵金、百分之十為文化教育費（為俱樂部，學校紅屬兒童買筆紙），百分之三十分紅。為了增發紅利，鼓勵社員，臨時將教育費取消（以後應該恢復），共分紅百分之四十，每人分了一串錢。分紅時，清算賬目，懸榜公告。分紅後，增加了許多股本，今年七月時，共有二千股一千元了。十一月，第二次分紅，每股分五角，實際三角，二角作為增股。決定改股金單位為一元，每人不得超過十股。

管理委員十一人 審查委員七人

現定鄉設支社。長岡支社集了二百六十多股（每股一元），在開始營業中。

縣總社八月成立，也在開始營業中。

古林村合作社為全縣合作社首創，又辦得最好，有模範合作社之稱。

本鄉糧食合作社集了二百二十多股（每股一元），穀子抗交的多（每担五元），集中在長岡村一個倉裏，還未開始營業，組織了整理委員會。

× × × ×

每個鄉每區都要學習長岡鄉與上社區的消費合作社！

## 木溪鄉調查

擴大紅軍

八、九、十三個月：

上才溪；六十人，動員了兩排模範營。

另歸隊的十一人。還有兩三個因病沒有歸隊。

下才溪；六十五人，模範營一次動員了五十二個人。另一次個別動員，去了十三人。

另歸隊的十一人。還有十四人未歸隊。

全區十二個鄉（未劃分前），八月十五日那一次，動員模範營二十七三人。新劃區八個鄉，共尚有未歸隊的五十多人。

全區以上下才溪兩鄉紅軍成績最好。主要原因，是很好的優待了紅軍家屬與慰勞紅軍工作歷來不錯。紅五月以前，八鄉平均每鄉每月可織中布草鞋五〇〇雙，近因封鎖無布，稍減少了。但上下才溪還有如下成績；上才溪，八月五〇〇多雙，九月一〇〇多雙，十月九十多雙。

下才溪；八月三〇〇多雙，九月二八〇雙，十月三〇〇雙，十一月六三〇雙。

這些成績，主要是由於黨團支部動員黨團員領導女工農婦代表會得來的：一、黨團員先開會；二、婦女代表會開會；三、農女羣衆大會。

婦女代表會十天開一次，鄉有主席團五人，內推一指導員，另四人分在四村，每村一人，即爲村的主任。

婦女代表會討論的問題，凡鄉蘇討論的、他們都討論，除對慰勞紅軍，推銷公債，發展生產等極其努力外，本身利益如婚姻問題，也常討論，解釋婚姻問題條例給婦女聽。

× × × ×

大數的動員羣衆去當紅軍，依靠於：（一）政治上的充分的宣傳鼓動，廢除一切強迫辦法；（二）充分的優待紅軍家屬；（三）健全的編制與訓練地方武裝。而優待紅軍家屬，是使羣衆歡喜去並且安心留在紅軍部隊的一個根本工作，長崗鄉才溪鄉的經驗，給我們完全證

明了。長崗鄉全部青年成年男子（十六歲至四十五歲）四〇七人，其中出外當紅軍做工的三二〇人，佔百分之八十。上才溪全部成年男子（十六歲至五十五歲）五五四人，出外當紅軍的做工的四八五人，佔百分之八十八。下才溪全部青年成年男子七五六人，出外當紅軍做工的五二六人，也佔了百分之七十。這樣大數量的擴大紅軍，如果不從經濟上生產上去澈底解決問題，是決然辦不到的。只有拿經濟上的動員配合着政治上的動員，才能造成擴大紅軍的熱潮達到如像長崗鄉，才溪鄉一樣的成績。

## 經濟生活

### 1. 勞動力問題

上才溪；全人口二，三一八人（暴動時）中，男勞動五五四人（十六歲到五十五歲，下同），女勞動五八一人，內當紅軍的四一九，調外工作八八（男六六，女二二）。五五四個十六歲至五五歲有勞動力的男子中，共去了當紅軍做工的四八五（四一九，加六六）留在鄉村的只有六十九人，與女勞動五五九人（五八一，減二二）比較，男子僅佔百分之十一。全鄉有紅軍家屬三五八家。

下才溪；全人口二，六一〇人中，男女合計有勞動力的一，二〇七人（男七六五，女四四二），當紅軍四四二，調外工作的九八（男九一，女七）。男子有勞動力的七六五人中，共去了五三三人當紅軍及做工，只留二三二人在鄉，與女勞動四三五（四四二減七）比較，男子也只佔百分之三十三。全鄉紅軍家屬三五五家。

因此，耕種主要依靠女子。上才溪今年女子能用牛的約三百人，能蒔田的六〇多人。暴動前此三〇〇人中只有十分之一即約三十個人能用牛，數年來的努力，得此成績。

同時，「老同志」精神很好，開山開嶺，多是他們，一部份還可蒔田割禾。兒童又參加生產。因此，生產是在發展中，除了女子，老人，兒童參加生產外，生產的發展還依靠於勞動力的互助調劑。一村

中，勞動力有餘之家，幫助不足之家，一鄉中，勞動力有餘的村，幫助不足之村，一區中，有餘的鄉，幫助不足的鄉，這樣以區爲單位調劑勞動，做勞動工。黨團員又做「禮拜六」。因此，生產得着更大的發展。

調劑勞動力的主要方法，是勞動合作社與耕田隊。其任務是幫助紅屬與羣衆互助。

幫助紅屬；帶飯包（不帶菜），帶農具，蒔田割禾也是這樣。

羣衆互助：議定每天工錢二毫，男女一樣，緊時平時一樣，一九三〇年起就這樣做。工錢，紅屬幫助紅屬，每天一毛半，紅屬幫助羣衆，每天二毛，羣衆幫助紅屬，不要工錢。

勞動合作社統籌全局，鄉的勞動合作社委員會五人，主任籌劃一鄉。四村每村一個委員，籌劃一村。要請工的，必經村委會，不能私請，都則混亂了勞動力的調劑。工錢「促」，「傭」雙方自理不經委員。

本鄉勞動合作社，一九三一年開始創設的。現在全蘇區實行的「勞動互助社」，就是發源於此的。

委員手裏有個簿子登記有勞動力的，無勞動力的，或缺勞動力的。有人請工，即刻可以分配。間有不知者，問耕田隊的中隊長（每村一個中隊，五人爲一小組，兩組十人爲一班，三班或四班爲一中隊）。中隊長手裏也有個簿子。『贊成將耕田隊與勞動合作社統一起起』。

生產情形：暴動後（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生產低落約百分之二十。一九三二年恢復了百分之十。今年（一九三三）比去年增加二成（雜糧如番薯、豆子、芋子、大薯等，則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超過了暴前百分之十。暴後全區荒了許多田。去年開發了一小部份。今年大開，開了一·三〇〇多擔。開山多開田更多，山佔四分之三（田佔四分之一），因田開盡，故進到開山。沒有一片田墜沒有種雜糧，能種番薯的田一概種下番薯了。開山開得女同志「爭」起來，

我要開，你也要開，競賽的效力很大。全區糧食，暴前不够甚遠（加以那時做粉乾得多）去年已够食，今年則已有餘了。現在全區沒有做粉乾及「果子」的，沒有蒸酒的。（農村調查）

## 四 爲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 爭的中國共產黨

### 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目前階段的任

務 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在蘇區黨  
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提綱

#### 民族矛盾與國內矛盾的目前發展階段

由於中日矛盾成爲主要矛盾，國內矛盾降到次要與服從地位，而產生的國際關係與國內階級關係的變化，形成了目前革命形勢的新發展階段。

（一）中國很久以來就是處在兩種割裂的基本的矛盾鬥爭中——帝國主義與中國之間的矛盾，封建制度與人民大眾之間的矛盾。由於一九二七年資產階級叛變革命，出賣民族利益於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造成了蘇維埃政權與國民黨政權尖銳對立及民族與民主革命任務不能不由共產黨單獨負擔的局面。

（二）九一八事變與華北事變以來的形勢，使這些矛盾發生了如下的變化：

甲、由一般帝國主義與中國的矛盾，變爲特別突出特別尖銳化的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的矛盾，即是日本帝國主義實行了和實行着完全殖民地化與獨佔中國強盜征服政策。因此便把若干其他帝國主義與中國的矛盾推入次要的地位，在這些帝國主義與日本帝國主義之間，並且也在社會主義蘇聯與日本之間，則擴大矛盾的裂口。因此，便在中國



共產黨與中國人民面前提出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與世界的和平陣綫相結合的任務。我們的統一戰綫是抗日的，不是同時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中國與蘇聯應該聯合起來。

乙、中日矛盾變動了國內階級關係，使資產階級甚至軍閥發生了他們的存亡問題，而逐漸在他們及其政黨內部發生了改變政治態度的發展過程。這就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面前提出了與法國人民陣線有區別的抗日的民族的統一戰綫的任務，並指出了這種任務有完成的可能，而且必須完成之。我們的統一戰綫是包括資產階級及一切同意保衛祖國的人們的，是舉國一致對外的。

丙、中日矛盾變動了全國人民大眾（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及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的情況與政策。人民是更大規模的起來為救亡而鬥爭。共產黨繼續「九一八」後在三個條件（停止進攻蘇區，人民的自由權利，武裝人民）下與國民黨中願意同我們合作抗日的部份訂立抗日協定的政策，把它提高到建立全民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新政策。這就是一九三五年八一宣言，十二月決議，一九三六年春天開始放棄「反蔣」口號，八月致國民黨書，九月民主共和國決議，十二月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堅持和平解決一四事變及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等等，我們的主張與積極努力之所由來。

丁、由於帝國主義勢力範圍與中國半殖民地經濟狀況而來的中國軍閥割據與軍閥內戰，在中日矛盾面前也起了變化。日本帝國主義贊助這種割據與內戰，以便利其獨佔中國。若干其他帝國主義佔在他們自己的利益上，贊助中國的統一與和平。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則以極大的努力反對內戰與分裂，爭取和平與統一。

戊、中日民族矛盾的發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國內階級間與集團間矛盾的地位，使他變為次要與服從的東西。但國內階級矛盾與集團矛盾本身的内容依然存在，並沒有減少或消滅。中國與日本以外其他帝國主義之矛盾亦然。因此，就在中國共產黨與人民面前提出了下列的任務；適當的解決國內國際在現時可能必須解決的矛盾，使

之適合與團結抗敵的總任務。這就是和平統一，民主政治，改良生活，及與外國和平談判種種方針之所由來。

(三) 從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開始的中國革命新時期的第一階段，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國民黨三中全會時，宣告結束了。此階段內重大事變，是學生界，文化界，輿論界的救亡運動，紅軍的進入西北，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政策的宣傳與組織工作，上海與青島的抗日罷工，英國對日政策趨向比較的強硬，兩廣事變，綏遠戰爭與援綏運動，南京在中日談判中較強硬態度，實際上起了承上啓下作用而成爲時局轉變關鍵的西安事變，最後是南京的三中全會。這些事變，統統都是圍繞着中國與日本對立這一基本矛盾的，都是直接圍繞着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這個歷史要求的這一階級的革命基本任務，是爭取國內和平，消除國內對立，以便團結一致，共同赴敵，黨在此階段內提出了正確的動員口號，即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這一任務是基本上完成了，這就構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實際組成上的一個必要條件。

(四) 國民黨的三中全會，由於他們內部有親日派與動搖派的存在，沒有表示他們政策的明確與澈底的轉變，沒有具體的解決問題，然而由於人民的逼迫與國民黨內部的變動，使國民黨不能不開始轉變他們過去十年的錯誤政策，這即是由內戰，獨裁，與不抵抗的政策，向和平、民主，與抗戰的方向轉變，而開始接受我們的即全國人民迫切要求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政策，這在國民黨三中全會上也可以看出來。今後的問題是國民黨政策的澈底轉變，這就需要我們及全國人民更大的發展與民主運動，進一步的批評推動與督促國民黨，團結國民黨內的和平民主抗戰派份子，推動動搖猶疑派份子，而排除親日派份子，才能打到目的。

(五) 目前的階段，即從國民黨三中全會到開始實現全國性對日武裝抗戰之時的階段，是中國革命新時期的第二個階段。前一階段與後一階段都是走上全國性對日武裝抗戰的過渡階段。如果前一階段

的任務主要的是爭取和平，則後一階段的任務主要的是爭取民主。如果前一階段里和平的取得，得到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第一個必要條件，則後一階段里民主的取得，將構成建立民族統一戰綫的第一個必要條件。在爲着抗日救亡的總目標而努力於建立真正的堅實的抗日統一戰綫（只有由於他，保衛祖國的任務才能達到）的時候，必須知道沒有國內和平固然是不行的，沒有國內民主也就不行。所以爭取民主，是目前發展階段中革命任務的中心一環。看不清民主任務的重要性，與降低對於爭取民主的努力，我們將不能達到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建立，而全國性對日武裝抗戰的實現與取得澈底的勝利以保衛中國與收復失地，也就將成爲不可能。

### 爲民主與自由而鬥爭

（六）對於中國本部的侵略戰爭，日本帝國主義正在加緊準備着，日德意同盟條約的訂立，二十八萬萬元預算的通過，議會的解散，滿州的增強，都是向着這一目的。同希特勒、墨索里尼在西方加緊準備的強盜戰爭相呼應，日本在東方正在用盡一切氣力在確定的步驟上準備一舉滅亡中國的條件——國內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思想的條件，國際外交條件，中國親日勢力的扶植。所謂「中日提攜」與某些外交步驟的緩和，正是證明戰爭前後侵略政策的戰術上的必要。中國正迫近着判定自己存亡問題的關頭。中國的救亡抗戰，必須用燃眉的急迫性與跑步而速度去準備。我們並不反對準備，但反對無期準備論，反對文恬武喜飽食終日的亡國現象，這些都是實際上幫助敵人的東西，必須迅速消除乾淨。

（七）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教育上的國防準備。都是救亡抗戰的必須條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緩對於他們的準備工作的。而爭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則爲保證抗戰勝利中的中心一環。抗戰需要全國的和平與團結，沒有民主自由。不能鞏固已經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強國內的團結。抗戰需要人民的動員，沒有民主自由，便無從進行動員。沒有

鞏固的和平與團結。沒有人民的動員，抗戰的前途便會踏襲阿比西尼亞的覆轍。阿比西尼亞主要的是因為內部封建制度的深刻矛盾，因此不能鞏固內部的團結，不能發動人民的積極性，所以失敗了，中國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建立及其任務的完成，沒有民主是不行的。

(八) 在民主共和國口號之下，中國必須立即開始實行下列兩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將政治制度上一黨一派一階級的獨裁專制政體變為各黨各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這方面應從國民大會選舉與召集上違反民主的辦法，改變為民主的選舉，與保存大會的自由開會做起，直到製定真正的民主憲法，召集真正的民主國會，選舉真正的民主政府，執行真正的民主政策為止。只有這樣做，才能真正的鞏固國內和平，消除國內對立；增加國內團結，以便舉國一致抗禦外敵。會有這種情況發生，不待我們改革完畢，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就到來了，因此，為隨時能夠抵抗日本的進攻並澈底戰勝之，我們必須迅速進行改革，並準備在抗戰的過程中進到澈底改革的程度，全國人民及各黨派的愛國份子，必須拋棄過去對於國民大會與製定憲法問題上的冷淡，而集中力量於這一具體的帶着國防意義的國民大會運動與憲法運動。嚴厲的批判，推動與督促當權的國民黨，放棄其一黨派一階級的非民主的限制性，採取人民的意見。今年的幾個月內，全國必須發起一個廣大的民主運動，而使這個運動的當前目標，放在國民大會與憲法之民主的完成上。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沒有這種自由，就不能實現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動員人民進入抗戰，取得保衛祖國與收復失地的勝利。當前幾個月內，全國人民的民主運動，必須奪取這一任務上的某些最低限度之完成，釋放政治犯，開放黨禁等等；都包括在內。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與人民的自由權利，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綱領上的重要一部，同時也就是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獲得真正的堅實的建立之必須條件。

(九) 我們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中國漢奸，親日派、托洛

茨基派，對於中國的和平統一、民主自由、與對日抗戰這一偉大的革命運動之每一步驟，都竭盡全力來破壞。當我們過去力爭和平統一的時候，他們就竭力進行內戰與分裂的運動。當我們現在與最近將來力爭民主自由的時候，他們無疑的又要來破壞，其總目標，就在使我們保衛祖國的抗戰任務不能成功，而使他們滅亡中國侵略任務達到目的。今後爭取民主自由的鬥爭中，不但要向全國民黨頑固派及人民落後成份做努力的宣傳鼓動與批評工作，而且要針對着日本帝國主義，及充任日本侵華走狗的親日派與托洛茨基派的陰謀，作盡量的揭破與堅決的鬥爭，才能達到目的。

(十) 爲了和平、民主，與抗戰、爲了建立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綫，中國共產黨曾在國民黨三中全會電中向他們保證下列四項：(一) 蘇維埃政府改爲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爲國民革命軍，受南京中央政府及軍事委員會之指導；(二) 在蘇區內實行徹底的民主制度。(三) 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方針；(四) 停止沒收地主的土地。這些保證，是必須的與許可的。因爲只有如此，才能在根據於民族矛盾與國內矛盾在政治比重上的變化而必須改變的國內兩個政權對立的狀態這一原則下，得着新的基礎以便團結一致，共同赴敵。這是一種有原則有條件的讓步，拿這個讓步去兌換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與抗戰，然而讓步是有限度的，在蘇區與紅軍問題上共產黨領導的保持，在國共兩黨關係上共產黨獨立性與批評自由的保持，這就是讓步的限度，超過這種限度是不許可的。讓步是兩黨的讓步，國民黨拋棄內戰，獨裁與不抵抗政策，共產黨拋棄兩個政權對立的政策，我們以後者換得前者，重新合作爲禦侮救亡而奮鬥。如果說這是共產黨的投降：那不是阿Q主義，就是惡意的污蔑。

(十一) 共產黨是否同意三民主義？我們的答覆：是同意的。三民主義有它的歷史變化。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曾經因爲同共產黨合作與堅決執行而取得人民的信仰，發動了一九二五——二七年勝利的大革命。又曾經因爲排斥共產黨（清黨運動實行相反的政策

，而失去人民的信仰，招致革命的失敗，陷民族國家於危亡的地位。現在則因民族危機與社會危機極端嚴重國民黨已不能照舊不變的統治下去全國人民與國民黨中愛國份子，因而有兩黨合作的迫切要求。因此，重新整頓三民主義的精神，在對外獨立解放的民族主義，對內民主自由的民權主義，與增進人民幸福的民生主義之下，兩黨重新合作，並領導人民堅決的實行起來，是完全適合於中國革命的歷史要求，而應為每一個共產黨員所明白認識的。共產黨決不拋棄其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理想，他們將經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而達到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階段。共產黨有自己的黨綱與政綱。其黨綱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這是與三民主義有區別的。其民主革命的政綱，亦比國內任何黨派為澈底，但對於國民黨第一次及第二次代表大會所宣佈的三民主義的綱領則是基本上不相衝突的。因此我們不但不拒絕三民主義，而且願意堅決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要求國民黨同我們一道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號召全國人民實行三民主義，使共產黨、國民黨、全國人民、共同一致為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這三大目標而奮鬥。

(十二) 我們過去蘇維埃口號是否錯了呢？沒有錯的。資產階級既然退出革命，而且投靠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變為人民的敵人，革命任務沒有完成而遭受了失敗，則革命的成份便已剩下了無產階級、農民與小資產階級，革命的黨派，便只剩下了共產黨，革命的責任，便不得不落在共產黨單獨一個黨派的肩上。僅僅共產黨高舉起革命的旗幟，保持了革命的傳統，提出蘇維埃工農民主共和國的口號，且為此口號，而艱苦奮鬥了許多年。蘇維埃工農共和國口號，不是違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的，而是堅決執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的，我們在實際鬥爭中沒有一項政策不適合這種任務。我們的政策，包括沒收地主土地與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在內，並沒有超出資本主義範疇內私有財產制的界限以外，並沒有實行社會主義。在新的民主共和國口號之下，他所包括的成份是什麼呢？他是包括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及一切國內同意民族與民主革命的份子，他是這些階級的民

族與民主革命的聯盟。這裏的特點，就是因為資產階級在今天的國際國內環境下，又有重新參加革命的可能，所以無產階級政黨應該不拒絕他們，而應該極力招致他們，與之恢復鬥爭的聯繫，以對於中國革命的轉向前進，為消除國內的武裝對立，共產黨願意停止使用暴力沒收土地的政策，而準備在民主共和國過程中，用立法的手段及別的適當方法，去解放土地問題。中國土地屬於日本帝國主義還是屬於中國人，這是首先待解放的問題，在保衛中國的大前提之下來解放農民的土地問題，由暴動沒收過渡到新的適當方法上去是必要的。

蘇維埃口號，過去的提出今天的放棄，都是正確的。

（十三）為了建立民族統一戰綫共同對敵，國內的某些矛盾必須給與適當的解放，其原則是互助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增加擴大，而不是削弱縮小。民主革命的階段中，國內階級間，黨派間，集團間的矛盾與鬥爭是無法避免的，但可以而且應該停止其不利於團結抗敵的部份（國內戰爭，黨派對立，地方割據，一方面封建的政治壓迫與經濟壓迫，一方面暴動政策與不利於抗日救亡的經濟條件等等），而保存其有利於團結抗敵的部份（批評自由，黨派的獨立性，人民政治條件與經濟條件之改善等等）。

（十四）在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與統一的民主，共和國而鬥爭的任務之下，紅軍與蘇區的任務是：（一）把紅軍提高到適合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新階段。如此目的，紅軍即改組為國民革命軍並將軍事上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提高到超過自己現狀及一切國內軍隊的水平之上，造成民族革命戰爭中的模範兵團。（二）蘇區改變為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組成部份，實行新的民主制度，重新編制保安部隊，肅清漢奸搗亂份子，造成抗日與民主的模範區。（三）在每區境內實行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恢復與增進人民的經濟生活狀況。（四）以消滅文盲為目的，實行有計劃的文化建設。

我們的領導責任

(十五) 在某種 歷史環境能够參加反帝與反封建之中國資產階級 (正確點說民族資產階級)，由於它經濟上政治上的軟弱性，在另一種歷史環境就會動搖變節，這一規律，在中國歷史上已經證明了。因此。中國反帝與反封建制度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歷史已判定不能經過資產階級的領導，而必經過無產階級的領導，才能達到目的。並且只有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堅持性與澈底性的充分發揚，才能克服資產階級的那種先天動搖性，與不澈底性，而使革命不至於流產。使無產階級跟隨資產階級呢？還是使資產階級跟隨無產階級呢？這個革命領導責任的問題，乃革命成敗的關鍵。一九二五——二七年的經驗證明資產階級追隨着無產階級的政治領導時，革命是如何的推向前進了，及到無產階級 (由無產階級政黨負責) 政治上變成了資產階級尾巴時，革命又如何的遭到了失敗，這種歷史是不宜於重複的，今天說來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及其任務的完成，離開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領導，就不能有任何成就，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戰的目的就不能實現，祖國就不能保衛，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就不能成功。在今天資產階級還帶着更多的被動性和保守性，對於無產階級政黨發起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在長久的時期中表示不敢慷慨接受，就是證據。因此，就更加重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領導責任，抗日救國的總參謀部，職務共產黨是責無旁貸與義不容辭的。

(十六) 無產階級經過它的政黨實現對於全國各階層的政治領導，是怎樣去進行的呢？首先是根據歷史發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號與爲了實現這種口號而提出關於每一發展階段與每一重大事變當中的動員口號。例如我們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與「統一的民主共和國」這種基本的口號，又提出了「停止內戰」「爭取民主」「實現抗戰」的口號，作爲全國行動的總目標與具體方針沒有這種目標與這種方針，是無所謂政治領導的。第二，是按照這種目標與具體方針在全國行動起來時，無產階級特別是它們的先鋒隊——共產黨員，應該提起自己無限的積極性與忠誠，成爲執行這些方針的模範。在爲抗日民



族統一戰綫與民主共和國的一切任務而奮鬥時，共產黨員應該作到最有遠見，最富於犧牲精神，最堅定，而又最能盡心體會情況。得到羣衆的愛戴，依羣衆多數。第三，在不失掉確定的政治目標的原則上，建立與同盟者的適當的關係，發展與鞏固這個同盟。第四，共產黨隊伍的發展，思想的統一性，紀律的嚴密性，共產黨對全國的政治領導，是由實現上述這些主要的去進行的。這些條件的增進創造成功，是保證自己政治領的基礎，是使革命進入澈底勝利而不被同盟者的動搖性所犧牲的前提。

(十七)和平實現與兩黨合作成立之後，過去爲執行兩個政權對立路綫的鬥爭方式，組織方式，與工作方法，應全部轉變到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與民主共和國路綫的方面去，從武裝轉變到和平的，非法的轉變到合法的，祕密的轉變到公開的，單獨的轉變到與同盟者合作的，是要需從新去認真學習的。從新訓練幹部，成爲主要的一環。

(十八)關於民主共和國性質與前途的問題，從許多同志中提起出來了。我們的答覆是，其階級性是各階級的聯盟，其前途可能走向非資本主義，因爲我們的民主共和國，是執行民族抗戰任務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的，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建立起來的，是在國際新環境之下(蘇聯社會主義勝利，世界革命前進建立起來的)。因此按照社會條件，它雖一般沒有脫離資產階級國家性質。但接觸具體的政治條件，應該是一個工農資產階級聯盟的國家。因此，它的前途雖仍有資本主義方向的可能，但存在着健全轉變到非資本主義方向的可能，中國無產階級政黨是應該力爭這後一個前途的。

(十九)向着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同時又向着尾巴主義作鬥爭，是執行黨的任務的必須條件。黨內在民衆運動中，由於中國社會條件的反映，存在着嚴重的關門主義，高慢的宗派主義，與冒險主義的歷史傳統，這是一個妨礙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與爭取羣衆多數的惡劣傾向。肅清這一傾向於每一具體任務的工作中是必要的。我們的口號，是依靠多數與照顧全局，陳獨秀尾巴主義的復活是不能容許的

，這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在無產階級隊伍的反映。降低黨的立場，模糊黨的面目，犧牲工農利益，去適合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要求，必然將引導革命趨於失敗。我們的口號是實行堅決的革命政策，爭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爲達到反對不良傾向的目的，在全黨中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水平是必要的，只有這種理論，才是指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之途的南針。

（毛澤東選集卷三）

## 爲爭取千百萬羣衆進入

### 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而鬥爭

一九三七年五月七日在蘇區黨代表大會上的結論

同志們，對於我的報告——「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在目前階段的任務」，經這幾天的討論之後，除了個別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見之外，都是一致同意的。但是這些不同意見，頗帶重要性，因此我的結論，首先在答覆他們的問題，然後說到一些其他的問題。

#### 一、和平問題

我們黨爲國內和平而鬥爭，差不多兩年的時間了。國民黨三中全會後，我們說和平已經取得，「爭取和平」階段已經過去，新的任務是「鞏固和平」，並指出這是同「爭取民主」相關連的——從爭取民主去鞏固和平。我們的這種意見，按照幾個同志的說法却不能成立，他們的說法必是相反的，或者是動搖于兩者之間的。因爲他們說：「日本後退了，南京更動搖了，民族矛盾下降，國內矛盾上升。」根據這種估計，當然無所謂新階級與新任務，情況回到舊階級，或者還不如。這種意見，我以爲是不對的。

我們說和平取得，並不是說和平鞏固了，相反，我們說它是不鞏固的，和平取得與和平鞏固是兩件事。歷史暫時的走回頭路是可能的，和平發生波折是可能的，這種情況是由多方面促成的（日本進攻的

基本方針，蘇聯及英美法之贊助和平，中國人民的逼迫，共產黨在西安事變中的和平方針及取消兩個政權對立的政策，資產階級的分化，國民黨的分化等等），不是蔣介石一個人所能決定與推翻的。要推翻和平必須同多方面勢力作戰，並且必須同日本帝國主義與親日派靠攏，才能成功。沒有問題，日本同親日派還在企圖中國的內戰，和平沒有鞏固，正是因為這一點。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結論不是回到『停止內戰』或『爭取和平』的口號與階段去，而是這進一步指出『爭取民主』的口號與階段，只有這樣才能鞏固和平，也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抗戰。為什麼提出『鞏固和平』，『爭取民主』與『實現抗戰』，這樣三位一體的口號，為的是把我們的革命車輪推進一步，為的是情況已經允許我進一步了。如果否認新階段與新任務，否認國民黨的「開始轉變」，並且邏輯的結論也將不得不否認一年半以來一切為爭取和平而鬥爭的各派勢力之努力的成績，那末只是把自己停頓在舊位置，一步也沒有前進。

為什麼作出這種不妥當的估計呢？原因在他們不但從基本之點（日本後退，南京更動搖，民族矛盾下降，國內矛盾上升）出發，而且也從局部與一時的現象（佐藤外交，蘇州審判，壓制罷工，東北軍東調，楊虎城出洋等等）出發，並把二者聯貫起來，形成一幅黯淡的畫圖。我們說國民黨已經開始轉變，但我們同時即說國民黨並沒有澈底轉變。國民黨的十年反動政策要他澈底轉變而不用我們同人民新的更多與更大的努力，這是不能設想的事情。不少號稱「左」傾的人們，平日痛罵國民黨，在西安事變中主張殺蔣與「打出灑關去」及至和平剛剛實現又發現蘇州審判等事，就以驚詫的口氣發問道：「為什麼蔣介石又這樣幹？」這些人們須知：共產黨員同蔣介石都不是神仙，且都不是孤立的個人，而是處於一個黨派，一個階級，一個民族裏頭的份子，共產黨有本領把革命逐步地推向前進，但沒有本領把全國的壞事在一個早晨去掉乾淨。蔣介石或國民黨已經開始看見了他們的轉變，但沒有全國人民的更大努力，也決不會在一個早晨把他們十年的污

濁洗掉得乾淨。我們說運動的方向是向着和平，民主與抗戰，但不是說不經努力能够把內戰獨裁與不抵抗的舊毒去掉乾淨。舊毒、污濁、革命進程中的某些波折，以及可能的回頭路，只有鬥爭與努力能够克服，而且須要長期的鬥爭與努力。

「他們是一心要破壞我們。」對的，他們總是在企圖破壞我們。我完全承認這種估計的正確，不估計這一點就等於睡覺。但問題在破壞的方式是否有了改變？我以為是有了改變的，從戰爭與屠殺政策改變到改良與欺騙政策，從硬的政策改變到軟的政策，從消滅政策改變到爭取政策，從軍事政策改變到政治政策。為什麼有這種改變？資產階級處在日本帝國主義面前不得不向無產階級找同盟軍，也和我們向資產階級找同盟軍一樣，觀察問題應從這一點出發。國際上，法蘇世仇變為盟友。同此道理。我們的任務，本是從軍事的變到政治的。我們不需要陰謀鬼計，我們的目的在團結資產階級及國民黨一切同情抗日份子，共同戰勝日本帝國主義。

## 二、民主問題

「強調民主是錯誤的，僅僅應該強調抗日；沒有抗日的直接行動，就不能有民主運動；多數人只要抗日不要民主，再來一個十二月九號纔是對的。」

讓我首先發出一點問題：能够在過去階段中（十二月九號到三中全會）說，多數人只要抗日不要和平嗎？過去強調和平是錯了嗎？沒有抗日的直接行動就不能有和平嗎（西安事變與三中全會正在綏戰結束之後，現在也還沒有綏戰或十二月九號）？誰人不知為抗日而要和平，無和平不能抗日和平是抗日的條件，前一階段一切直接間接的抗日行動（從十二月九號起到三中全會止）都圍繞着爭取和平，和平是前一階段中心一環，是抗日運動在前一階段中的最本質的東西。

對於抗日任務，民主也是新階段中最本質的東西，為民主即是為抗日。抗日與民主互為條件，同抗日與和平，民主與和平互為條件一

樣。民主是抗日的保證，抗日能給與民主運動發展的有利條件。新階段中，我們希望有也將會有許多直接的間接的反日鬥爭，這些將推動對日抗戰，也大有助於民主運動。然而歷史給予我們的革命任務，中心的本質的東西是爭取民主。「民主民主」是錯的嗎？我以爲是不錯的。

「日本退後了，英日向着平衡，南京更動搖了」，這是一種不知歷史發展規律而發生的不適當的憂愁。日本如因國內革命而根本後退，這是有助於中國革命的，是我們所希望的，是世界侵略前綫崩潰的開始，爲什麼還憂愁？還而暫時還不是，佐藤外交是大戰的準備，大戰在我們面前。英國的動搖政策只能向着無結果，這是英國與侵略國的不同利害決定了的。南京如果是長期動搖，便變爲全國人民之敵，也爲南京的利益所不許。一時的後退現象，不能代替總的歷史規律。因此不能否認新階段，也不能否認民主任務的提出。況且無論什麼情況，民主的口號都能適應，民主對於中國人是缺乏而不是多餘，這是人人明白的。何況實際情況已經表現。指出新階段與提出民主任務，是向抗戰接近一步的東西。時局已經前進了，不要把他拉向後退。

「爲什麼強調國民大會？」因爲它是可能牽涉到全部生活的東西，因爲它是從獨裁到民主的橋樑；因爲它帶着國防性，因爲它是合法的。收復冀東察北，反對走私，反對經濟提攜等等，如像同志們所提出的，都是很對的。但絲毫不與民主任務及國民大會相矛盾，二者正是互相完成的，但中心的東西是國民大會與人民自由。

日常的反日鬥爭與人民生活鬥爭，要同民主運動相配合，這是完全對的，也沒有任何爭論的。但目前階段裏中心同本質的東西，是民主與自由。

### 三，革命前途問題

有幾個同志發出了這個問題，我的答覆，只能是簡單的。

兩篇文章，上篇與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堅決的

領導民主革命，是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條件，我們是爲着社會主義而鬥爭，這是與任何革命的三民主義者不相同的。今日的努力是朝着明日的大目標的，失掉這個大目標，就不是共產黨員了。然而放鬆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產黨員。

我們是革命轉變論者，主張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方向去。民主革命中將有幾個發展階級，都在民主共和國口號下面，而不在蘇維埃口號下面。從資產階級佔優勢到無產階級佔優勢，這是一個鬥爭的長期過程，爭取領導權的過程，依靠着共產黨對無產階級覺悟與組織程度的提高，對農民，對小資產階級覺悟與組織程度的提高。

無產階級堅固的同盟者是農民，其次是小資產階級。同我們爭領導權的是資產階級。

對資產階級的動搖與不徹底性的克服，要靠羣衆的力量與正確的政策，否則資產階級將反過來克服無產階級。

健全的轉變（不流血的）是我們所希望的，我們應該力爭這一着，結果將看羣衆的力量如何而定。

我們是革命轉變論者，不是托洛茨基主義的不斷革命論者，也不是半托洛茨基主義的立三主義。我們主張經過民主共和國的一切必要的階段，到達社會主義，我們反對尾巴主義，但又反對冒險主義與急性病。

因爲資產階級的暫時性而不要資產階級，指聯合資產階級的革命派在（半殖民地）爲投降主義，這是托洛茨基主義的說法，我們是不能同意的。今天的聯合資產階級革命派，正是走向社會主義的必經的橋樑。

#### 四、幹部問題

担负着指導偉大的革命任務，要有偉大的黨，要有偉大的領袖與幹部。在一個四萬萬五千萬人的中國裏面，進行歷史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領導在是一個狹隘的小團體是不行的，黨內僅有一般萎靡不識大

體，沒有遠見，沒有能力的領袖與幹部也是不行的。中國共產黨早就是一個大政黨。經過反動時期的損失它依然是一個大政黨，它有了許多好的領袖與幹部，但是還不够，我們黨的組織要向全國發展，要自覺的造成萬數的幹部，要有數百個最好的羣衆領袖。這些幹部同領袖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於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並拿出全部忠心爲民族爲階級爲黨而工作。黨的路線依靠着這些人而聯系到黨員與羣衆，依靠着這些人對於羣衆的堅強領導而達到打倒敵人之目的。這些人又不要自私自利，不要個人英雄主義與風頭主義，不要懶惰與消極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義。他們是大公無私的民族與階級的英雄，這就是共產黨員，黨的幹部，黨的領袖應該有的性格與作風。我們死去的若干萬數的黨員。若干千數的幹部與數十個最好的領袖遺留給我們的精神，也就是這些東西。我們應該學習這些東西，把自己改造得更好些，把自己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是無疑地需要的。但是還不够，還要作爲一種任務，向全黨與全國找尋許多新的幹部與領袖，我們的革命依靠幹部，如像史大林同志所說的話，幹部是決定一切的。

## 五、黨內民主問題

要達到這種目的，黨內的民主是必要的。要黨有力量，依靠實行黨的民主集中制去發動全黨的積極性。在反動與內戰時期，集中制表現的多一些。在新時期，集中制應該密切聯系於民主制。從民主制的實行，發揮全黨的積極性。從發揮全黨的積極性，創造出大批的幹部與領袖，肅清派別觀念的殘餘，團結全黨像鋼鐵一樣。

## 六、大會的團結與全黨的團結

大會中政治問題上的不同意見，經過說明已經歸於一致了，過於中央路線與個別同志領導的退却路線之間的分歧，也已經沒有了，表示了我們的黨已經團結得很堅固的。這種團結是當前民族與民主革命

的最重要的基礎，因為只有經過共產黨的團結才能達到全階級與全民族的團結，只有經過，全階級全民族的團結，才能戰勝敵人，實現民族與民主革命的任務。

#### 七、為爭取千百萬羣衆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

我們的正確的政治方針與堅固的團結。唯一的是向着爭取千百萬羣衆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個目的。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的廣大羣衆，有待於我們宣傳，鼓勵與組織的工作。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進入和我們的同盟，也還待我們進一步工作。把黨的方針，變為羣衆的方針，還須要我們長期堅持的。百折不撓的，艱苦卓絕的耐心而又不怕麻煩的努力，沒有這一努力是一切都不成功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成，鞏固，及其任務的完成，民主共和國在中國的實現，絲毫也不能離開這一爭取羣衆的努力如果經過這種努力，而得到千百萬羣衆在我們領導之下的話，那我們的全部革命任務，就能够迅速的實現。日本帝國主義甚麼也不怕我們，但他獨怕我們的這種努力。我們的努力將確定地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並實現全部的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

。（毛澤東選集卷三） （第三分冊終）

上海图书馆藏書



A541 212 0019 1058B



1622601